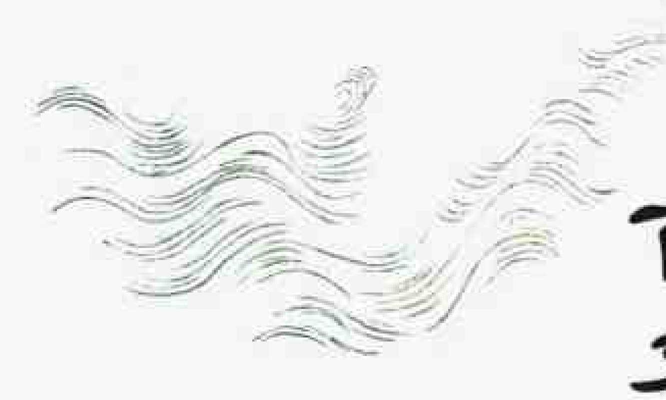
书趣文丛・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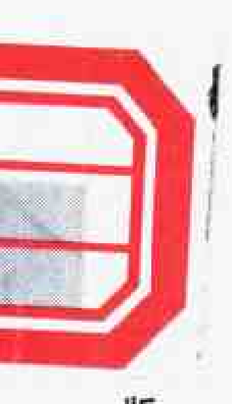
王充闾

面对历史的苍茫



在状写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的美学追求和冷隽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版社





总策划 脉望

书中的情趣

书里的风景

书外的故事

书人的心境



ISBN 7-5382-5018-2/I·264 定价 12.00元



面对历史的苍茫

王充闾

书趣文丛第五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历史的苍茫/王充闾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998.3重印）

（书趣文丛；第五辑）

ISBN 7-5382-5018-2

Ⅰ．面… Ⅱ．王… Ⅲ．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8622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79千字　印张：$7\frac{7}{8}$　插页：2

印数：501—6 500册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俞晓群　王之江　　技术编辑：华　德

装帧设计：张　红　　美术编辑：谭成荫

特邀校对：良莹娟　　责任校对：马　慧

定价：12.00元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喜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书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

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孑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写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斫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斫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年10月

千古兴亡　百年悲笑　一时登览

——

代序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因此，聪明的人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又谈何容易！正如王安石

在《读史》诗中所慨叹的：“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千百年来，这些诗人赋客，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泥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因此，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了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这是历史，也是诗章，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又同时从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人们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无比丰富，几乎每一处名

城胜迹，都有相对应的诗文和轶闻、佳话，见诸方志，传于史简，任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而这无数诗文、轶事的积蓄，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样，即使是首途，是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作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既写现在，又写过去，既写现实的发展，又写历史的变迁。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

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渴望与追求，努力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像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时空条件本身，就足以给人一分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

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销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也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便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去年初夏，我有中州之行，访问了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题为《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积存在那里。漫步在这些地方，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努力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存在与虚无》中，我通过凭吊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写了《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写了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历史的读本，岁月年轮留下的痕迹，写了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但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恰如清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也许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

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荒原，越过长城，越过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哭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与揭示这类社会文明继承、发展的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文化历史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徙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都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同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元、满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

的洗礼。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创造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目的相背反。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在丧失一些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考验。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我以为，散文应体现一种深度追求，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我也试图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

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人，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中碰撞的回声，表

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的青春的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像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感到生命的沉重。特别是一些悲剧因素，更能使读者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在对历史的勘察中也多了一层苍凉。“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写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记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目录

青　山　魂　梦

青山魂梦

不为人们所理解是痛苦的，而不自知则是可悲的。闲翻古籍，我总觉得，千载以还，人们对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悲慨于诗人对自己的认识反差太大。有人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看应该在后面加上半句：“尤患不知己也。”正是由于在认识自己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使李白终生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煎熬之中，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这篇文字的作意，是想尝试着从一个侧面来解读李白。我深知，面对一个伟大的存在，莫说写上几千字，即使推出一部大书，恐怕也难以穷原竟委，窥其堂奥。显然，我在干着一件力不从心的事。

一

起因是这样的：去年秋杪，我有皖南之行，漫游于当涂、宣城、秋浦（今属贵池）、泾县一带。这里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动的中心。他出蜀后三十多年间，前后将近六年是在皖南度过的。天宝元年，李白从东鲁南下，移家皖南的南陵，秋天从这里奉诏赴京。这是首次入皖。天宝六年，即遭到罢谴、被逐出京三年之后，又由扬州、金陵溯江而上，畅游皖南的当涂。又过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皖南各县。李白

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夜郎流放遇赦一年之后，他再次来到宣城、泾县，最后投靠族叔李阳冰，定居于当涂，并选择"谢家青山"作为埋骨之地。皖南一带绮丽的风光，朴厚的民情，润滋与抚慰了他的充满动荡、溢满忧愤、布满坎坷的失意生涯。诗人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而原本就雄奇秀丽的皖南山水，一经诗人的大笔淋漓的点染，更凸现出了它的壮美无俦的神采，成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价值的区域之一。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种幻觉里：山程水驿，雨夜霜晨，每时每地，都仿佛感到诗人李白伴随于前后左右，而且不时地发出动人的歌吟。当我站在宣城陵阳山谢公楼的遗址上，面对着晚秋的江城画色，"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名句，油然浮荡在耳际。而当驻足采石矶头，沉浸在横江雪浪的壮观里，"惊波一起三山动"，"涛似连山喷雪来"的隽咏，又使我同诗人一样跃动着猛撞心扉的惊喜，获得一种甘美无比的艺术享受。碧山，坐落在黟县的西北面，它北连孟山，南对霭峰，风景十分幽美。《徽州府志》记载，此地有十里桃花，春时与绿树交映，秀色宜人。我来时，已是秋光照眼，但从李白《山中问答》诗中仍能领略它的天然逸趣。"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诗人眼中的碧山，充满了清幽、纯净之美，是名利场、是非窝的"人间"所无可比拟的。寥寥数语，寓沉重于闲适，寄托了诗人愤世疾俗的万千感慨。明代诗人李东阳说它"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其旨趣"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在这里，我也效仿李白以恬淡、虚空的心境，对碧山这个客体作一番美的观照，沉浸在美学家所说的"静照"境界里："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在

静默里吐露光辉”。（宗白华《美学散步》）我很喜欢踏着晚秋的黄叶，徜徉于五松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间，寻几分天籁、握一把苍凉，在疑幻疑真的朦胧意象里，借助那一泓澄碧和万壑松吟来濯心、洗耳，冲破时空的限界，纵身千载之上，同诗人一道亲炙那“扫石待归月”，“倚树听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矶头，也是那样一个“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矶如削的峭壁上，望着涛惊浪涌的滚滚江流，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谪仙泛舟赏月图》。李白和他的好友“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与，溯流而上，“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像诗人汪静之所描写的，他穿“一件极美丽的五云裘，颜色好像夏天的朝云，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衬着远山，红霞映着绿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诗酒唱和，岸旁观者如堵，而诗仙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侯鲭录》载：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答复是：“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又问：“以何物为饵？”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宰相闻之悚然。这虽然只是传说，未足凭信，但确也深得太白的神韵，真实地刻画了他的高蹈、超拔的精神世界。

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哺育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他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太白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导源于庄、骚；单就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方面来看，屈原的热爱祖国，憎恨黑暗腐朽势力，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活动、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李白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除了儒、道这两个主导因

素，在李白身上，仙、侠、禅的影子也存在。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唐代以前，儒、道、佛、仙、侠等文化均已出现并且成熟，但很少有诗人将它们共融于个人的整个生活，只有一生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李白，完成了这种文化的综合融汇工作，将它们集于己身之中。（庞朴、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里体现了盛唐时期精神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可以说，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所谓“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李白对立言似乎并不看重，有道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他所兢兢以求、奉为人生至上的是立德与立功。但无论是创制垂法，惠泽无穷的立德，还是拯厄除难，行济百世的立功，都要凭借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所以，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政治上有所作为。但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自负其

长才异质相关联，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姜尚、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倾心折服，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地歆羡。他确信，只要能得遇明主，身居权要，则经邦济世易如反掌，以为同写文章差不多少，“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但这些宏伟的抱负，多半是基于情感的体验，而缺乏切合实际的具体构想，并且，对政治斗争必然出现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四十二岁时，经过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他被召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满以为从此可以为帝王师，画经纶策，实践其“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夙愿，可是，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赴阙后，只被安排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受到重用。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忍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脚色！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只好上疏请归，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从此再没有回来过。流离十二载后，永王李璘起兵，以平定安史之乱为号召，率师东下，路过九江时，征李白为幕佐。诗人又一次激扬志气，充满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以为靖乱杀敌、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哪里料到，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由于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李璘被杀，他也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对于政治上的失败，他是不甘心的，总想找个机会重登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了，当听说太尉李光弼带甲百万，出

征东南，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但中途病还，未偿所愿。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由于客观因素，是偶然的；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直觉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事、运筹决策上，也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关于李白的第一次从政的挫折，论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玄宗召李白入京，最初很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发现他“非廊庙材”，便只对其文学才能感兴趣。所以后来他要求离开，玄宗也并不挽留。这是说，李白不是搞政治的材料。第二种意见是，李白看错了人，错误地分析了形势。其时，唐玄宗在位已三十年，一方面迷恋声色、迷信方士符瑞；一方面宠幸奸佞，阻塞贤路，已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可是，李白却仍然对他寄予莫大希望，最后当然注定要失败了。这又说明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可以认为，两种意见殊途而同归。关于李白“从璘”的教训，论者一致认为，他对安史之乱的形势看得过分严重：“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由于形势判断失误，于是认为唐王朝应作退保东南半壁江山的准备，这是他毅然从璘的真正原因所在。同时，在李璘身上，他又一次犯了不知人的错误，既未发觉其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的小人。靠这种角色来成大事，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高自期许，但他并不具备

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更谈不上谙熟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都有所论列。这种主客观严重背离、事与愿违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我以为，这种现象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在别人看来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价值取向，对于后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比起李白来，杜甫更要典型一些。他枯守长安十年，为的就是"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但他也同李白一样，终生郁郁不得志，真正为官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十分认真，绝不怠慢从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为了克尽职守，他频频上疏。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知底里，不明事体，硬是天真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救援，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诗，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诗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三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也许可以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强调、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物、牵掣一切的主体意识，努力争取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已、不干人"的旗帜。由于用世、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虽也常常进表上书，但大前提是要以不失去自由、丧失人格、出卖灵魂为依归。如果因用世、进取而遭致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则毅然决绝，毫不顾惜。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主君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不仅此也。正由于李白以不与群鸡争食的凤凰，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居，因此，他不屑于按部就班地参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晋身之路；他也不满足于作个普通僚属，目标是

"为帝王师"，"济苍生，安社稷"。他要以一介布衣一举而至卿相，做吕尚、管仲、诸葛亮、谢安石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够尊崇与信任的前提下，实现与当朝政治势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他在辞京还山时，吟出："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原非太白醉扬州。"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皇帝的关系，视为东汉隐士严光与汉光武帝刘秀的朋友关系，而不是君臣上下的严格的隶属关系，是可以来去自由的，是彼此平等的。这类诗章，没被人罗织成"乌台诗案"之类的文网，说明盛唐时期的文化环境还是十分宽松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时期，那他的"辫子"可比苏东坡的粗多了。

这种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争得"士"的真正社会地位，在较高层次上维护知识阶层的基本价值和独立性的期望，不过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甜蜜蜜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他处身于盛唐之世，而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同两汉之交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的成果，恢复汉朝统治的形势，也大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特殊阶层的"士"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因而出现诸侯争养士、君主竞揽贤的局面，在盛唐时期，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可能再度出现。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李白暗于知己，也不明于知时，"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必然要到处碰壁了。即此，亦足以洞

见李白的诗人气质和名士派头。

四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他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长安放回之后，寄情皖南的锦山绣水，耗壮心，遣余年，徜徉其间，流连忘返。庄子的超越意识和变化哲学，使李白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能够用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这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诗人毕竟是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泄。史载，晋代袁宏少时孤贫，以运租为业。镇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听到袁宏在运租船上讽咏自己的咏史诗，非常赞赏，于是邀宏过船细论诗文，直到天明。由于得到谢尚的赞誉，从此袁宏声名大著。李白十分羡慕袁宏以诗才受知于谢尚的幸运，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因而在夜泊牛渚时，触景伤情，慷慨悲吟："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因是有感而发，显得更加凄惋动人。他的心境是万分凄苦的，游秋浦，惊呼"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谢朓楼，哀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眺望横江，感慨"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眼处心生"，感慨随地触发，全都紧密结合着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话，这种收视反听的心理活动，使他与社会现实日益隔绝起来；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调，经常发表背俗违时的见解，难免遭致一些人的白眼与非议："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和对人

际关系的失望，使他感到无边的怅惘与孤独。“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寥寥二十个字，把他在宣城的孤凄心境绝妙地刻画出来。大约同时期的作品《月下独酌》，对孤寂情怀的反映尤为深刻：“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秋绝调。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其程度之深不言可见。这还不算，甚至于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也休想找到共饮之人，以致只能与月光、身影永结无情之游，并相约在那邈远的云空再见。这就在孤独之上又平添了几许孤独。结末两句，写尽了诗人的踽踽凉凉之感。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显示出诗人对现实的愤懑与绝望。“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可说是夫子自道。他要在醉梦中忘却痛苦，求得解脱。晚清诗人邱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作如是解释：“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不管怎么说，佯狂痛饮总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种痛苦的选择。他要通过醉饮，来解决悠悠无尽的时空与短暂的人生、局促的活动天地之间的巨大矛盾。在他看来，醉饮就是重视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

当然，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正如清初文人金圣叹说的：“诗者，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

物，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情感转。“当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脑门，一喷即是”。有人统计，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诗，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但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是最终成就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历史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留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寤寐思服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职是翰林待诏，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在为他编辑诗文时还要标上《李翰林集》。好在墓碑上没有挂上这个官衔，而是直书“唐名贤李太白之墓”，传说系由杜甫题写，终竟是他的知音。

五

当代著名诗人羊春秋度曲《折桂令》，为我们塑造了诗仙李白的高大形象：“谪仙更复酒仙。笔扫千军，鲸吸百川。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至尊开宴。为寒儒添了颜面，给权贵打了气焰。屈贾

哀怨，陶谢酸寒，磊落如公，谁堪比肩？”诗人傲睨一世，目无余子，而对于普通民众，倒显得比较可亲可近。特别是晚年，他在皖南一带结识了许多普通劳动者，像碧山的山民胡晖、五松山的田妇荀媪，宣城的酿酒工纪叟，不仅交情甚笃，而且都有诗相赠。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农夫田媪，牧竖樵苏，行役征人，孤孀弃妇，撑船汉，捕鱼郎，采菱女，冶铜工，都留下了鲜明的美好形象。同下层民众的接近，使他的达观阔朗的性格得以张扬，怀才不遇的苦闷和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理负担有所缓解。就此，我想到了谪居海外的苏轼。他初入海南时，面对被目为蛮荒瘴疠之地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了“必死南荒，葬身异域”的准备，情绪极为消沉。可是，到了儋州之后，竟很快地适应了环境，交上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最后作出“风土极善，人情不恶”的结论，三年过后得以生还中土。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从善良质朴的当地民众的热诚关怀、衷心敬慕中获得了力量。李白在皖南，苏轼在海南，各都写了一百三十多首诗，是他们创作的丰盛期之一。二人的情况有些相似。

李白的豪气冲霄、汪洋恣肆的诗才，他的“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制，王公大人不能凌辱”的伟岸形象和独立人格，历来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光是元、明、清三代上演的戏曲，就有乔梦符的《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屠隆的《彩毫记》、尤侗的《清平调》、李岳的《采石矶》、无名氏的《沉香亭》、《李白捉月》等许多种。有关他的传说与遗迹，更是遍布他到过的每个地方。我在皖南一带，接触到历代许多根据李白诗意创设的人文景观。像黟县的问余亭、歙县的碎月滩、宿松的对酌亭、饯客岭，泾县的云锦堂、凌风台、绿竹亭、踏歌岸阁，采石矶的十咏亭、横江馆、醉月斋、怀谢亭，等等，数不胜数。至于太白楼、太白书堂更是随处可

见。大约从中、晚唐开始，因为同情李白落拓终生的际遇，在人民大众中就流传开了他跳江捉月、骑鲸归天的神话传说，并在采石江边堆起了他的衣冠冢。有些诗人更是踵事增华，坐实其事，李东阳概括得最好：“人间未有升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我在泾县还听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真实故事：桃花潭东岸是翟村，西岸是万村，两村都争着以本村名命名渡口，相持多日不下。后来，万村人以李白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为据，说千尺就是万寸，万寸与万村谐音，应叫万村渡为是。翟村人一看太白有话了，只好心服。

当然，众多古迹中最令人低回无尽的还是当涂的青山。这里距县城十五华里，山势盘陀，林壑幽深，溪水潺潺，风光秀美。李白“一生低首”、衷心敬服的谢朓曾结宅于此。右面和重九登高胜地，李白曾两度登临，愤抒其逐臣与黄花共苦之情的龙山隔河相对。那天，我沐着淡淡的秋阳，满怀凭吊这真正的艺术生命的无比虔诚，久久地在李白墓前肃立。风摇柳线，宿草颠头，仿佛亲承謦欬，进行着一场叩问诗仙的跨越千古的无声对话。“莫向斜阳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许梦熊《过南陵太白酒坊》）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俊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多么遗憾啊！当然，诗仙自己并不作如是想。他临终时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的哀歌，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那种双目至死难瞑的深悲巨痛，闻之令人心酸气噎。这三尺孤坟里面，一千二百多年了，就这样埋下了一具凄怆愤懑，永恒飞扬、躁动的灵魂！

土囊吟

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闭塞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这里地形很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南面却没有什么遮拦，远远望去，像个敞着口的土囊布袋。说是城，也只是把一些土堆起几米高来围个大圈圈，再开出个门洞而已。辽代，松花江下游两岸的生女真人的五个部族分别筑城据地，此间为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开始有葛、卢、胡三姓居民以捕猎为生，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是荒山漫野，遍地荆榛，人烟稀少。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的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

那天傍晚，江天薄雾轻拢，半钩新月初上，我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念及八百年前的旧事，心想，真是世事无常，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这个破破烂烂的大土囊“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吟成七绝一首：

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
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公元一一二六年，金人进军围困汴京，徽宗赵佶退位，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嗣后金人灭宋，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败类，将开封城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劫掠一空。一一二七年四月，金人携走二帝和皇室、宗戚男女及伎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并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被金人狩猎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三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要求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尔后，他们又被迁徙到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宁城）和通塞州。一一二八年秋，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皇后“均帕头、民服，外袭羊裘”，

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帝祖庙外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赴乾元殿，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胜国天子金太宗。这也是很难堪的。年末，他们被流配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八面城）。此前已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二帝及宋宗室几百余人，分地十五顷，在金人武力的严密监视下，被迫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原以为可以终老于此，没有料到一年半之后，又被发配到更加荒凉、辽远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

在五国城，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并经人考证坐实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前后察看一番，井倒真有，但不大可能住进去。我以为，“井”也者，形容其局促、塞陷也。很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而可见的“地窨子”里。即使现在，寒冬困在风刀霜剑的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也得冻僵；何况八百年前气温还要更低一些。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因为一般的井，只有盖而无门；井中的风是无法摇撼破扉的。他还有一首七绝，也是感怀抒愤之作：“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祊隔绝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圣人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实话。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不包括白旗高举、肉袒出降的帝王在内，单是类似赵佶父子这样沦为俘虏的，也指不胜屈。不过，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等，被俘后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真正长期地惨遭活罪、“终朝以眼泪洗面”者，只

有李后主和赵家父子了。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本来没有理由却要制造理由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也是硬找借口攻占汴京，灭了北宋。而且，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赵佶一样，都是"好一个翰林学士"，却没有做皇帝的才能，不免令人哀叹："南朝天子都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狠毒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时，他绝不会想到，一百五十七年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也真会作弄人。它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再把他们从生活的顶峰打翻到苦难的深渊，让他们饱受着心灵的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从上引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连他自己也承认，实在是咎由自取的。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占了三件。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任用坏人，听由蔡京等六贼害民乱政；二是穷奢极欲，搜刮民脂民膏，弄花石纲，建豪华园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他和几个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贼臣，沆瀣一气，从全国各地征集花石竹木，在宫苑中兴建一所奢华侈丽的延福宫。又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十余里，最高一峰达九十步。山的上下，布满了亭

台楼阁，还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不但要使其富丽堂皇达到空前，还要求它能够绝后。让这样一个骄奢淫佚的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其实，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缺乏悲剧体验的人，其意识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素朴的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一则佛经故事说，一天，徽宗皇帝驾游金山寺，见长江中舟船如织，因问住持黄柏大师江上有多少只船，大师答说，只有两只，一是寻名的，一是逐利的。人生无他物，名利两只船。显然其中寓有讽喻的深意。但在当时的赵佶来说，他是无法理解的。据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某一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对于自己害贤乱政的恶行，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流传下来的钦宗赵桓的《西江月》词："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诗的水准不高，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可以看出历经劫难后的些微觉醒。

一一三五年四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便可即位，救出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也脱下金环，使内侍付曹勋曰："幸为我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曹勋归后，因建议募死士入海，至金东境，奉上皇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从这段

内情非常微妙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赵构与秦桧一干人的真实心态。明人陈鉴有诗云：“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与这样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郑板桥也写道：“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也不尽然。不要说活人他们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金人也无意遣返。徽宗已知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由于南宋朝廷无人关心，不加闻问，所以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徽宗有皇子三十一人，公主三十四人，除了当时没有在汴京的康王赵构和早殇的以外，其他统统被俘获到穷边绝塞。在徽宗的近千名随从、钦宗的上百名随从中，有些年老体弱者抛尸于流徙途中，还有很多人惨死在金兵的剑锋之下，有一百多名“王嗣”（徽宗的后代）成为海陵王的刀下之鬼，——这是在金世宗即位诏书中罗列海陵王罪行时揭露出来的。被俘宗亲中唯一得以生还的是徽宗的韦后。由于她是高宗的生母，在高宗千方百计的营求下，得随徽宗的灵柩返回故国。现今五国城的东门和南门外，有许多荒丘，传说乃赵氏宗室的墓葬。另外，本世纪三十、七十年代，在城内先后掘得许多用铁柜盛装的北宋通宝。考古学家认为，或是宋宗室携带的，或为金人掳获品，就是说，并非商业流通物。在依兰一带，还流行有所谓“徽宗语”者，其语法类似切音叶韵。传说系当时徽宗与从者所用之隐语。

有关徽钦二帝羁身北国的情况，宋史、金史上均只记了寥寥数语，《松漠纪闻》、《北狩行记》等几部个人著述，由于掌握资料有限，也都是语焉不详。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淹没无闻。就我所见的史料钩沉，要推日人园田一龟的《徽宗被俘流配记》较为详尽，但有些说法还须作进一步的考证。

本来，赵佶的诗文书画都称上乘，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评说，"徽宗天才甚高，诗文而外，尤工长短句"。在书法艺术上，赵佶以其深湛的学养、悟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识，跳出唐人森严的法度，选择和创造了能表现其艺术个性的"瘦金书"体。赵佶的画，同样站在了北宋绘画艺术的山峰上。他从宫中所存的几万件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一千五百件，反复展玩赏鉴，又从中选出上百件，日日临习，直到每一件足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才肯罢休。从他当皇帝的第二年起，日日写生作画，长年不辍，终于成为一个绘画大家。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以及其他杂画、风俗画，各色俱备，技艺卓绝。九年羁旅中，他也不曾辍笔。据说仅创作诗词就超过千首，但流传下来的极少，书画则已全部散失。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金朝统治者对流人的箝制；二是作者惧祸自动销毁。在他谢世前，曾遭到一子一婿以谋反罪诬告，后来事实虽然得到澄清，但釜底游鱼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片纸只字再也不敢留存了。就艺术方面看，李煜比赵佶的命运要好一些。

告别了五国城，我又沿着松花江，一路寻访了九百年前女真部族生息繁兴、攻城略地的丛残史迹，最后来到金代前期的都城——阿城的上京，考察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龙兴故地。这座曾经煊赫百余年的王朝都会，几经兵燹劫火，风雨剥蚀，于今已片瓦无存，只余下一片残垣土阜在斜阳下诉说着兴亡。值得记述的

是，据《大金国志》和《金史》记载，当时上自朝廷的官阙、服饰，下至民风土俗，一切都是十分朴陋的，充满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可是，后来这些值得珍视的遗产在他的子孙身上就逐渐销蚀了。代之而起的是豪华、奢靡，玩物丧志。他们在燕京，特别是迁都汴梁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之辈，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其下场之可悲，当然也和前朝一样。

汴京城南五里有个青城，是当年金军接受徽、钦二帝投降之处，赵宋的后妃皇族当时都曾聚集于此。一百零七年之后，金人降元，元军亦于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后全部杀死。当时，诗人元好问目击其事，曾写过一首七律，末后两句是："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可谓苍凉凄苦、寄慨遥深。元好问还有一首描写蒙古军掠夺汴京行为的七绝："随宫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它使人忆起当日金兵掠宋的情景。

本来，前朝骄奢致败的教训，应该成为后世的殷鉴，起码也是一种当头棒喝，但历史实践表明，类似海陵王那样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的，亦复不少。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一下。南齐的东昏侯萧宝卷，给他的潘妃筑永寿殿，凿金以为莲花贴地，让潘妃走在上面，说这是步步莲花。不久即为梁武帝所灭。可是，新朝并未接受前朝的教训，豪华的齐殿变作享乐的梁台，依旧歌管连宵，舞彻天明。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此感喟无限，写了一首有名的《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后，犹自风摇九子铃。"

看过金代的兴亡故迹，我也有无限的感喟。为此，发扬李商隐的诗意，步《土囊吟》一诗原韵，续写七绝二首：

艮岳阿房久作尘，上京宫阙属何人？
东风不醒兴亡梦，大块无言草自春。

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
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

诗中阐发了唐人杜牧《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深义。

文明的征服

出哈尔滨东南行，不远，就来到了阿城的白城子，这里是金代前期的都城上京会宁府。像历代的所有都城一样，从宏观地理环境看，此间具有鲜明的优越条件。张广才岭屏障其南，阿什河环绕其东，松花江与拉林河在西面构成两道天然险阻，北为松花江干流，长河为堑。京郊土地平旷肥美，适于放牧畋猎，耕垦树艺。不仅山林与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鱼鳖生焉，货殖兴焉”，富有灌溉与舟楫航运之利。从现存遗址看，京城由南北二城组成，中间以腰垣为限，四周有护城河环卫。南城内有皇城，形制仿北宋故都汴京，却又保持着金代古城建筑的风格特点。当然，这个认识的形成，是借助于史籍与遗图的。由于人为的破坏与风雨的剥蚀，当年的宫观庙貌早已形影无存了。说来也是一个悲剧现象，因为地面遗存太少和文字资料欠缺，“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到底在何处，曾经横绝一世的女真族究竟在哪里建都，数百年来竟成为一个历史之谜。明清以来，从宋濂的《元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这些重要史书都以渤海上京故城为金上京会宁府，直到本世纪初，一些学者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证、遗存发掘，才纠正了这个谬误，确认上京会宁府即今之白城。这在当代史学界，已成为板上钉钉的定论。

当然，像金上京这样的沧桑迭变，在我国历代古都中并不是特例。有人统计过，中国历代的都城大约在二百处以上。准确与

否很难说，总之，非常之多就是了。由于年深日久，绝大多数古都已经荡为平地，湮没无闻。就中，毁于天灾人祸的占很大的比重。最著名的，像秦都咸阳，汉末都城洛阳，金代中都大兴府，都是毁于敌对势力的纵火。公元前二〇六年楚霸王火烧了阿房宫，烈焰三月不息。唐人杜牧感慨生哀，低回无限，以如椽大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阿房宫赋》。东汉末年，权奸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焚毁了洛阳宫殿，二百里内荡然无存。十九年后，诗人曹植路过洛阳，也曾咏诗哀叹那惨痛、凄凉的景象。也有被水淹没的，像东京汴梁，黄河泛滥，淤积的泥沙把许多建筑物埋在了五米以下。至于因遭受兵燹炮火而沦为废墟的，更是难以计数。但是，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像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那样，亲自下令拆除、捣毁自己的都城，这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尚属绝无仅有。

公元一一四九年，海陵王完颜亮联合各种反叛势力，谋杀了金熙宗，登上皇位。三年后，下诏迁都，修建燕京都城。这是他酝酿已久的一项重要决策。有一次，在宫中宴饮，海陵王问及侍臣："我在上京栽莲二百本，竟没有一株成活，这是什么原因？"侍臣早已查知他要迁都的意向，便说，自古淮南为桔，淮北为枳，并非栽种不得其法，乃地势使然也。唯燕京地暖，最宜植莲。海陵听了特别高兴。其实，莲与桔枳不同，对此，侍臣是清楚的，"地势使然"云云，无非是迎合这个暴君的一个遁词罢了。文献记载，早于金代四百多年的渤海时期，这一带就已栽植莲藕；现在，哈尔滨与阿城附近，莲花更是随处可见。历朝历代，迁都建都都是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这次也不例外。但是，海陵志在必得，一意孤行，全然不顾一些宗室贵族的抵制。他考虑到，祖茔、皇陵都在上京地区，尔后必然为女真人所怀念与向往。于

是，迁都之后立即迁陵。为了消除女真人对上京的留恋情绪，打击上京宗室势力，紧接着又撤销了金上京的名号，并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捣毁宫殿、宗庙，宗室诸王、国公、元勋旧臣、世戚贵胄的第宅，和皇家佛庙储庆寺，然后把旧址夷平，改为耕地。这样，由其祖父、金代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奠基，几代人惨淡经营四十余年的龙兴故地，掺和着皇族宗室的伤心泪水，豪门贵胄的腹诽心谤，不到一个月便沦为一片废墟。

数十年间，上京不仅是女真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金代前期的一个缩影。上京的兴废，与女真族的汉化程度、同女真旧制决裂的深度，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关于这一点，说起来话就长了。建国之前，女真人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太祖伐辽时，尚无本民族的文字。与契丹言语不通，亦无文字可达其意，遇事以射箭为号，事急者三射之。说明当时的女真文化还处于类似"结绳纪事"阶段。从"皇帝寨"、"太子庄"、"国相寨"的名称也可以看出，金初的上京不过是一个较大的村寨和聚落。当时外无城郭，内无宫室，"四顾茫然，皆茅草以居"。居民随意往来，车马杂沓而过，自"前朝门"至"后朝门"尽为出入之路，略无禁制。北宋使臣马政等来到这里，太祖首先安排他们随驾出猎，归来后即令诸郎君家各具酒肴，款待南使。次日，金廷正式宴请，太祖与大夫人于炕上设金装交椅并坐。他对南使说："我家自上祖留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侈；只住此类房屋，冬暖夏凉，不另修宫殿，免得劳费百姓。请勿见笑。"太宗继位后，"有事集议，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其时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可共用。至于车马、屋舍、服饰、饮食之类，都无大的差异。

开始用兵，尚保有氏族制的民主习惯，兵丁场上环坐，均可发表意见。战后论功行赏，有不公或以为薄者，可予更改、增益。

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自然也不存在着浓重的旧习的因袭和历史的负累。除了野蛮、落后的一面，在文化心理、社群关系上，倒有某些健康成分的底蕴。苦寒的气候，辽阔的原野，艰难的生计，给予女真族以豪勇的性格，强壮的筋骨，质朴的民风，和冲决一切的蛮劲，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刻苦耐劳，勇于进取，擅长骑射，能征惯战。因而在完颜阿骨打这个女真族的矫健的雄鹰的统驭下，铁骑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强大对手。十一年间，消灭了立国二百零九年的辽朝，而并吞已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的北宋只用了两个年头。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蒙元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北宋时期，高度发展的中原文化，对女真这个北方游猎民族的吸引力和融摄力是巨大的。灭辽侵宋，是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捩点。金朝的君主们逐渐地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要巩固已有的统治地位，进而统一全国、君临天下，还须在创建剑与火的赫赫武功的同时，及时而有效地饱吸汉民族的文化乳汁和历代中原王朝治国驭民的经验。使臣往来，战争推进，为他们了解汉文化提供了契机；政治中心的南移，大量女真户的内迁，也为民族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靖康之变”，随着北宋王朝的倾覆，徽钦二帝的被掳，大量的中原文物尽入女真铁骑的囊橐。从显型文化范畴的礼乐、仪仗、典籍，到隐型文化范畴的封建等级制度、儒家正统观念以及排场、阔气的贵族生活方式，都

受到了女真统治者的倾慕。他们并没有愚蠢地把中原文明付之一炬，而是毫不迟疑地主动地接受了汉文化的浸染与熏陶。

金初，出于对文化载负者的敬重和对汉文化的认同，采取了“借才异代”的特殊政策。他们多方延揽中原的知识分子，曾派专人赴山西访寻北宋名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的子孙；还移文河北各州县“搜索举人”。对于由宋入金的使者，特别是硕儒文士，他们都设法挽留。为了网罗人材，金太宗天会元年开科取士。汴京城破，金廷明令戒杀儒士，说“秀才懑懑，忠孝为国，不要杀他”。其时，举凡文字的创立，教育、科举、官制、典章、礼仪的实施，都大量吸收了汉文化的元素。在最高统治者的带头倡导下，通过与汉文化的融合，不仅使金源文化的形态与结构得以迅速改观，而且促使政治、经济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帝国的成熟起了催化作用。当然，其间也包含着一定的负面效应。

太祖之孙、金代第三个皇帝熙宗完颜亶，幼承燕人韩昉和中原儒士教诲，“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他见到女真旧臣，竟目为“无知夷狄”，而这些旧臣则说他“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登极后，出巡燕京，长达一年零五个月，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古老而丰富的幽燕文明，包括中原皇帝威仪万方的无上尊荣，汉族士子诗礼蔚然的儒雅风流，楼阁的巍峨，弦歌的优美，街市的繁华，生活的潇洒，都使他如饮醇醪，如痴如醉，既娱悦了身心，又大开了眼界。

历史上，从陈胜到刘邦，这类草莽英雄初践皇位时，都曾遇到过如何制定礼仪以建威严的现实问题。陈胜刚称王，原来一起佣工的伙伴跑来要见他，门卫不给通报，他们便拦住陈王的车并大呼他的名字，没奈何，只好载上车一起回来。进了王宫，看到

宫殿陈设，这些人又指手划脚，闹闹嚷嚷，惊羡它的华丽。不仅随便进进出出，而且讲些陈王的旧事。为了维护王者的尊严，陈胜接受侍臣的建议，把他们杀掉了。结果呢，"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刘邦当了皇帝，虽然也遇上类似麻烦，但由于有知识分子帮忙，情况大不一样。当时群臣喝醉了酒，个个争功邀赏，有的狂吼乱叫，有的拔剑击柱，弄得高祖十分烦苦。儒生叔孙通于是依先王旧制，明尊卑之序，定君臣之礼。礼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那些共同起事的将领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我才领略到当皇帝的尊贵呀!

熙宗同样尝到了这个"甜头"。在燕京期间，接受群臣所上封号，初御衮冕，始备法驾，共用七卒一万四千零五十六人。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以宫室之丽、府库之盈，服御之美，燕乐之侈，妃嫔之盛，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回去后又在会宁府大修宫殿、亭台，社稷、太庙；始设仪卫将军，始有内廷之禁，始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大臣勋戚要到规定时间方得朝见，拜伏墀阶，迥分霄壤。确立了皇帝的专制威仪，摈弃了建国之初君臣、尊卑、贵贱混同的礼俗。前此，熙宗曾发布过禁酒令，这时却嗜酒如命，以至宴饮辍朝，日以继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先喝足了酒，明天再说。侈靡为政，理无久享，后被觊觎皇位已久的海陵王完颜亮谋杀，抢班夺权。

完颜亮也是太祖之孙，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父宗干为熙宗朝推动女真族学习汉制，改革女真旧俗最力的权臣政要。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完颜亮，掌权之后自然会在女真汉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子。迁都燕京是其决定性的一步。这一举措，表明了他以最大的决心，主动介入汉人

居住地区、与汉族地主、官僚进一步结合，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彻底同女真旧势力决裂，走中原封建制的道路。

在改革旧俗、推行汉化方面，海陵与熙宗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之间也有某些差异。熙宗与南宋两次议和，眼光由对外转向对内，致力于社会改革，特别是礼俗、官制的改革。而海陵在中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加上女真奴隶主贵族固有的猛悍、凶残的性格特征，自幼便把当秦始皇式的中国正统皇帝、统一全国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他野心勃勃，傲睨一切，而且贪残暴戾，荒淫无度。所为诗词，雄鸷、峻厉，铲尽浮华，语语本色。有《鹊桥仙·待月》词："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逼真地再现了待月不至和由此引发的内心活动，一种剽急强悍、不可一世的蛮野之气跃然纸上。为藩王时，曾为人书写扇面，有"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之句。还有一首咏竹诗："孤驿萧萧竹一丛，不同凡卉媚东风。我心正与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书壁述怀》的七绝，也是假物言志："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都是这一代枭雄急于位登九五、君临天下的心态的展露。发动侵宋战争之前，他派遣画师随同使臣去南宋都城，嘱其秘密绘出临安的湖山、城郭图。回来后，令作画屏，并图己像策马于吴山绝顶，然后挥毫题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这些诗句都露骨地展示了他的政治野心，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封建文化在他身上的深重影响，以及他对汉文化掌握的熟练程度。

但是，完颜亮的政治狂想并没有实现，最后以自身的毁灭而

告终，完颜雍取而代之，是为世宗，他也是太祖之孙。世宗对海陵南迁和女真汉化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深感不安，担心长此下去，女真族的子孙后代会“数典忘祖”。接受前朝教训，为了笼络宗室贵族，他即位伊始，即恢复上京名号，重建宫室宗庙，并亲临上京会宁府巡幸，同据守在上京的女真守旧势力一道，排演了一出怀旧复古的大合唱。开展各种活动，倡导恢复女真古风。多次下诏禁止女真人改用汉姓、着南人衣装，强调宗室子弟说女真话，学习本民族文字。一次，南宋贺生辰使到达燕京，按惯例有宴射活动。宋使射中五十，而金廷卫士只中其七。世宗当场批评他们“饱食安卧，专务游惰”，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实际上，这种偃武修文的风尚恰恰是由几代皇帝带动起来的。原来，在汉化方面，金朝与辽朝有所不同。辽朝吸收汉族士子，主要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在于文化。在金朝官场，汉族士子于吏治无多建树，只是在诗文方面大显其才，金廷看重他们也主要在文学上。海陵、世宗、章宗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带头吟诗填词，无疑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成为风行全国的“诗教”，从而逐渐形成劲健的尚文崇儒风气。这在当时，也曾激起一些女真军事贵族的强烈不满。一天，世宗正在与诸王、大臣赋诗唱和，著名军事家兀术的儿子、武将完颜伟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不满，闯进去叩首直言，说，我们国家起自漠北，君臣将帅凭借着武力与雄略，得以灭辽吞宋，诸番慑服。近年来辽宋亡国遗臣，以华文丽彩坏我土俗。现在用兵已经不如昔时，可是皇帝只是让文士朝夕在侧，却从不谈论兵事。当前，南宋志在报复，蒙古不受调役，西夏亦复侵边，陛下抛开战斗之士谓其不足与语，难道要靠那些玩诗弄词的人去抗敌吗？这一席悻悻之言，充分暴露了一些军事贵族的久积胸臆的愤懑情绪。

应该说，从女真贵族集团的切身利益出发，世宗的忧虑，武将的不满，都不是无谓的。尽管以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和认知能力，不可能解读深藏其中的文化价值哲学的底蕴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但直观的感觉在提醒着他们：作为胜利者，女真族在充分获取、享用文化硕果的同时，正在渐渐丢失一些固有的东西。是的，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会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祖祖辈辈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质朴的种族来说，无疑是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考验。作为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他们当然不能忽视在民族素质、文化情境、社会心理方面如何扭转文弱的趋势，克服晏安的积习，战胜礼教的侵蚀这样一些至关重大而又无法回避的课题。说来道理也很简单，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一方面，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时地接受一定文化的传播，又必然不时地摈弃着某种文化；另一方面，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这种文化的悖论，似乎有意地给人类开玩笑，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有时正好与原初的目的、动机相悖逆，所谓"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里想到十九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则轶事。在沙皇亚历山大的亲自率领下，俄军与奥、普等反法联军一起追击拿破仑的部队，驰骋在欧洲大地上，并以胜利者的身份进驻了巴黎，算是彻底打败了法国。可是，当俄军从法国凯旋归来时，却已被那里的新的思潮所浸染。战士们回到俄国，见到乡村里依然盛行着农奴买卖和严刑体罚，不禁为之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抗议。这又是沙皇亚历山大始料所不及的。

这也说明，弥漫于金廷上下的种种忧虑是无济于事的。一种

文化世界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作为一种超越自我的异己力量客观地存在着，它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金章宗完颜璟是他的祖父金世宗在世时亲自指定和培养的继承人。完颜璟由金源郡王晋封为原王，以女真语入朝谢封，世宗力倡女真旧俗，见状大喜，对群臣说，朕曾诏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习之最力，朕其嘉之。可是，正是这个原王，即位后，大倡文治，崇尚儒雅，“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正是这个原王，推行汉化最坚定，也最见成效。正是在他当政时期，最后完成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这里反映了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人侵宋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它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又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从这一点来说，却又是文明的征服。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文明征服的结果，是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化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就从建国之初尚无文字发展到大定、明昌之际文化上的巨大跃迁，以至“自树立于唐、宋之间”，以文治见称于史。有金一代，不仅诗词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院本杂剧与诸宫调也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放出了异彩，为北曲和元人杂剧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通过异质文化的融合渗透、优势互补，更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契机与活力，形成了兼收并蓄，集多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

写作这篇文化随笔，我感到很累，现在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呜呼，遐方禹域，依旧是天淡云闲，铁马金戈，都付与

荒烟蔓草。谁是最后的征服者？不是拿破仑，不是亚历山大，也不是完颜三兄弟，而是文明。

陈桥崖海须臾事

现在有种说法叫作"跟着感觉走"，而我出外旅游、寻访古迹，却常是跟着诗文走。这究竟是源于对历史情有独钟，发思古之幽情，还是像尼采说的存有过量的历史意识，常常不自觉地沉湎于过去的经验，一时说不清楚。反正由于脑子里装有无数诗古文辞、清词丽句，几乎同任何名城胜迹都能攀上关系，找到瓜葛。因此，每到一处，就有相应的诗文浮上脑际，任我去联想、发挥，我也习惯于从那些诗词名句中发掘着沉甸甸的记忆，寻觅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于是，生命的欢喜与悲哀在这里就有了诗性，有了超出时空的神力。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诗文中的实境的探访。那种情怀的热切，大概不亚于思念故乡、怀想亲友、眷恋情人，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样是被一些古代诗文典籍牵引着。记忆中，前人何希齐有这样两句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它把我引到了开封附近的陈桥驿。漫步古镇街头，想到诗中说的，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崖州沉海自尽，宣告宋朝灭亡，三百多年不过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看看大千世界，依旧是天淡云闲，仿佛古今都是一样，不禁感慨系之。有人评说，这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自是夸张之言。但发人深省，令人联想许多问

题，却是实在的。

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人们怎样冀求长久，渴望永恒，但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得到的却只能是瞬息。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堕入一种莫名的失望和悲凉。但这又是难免的，因为只要生活在具体的时空里，每一个个体的人与事就会显现出它真正的渺小和空幻。为了摆脱这一根本的局限性，超出生命长度，寻求无限，奔向永恒，无数英雄豪杰费煞移山气力，耗尽无涯岁月，到头来总不免望望然而去。大约只有在宗教和艺术的幻想中，才可能侈谈绝对的“超越”。一切复活都在回忆之中，一切绝对的“超越”都在想望之中。

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晚年写过一部《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三段《说秦汉》部分的开场词，是一首《临江仙》词，上阕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述史兴怀，抒写由历史嬗变所引发的人生感慨。它化用苏轼《赤壁怀古》的成句，巧妙地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江水滔滔，今古无异，而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却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诗人纵观历史，反思世事，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无数豪杰英烈，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诗人对历代的盛衰兴亡、千古英雄成败的彻悟，与何希齐的充满哲理性的感慨可谓异曲同工。当然，他并不是无谓而发的，里面渗透着他从自身的遭际中获得的教训。

杨升庵出身于中国封建后期四川新都的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父亲为内阁大学士，一朝宰

辅，元老重臣；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一门四代进士及第；他自己二十四岁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十二年。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武宗去世后，世宗即帝位，因是以同辈庶兄弟身份继统，发生了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大礼仪”的激烈论争，杨升庵因站在父亲一边，力主应承认皇统，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事后又纠众撼门恸哭，触怒了世宗皇帝，两遭杖刑，死而复苏，被远谪云南近四十年，转瞬间由权力的峰巅跌入了生活的谷底。这种政治上的起落颠折，对他的打击无疑是极大的。

但是，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似乎命运总是在捉弄人，如果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则对人间万事尽可以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恰如他在《临江仙》词的下阕中说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他也会感到，当年拚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大礼”，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是非成败真的转眼成空了。

可以说，这首词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适情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一切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渡过了漫长、凄苦的谪戍生涯，得以终其天年。而且，由于投荒多暇，于书无所不读，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作出了卓越贡

献。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失败造就了他在学术、创作上的成功，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上的收获，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换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可是，正如古人所慨叹的："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漫步古镇陈桥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代枭雄宋太祖赵匡胤。"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纵横捭阖，睥睨一世。他以殿前都点检的军事统帅地位，自后周世宗柴荣之妻和年仅七岁的恭帝手中夺得了天下，随后又灭了南唐，唯一的理由是卧榻之旁容不得他人鼾睡。他在皇袍加身，政局稳定之后，曾问谋臣赵普：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兵连祸结，原因何在？赵普说，只是因为方镇权势太重，君弱臣强。要治国，就必须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谷。他说，我懂了。于是，第一步，便是下令免除慕容延钊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实行了第二步棋：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屏退左右侍从，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出力，到不了这个地位。但是，做皇帝也太艰难了，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活，整个晚上都不能安枕而卧啊！群臣自然要叩问原由，他便接上说：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虽然你们没有异心，然而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汝等虽不欲为，岂可得乎？石守信等听罢泣谢叩头。太祖就势开导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望者无非广积货财、多享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而已。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去地方任职，多买些良田美宅、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以乐天年。大家见皇上说得如此直白，便连连谢恩。第二天，石守信等都上表称病，要求解除兵权，太祖欣然同意。

同时，委派文官取代武将担任地方长官，以解决方镇难制问题；并削弱宰辅权力，形成互相牵制的机制，最后达到一切权力集于皇帝一身。

为了赵氏王朝的万世一系，这位开基创业者可说是虑远谋深，“机关算尽”。岂料三百年后，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谢太后和刚刚七岁的宋恭宗，不得不逊位于元世祖忽必烈，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的命运。元人有这样两首七绝：“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刘因：《书事》）“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北客：《宋太祖》）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这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走进原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开封市区，空间没有跨出多远，时间却仿佛越过了千年，真有那种“一步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觉。整个古城，简直就是一座充满历史回声的博物馆，古色古香，典雅凝重，这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是独一无二的。闲步街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可以说，每一条街巷都深藏着一段生动的史实，每一处古建遗址都埋伏下一个迷人的故事。

我以为，一个朝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是深刻还是淡漠，未必和这个朝代的久暂成正比例，往往同事件的密集程度相联系。比如三国时期不足五十年，可是人们却觉得历时久远，就因为事件特别集中，沸沸腾腾，异常热闹。宋代属于又一种情况。由于《杨家将》、《包公案》、《说岳全传》等作品流传广远，深入人心，在人们印象中，宋代尽多忠臣良将、英烈豪杰，一派治平景象。其

实并非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经济发展达到了巅峰，但已开始走下坡路，包括创业伊始，那些所谓圣帝贤王，也并无太大的治绩。走笔至此，我倒想起一则轶事：宋初道士陈抟乘白骡入汴州，途中闻赵匡胤登基，高兴之极，忘乎所以，以致从骡背上滚了下来，并说："天下于是定矣！"其实，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乐观。北宋刚取得政权时，其统治区域只限黄淮流域一带。当时还有辽、北汉等几个割据政权。太祖、太宗两代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遭惨败，不得不完全采取守势。真宗朝，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州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就是说，终北宋之世还是祸患频仍的。

宋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兼为古代中国修文之高峰与武备之谷底。朝廷采取"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对内严加防范，不准民间习武，对外消极防守，尽管兵员很多，却毫无战斗力，导致国家积贫、积弱，无力抵御辽、金、西夏的不断侵扰，由"奉之如骄子"到"敬之如兄长"，最后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马哥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说："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东京梦华录》作者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

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太祖、太宗原是十分厌恶玩物丧志，而且恭行节俭的。"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宝装溺器，掷之于地，令杵碎之"，并气愤地说，"汝以何器贮食？不亡何待？"太宗也是"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但是，由于建国后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蓄养歌僮舞女以自娱，尔后这种风气逐渐在社会上弥漫，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以饮酒赋诗为乐，喜会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这在一些文士中也是比较普遍的。晏殊之子晏几道在他的《小山词》跋中说："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从这里也可以窥见当时上流社会酣歌醉舞，娱乐升平之一斑。从北宋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

在内忧深重、外患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有这样一首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据说徽宗赵佶私幸李师师即在此处。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刘昌诗的上元词："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其中已隐

伏危败之由。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淫侈之风推向极致。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说过，赵佶"自即位以来，骄奢淫佚，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六年时间，修起一座既有山林池沼、亭台楼阁，又有奇花异石、珍禽异兽，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汽，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他们还专门找人驯服各地进贡的珍禽，皇帝驾临，几万只鸟一齐放出接驾。赵佶高兴万分，大加赏赐。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奢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综观有宋一代的兴衰史，益发相信鲁迅先生的警辟的睿断。他说，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讨债的杨广紧跟还债的杨坚脚后出现，隋朝二世而亡；赵匡胤创业一百四十年后才出现赵佶这班"讨债者"，此亦北宋不幸中之幸也。

汴梁城毁于金人战火，加上后来几次黄河泛滥，致使往日的

千般绮丽，万种繁华，一股脑地被深埋地下。前面说过的那座“州桥”，宋代时天街贯穿南北，备极繁华之盛，不然，“青面兽”杨志也不会跑到那里去卖刀。可是，这次我去开封寻觅它时，东道主却说，遗憾得很，它已经隐匿在五米土层之下了。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毕竟是“往事越千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城面貌，乃是清代的孑遗。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的女主人公重回故地桑菲尔德府，目睹物是人非之惨景，曾喟然叹道：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尽管这话很警辟，但其实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也在变化。一千多年前，李白慨叹汉代的梁园转瞬成灰，有诗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说的是山河犹是，人事已非。于今，不要说梁园、万岁山，连那滔滔滚滚的汴水也已荡然无存，淤为平地，只剩下“汴水秋声”四个字，作为汴京八景之一留存在方志里。

存在与虚无

洛阳号称十三朝故都，历史遗迹、人文景观极为丰富，是我向往已久的去处。这次首先看了汉魏故城遗址。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以此为皇城，共三百三十年之久。都城建筑规模宏大，经济繁荣发达，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流大城市。据记载，城内有纵横二十四条大街，帝族王侯，外戚公主，争修园宅，竞夸豪丽。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阁生风，重楼起雾，极尽奢华之能事。可是，经过汉末董卓纵火焚烧，和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战火的摧毁，早已宫室为墟了。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常有的事。

故城，除南面城墙早被洛河冲毁外，其余三面均有残墙存在，上有十四处缺口，为当时"楼皆两重，朱阙双立"的城门所在地。站在故城遗址上，放眼四望，但见残垣内外长着茂密的白杨，里面围着一方广袤的田野，上面翻腾着滔滔的麦浪。"白杨多悲风"，更加重了废墟的氛围和历史感。废墟是岁月的年轮留下的轨迹，是历史的读本，是成功后的泯灭，是掩埋着悲剧的文化。如果有谁专事废墟研究，我以为，无论如何应该凭吊一番魏晋故城遗址，亲身感受几许壮美后面的沉痛与苍凉。

公元七十九年，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东汉初年，坐落在古罗马东南部的庞贝古城，被突然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埋没了。而后便杳无声息，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被史学家从

古书上发现，却又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相形之下，中国的古都的命运要好得多。据《史记》记载，殷商的遗民箕子朝周，过安阳殷墟，见宫殿毁坏，遍生禾黍，哀伤不已，而作《麦秀》之歌。又传西周亡后，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满眼所见都是庄稼，不禁触景伤怀，遂吟《黍离》之诗。这两首歌诗便成为后世有名的抚今追昔、凭吊兴亡、抒发爱国情怀的佳什。同"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相对应，还有一个"铜驼荆棘"这预言的警语：晋代的索靖具有先见之明，他觉察到天下就要大乱，于是指着洛阳城的两个汉铸铜驼，喟然叹道："人们将会看到你们卧在荆棘中啊！"元人宋无诗云："不信铜驼荆棘里，百年前是五侯家"，说的正是这种沧桑变化。

《容斋随笔》中有这样一则轶事：宋初，工部尚书杨玢的旧居被邻居侵占，子弟想递状告发其事，杨玢在状纸上批了几句话，有"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之句。当时上距唐朝灭亡未及百年，而含元殿就已变成这般模样，简直和《王风·黍离》中所描画的差不多了。看来，沧桑变化毕竟是人间正道。正如苏轼《凌虚台记》中所言：物之盛衰成毁，相寻于无穷，昔者荒草野田，狐兔窜伏之所，一变而为台阁，而数世之后，台阁又可能变成禾黍荆棘，废瓦颓垣。"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当然，洛阳园囿的兴废，更有特殊的意蕴。宋代学者、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认为，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兴废而知。所以，司马光有诗云："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先看洛阳城。"

魏晋时期有两类特别突出的政治事件，一是异姓禅代，曲线谋国，一是同室操戈，骨肉残杀。曹氏、司马氏父子，要比王莽聪明得多，不去效法周公，先弄一通辅翼成王的故事；而是直接

实施异姓禅代，并美其名曰"上袭尧舜"。公元二百二十年曹丕代汉，四十五年后司马炎代魏，以及后来的刘裕代晋，名义上称为"禅让故事"，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残酷、激烈的流血斗争。魏晋递嬗，实现了九十年分裂混战之后的重新统一。但西晋统治集团的骄奢淫佚，腐朽残暴，导致这个王朝仅仅维持了五十二年。特别是标志着统治集团矛盾全面爆发，骨肉相残成为历史之最的"八王之乱"，持续时间之长，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对生产力破坏之严重，在中外都是罕见的。晋武帝死后，白痴司马衷继皇帝位，是为惠帝。阴险凶悍的贾皇后为了让自己娘家人独掌大权，首先处死惠帝的外祖父杨骏，同时召进汝南王司马亮入京辅政，以掩人耳目。不久，又指使楚王司马玮杀死司马亮，紧接着便以"专杀"之罪名处死了司马玮。至此，贾后便独揽朝政，与后党密谋废掉、椎杀了太子司马遹。赵王司马伦乘机入京诛杀了贾后，并从惠帝手中夺取了御玺，称帝自立。引发了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战火燃遍了黄河南北。司马伦兵败被杀，惠帝重登皇位。而司马冏、司马颙、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又互相混战。结果诸王无一善终。看了这一段历史，觉得前人说的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还真有些道理。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特殊，距离皇城后身不远处，东西两侧均为墓区，从城东的乾脯山到城西的北邙山，绵延几十里，到处荒冢累累。原来，这里地势高峻，眼界开阔，下面有可供掩埋那些帝子王孙的"臭皮囊"的深厚土层，四周有山河似锦的自然风光点缀，后头有奔腾不息的黄河滋润，迎面有恢宏壮观的帝京映照，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直到魏晋，帝王将相、王公大臣都选

中了它作为夜台长眠之地。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朝代的皇陵，比邻而依。上上下下，陵寝墓冢星罗棋布。唐代诗人王建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置身其间，确有一种与鬼为邻的感觉。当时我想，正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密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是胜利的、失败的，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被杀的，为敌为友，是亲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凯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隽、痛切。旧籍《癸辛杂识》载录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着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

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事，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併，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痛，知识层也未能远祸。《晋书》上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加上这一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遴选人才大权，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但事物总有两面性，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儒教与经学独尊的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遥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于是，文人学士荡检逾闲，各行其是，粃糠功名利禄，追求自然情趣，注重自我表现，形成了以崇尚老庄，蔑视礼法，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何晏、王弼和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任诞不羁，蔑视礼法，是这种魏晋风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世说新语》中收录了许多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刘伶经常豪饮，任性放纵，有时在屋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别人看见了加以讥

讽。他却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房屋，把房屋作为裤子，诸位先生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阮籍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他喝醉了就睡在这女人身边。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他在行动中毫无顾忌地与礼教对着干。按常礼母丧不可茹荤，他在母丧期间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刺，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他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列举了"七不堪"、"二不可"来说明作了官就会妨碍个性发展和个人自由。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相形，得失相通，成败相因，利弊相关。人的一切社会成功，往往会带来他作为个人的某些方面的失去；而表面上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或许却意味着成功。从社会的角度看，嵇康、阮籍都是失败者；但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又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个问题，如果从政治斗争角度来观察，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与司马氏统治集团斗争的一种形式。鲁迅先生指出，魏晋以孝治天下。因为他们的天位乃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则立脚点不稳，立论既难，办事也棘手，他们倡言以孝治天下，把名教作为剪除异己，巩固政权的工具，充分暴露了这种名教与礼法的虚伪性。阮、嵇公开抨击名教，蔑视礼法，无异于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司马氏，当然要引起当权者的忌恨。正是这个根本原因，使嵇康终于成了他们的刀下之鬼。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鲜血淋漓的教训，造成那些名士、畸人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他们的人生以悲剧垫底，但却表现出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旷达和潇洒，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加之，伴随着旧的权威思想的崩溃，人们在信仰、追求、价值取向方面失去了归依，经常陷于精神空虚与紧张、焦虑、孤独之中，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联系纽带的断裂。史称，阮籍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一次，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看出他内心里郁积着无边的苦闷。他尝登荥阳广武山，观楚汉战场，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自是愤世之言。因为生当乱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这些名士空负英雄之志，而无由酬其夙愿。司马昭杀了狂傲不驯的嵇康之后，为了把阮籍拉进自己身边，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阮籍却不愿攀上这门亲戚，就从早到晚喝酒，醉倒就睡，睡醒又喝，连续醉了60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嵇康与阮籍均不满时政，不拘礼法，但由于性格不同，表现形式各异，因而结局也不大一样。当然，他们作为礼教宗法的挑战者，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思想上呈现多元、混乱、无序、开放状态。这种社会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渐近衰弛，而文学家的思想比较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像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间交流广泛，作家流离转徙，阅历丰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也许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邺下风流在晋多"（元好问诗）。钟嵘说，太康（晋

武帝年号）中，二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间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活跃在文坛上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火尽薪传，群星灿烂。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诸如阮籍的《咏怀》诗和《大人先生传》，嵇康的《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咏史诗》，向秀的《思旧赋》，潘岳的《悼亡》诗，刘琨的《扶风歌》，这些堪称文学史上的代表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古城东市是魏晋时期行刑的场所。这次我特意到旧址去转一转。当年嵇康在这里弹奏过一曲《广陵散》后，便引颈就刑，琴声久久地久久地回荡着。当然，现在是什么也听不到了。有人考证，这个《广陵散》，即咏怀战国时刺客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兼中韩王的古曲。临死时还要奏这种曲子，说明嵇氏胸中愤懑不平之气何等强烈！当时与后世怀念嵇康的诗文很多，但真正撼人心弦的当推向子期的《思旧赋》。在那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的寥寥数语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欲哭无泪、深沉得近于心死的悲哀。其中有这样的话："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竟将区区山阳故居的荒凉，与周室、殷墟之破败相提并论，显现出向秀虽然身仕晋朝却心怀深沉的故国之思。

细语邯郸

车过保定、石家庄，华北大平原便摊开它全部的浩瀚，风驰电掣般地向我涌来。无边的绿野，滔天的麦浪，像特大的电影屏幕一样，不断地更换着画面。顿时，一种雄浑、壮阔、汪洋恣肆的情怀涌上心头。邯郸给予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苍凉、旷远，特别是登上当年赵国都城的著名古迹丛台，临风吊古，不禁感慨兴怀，悠然意远。

史载，丛台乃赵武灵王阅兵观阵，习武宣威，以及歌舞寻欢之地。战国时代，各国竞相修筑此类高台建筑。魏襄王建中天台于大梁，期望达到天高之半；楚国建三休台，含义是至少要休息三次才能攀上台顶。赵武灵王修筑的丛台，自然也是高耸天际的。台上设有天桥、雪洞、花苑、妆阁诸景，连聚非一，各极其妙。"天桥雪洞倚云宵，妆阁名花照罗绮。台上弦歌醉美人，台下橐鞬耀武士。"历代文豪李白、杜甫、白居易、贺铸、范成大、陈孚、王相，直至现代的于右任，游邯郸时，都曾登台赋诗，抒写怀古幽情

两千年后的今天，登上丛台极目远眺，但见巍巍太行西走蜿蜒，雄浑的赵王城残垣在西南部隐约可见，西北便是古赵国的铸箭炉、插箭岭遗址。俯视丛台四周，绿杨深处，车辆梭穿，楼群棋布，街上人流熙来攘往，一派祥和景象。当年的戈戟交辉，云旗委蛇之势，已付与苍茫的历史。高台上下显得寂寥空旷，只剩

下青苔的雉堞，淡绿的苔痕，一任徐缓的清风和悠悠的淡日煦拂着。但历史恰是怪异得很，愈是清虚淡远，往往愈是扣人心弦，令人翛然神往。

赵国定都邯郸，历经八代君主，计一百五十八年。其极盛时期为武灵王当政时代。武灵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甚至说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他北略中山，沟通代道，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的国家。他还在西破林胡、楼烦之后，主持修筑了赵长城，以防备强敌入侵。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以一个小小的赵国，竟能完成这样巨大的国防工程，而且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受到责骂，不能不令人惊叹。不仅此也，他还敢于同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作斗争，锐意改革，运筹强兵富国之策。他考虑到，中山踞赵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虎视眈眈，赵国的处境十分险恶。为了提高战斗力，他带头脱掉宽袍大袖，改着紧身短袖的胡服，练习骑马射箭，变车战为骑战，推行"胡服骑射"。他斩钉截铁地批驳了一些贵族反对更改先王旧制的责难，说：夏商周三代随时制定法规，依事确定礼俗，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所以，治世不必用一种方式，利国不必尽效法古代。况且，先王的礼俗并不一样，要效法哪一个呢？通过他率先变胡服、习骑射，带动了整个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对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古代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惜，对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除了《史记》中有所记载之外，后世的论者很少注意。

"士慕原陵犹侠气，人来燕赵易悲歌。"漫步古都街头，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这两句诗，蓦地在脑际浮现出来。原、陵分别指

赵平原君赵胜和魏信陵君无忌。他们礼贤下士，以善养士著称。用太史公的话说，乃战国时代"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说到原、陵侠气，人们会想到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见诸史书的，则有"窃符救赵"的故实。公元前二五七年，秦军围困赵国都城邯郸甚急。赵相平原君求救于魏，魏王派大将晋鄙率兵十万前往救援，却又惧秦报复，到两国边界处便按兵不动。赵国危在旦夕。信陵君再三请示魏王发令进军击秦，魏王不听。信陵君遂采用大梁城夷门守吏侯嬴之计，设法说服魏王宠妃如姬，窃得皇上的兵符，然后带上勇士朱亥，到前线军中矫杀了晋鄙，夺得兵权，率部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应该说，当时信陵君是担了巨大风险的，但为了行侠仗义、扶弱抑强，甘于履危蹈险。这也正是游侠家的本色。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但到了唐代，韩愈认为，"风俗与化移易"，现时情形将有异于古昔，因而表示了怀疑态度。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更是慨乎言之，有诗云："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这里引用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典故：信陵公子到夷门迎请侯嬴，侯嬴着敝衣冠，径直坐上车中的尊位，毫不谦让，公子执辔愈恭。至家，公子引侯嬴坐上座，并向宾客一一作了介绍，客人都很惊异。侯嬴后来向魏公子献了"窃符救赵"之计，自己因年迈不能陪信陵君赴敌，于送行时刎颈自杀。吴梅村引经据典，吊古伤今，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得宠者多而报效者少，像侯嬴那样以死相报信陵君的义举再也不易见到了。

战国秦汉时期，邯郸不仅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交

通中心，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文化名城。在先秦诸国文化中，古赵文化以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地文化与边地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多元构成，而独树一帜。在古邯郸文化中，音乐舞蹈的普及和学术思想的发达是其显著特点。史载，赵国男子"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弹弦跕屣，鼓琴瑟，遍诸侯之后宫"。赵歌、赵舞、赵鼓、赵曲等，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当时这里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荀况、慎到、公孙龙、虞卿、毛公都曾驻足邯郸，著书讲学。灿烂的文化积存，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了众多文人政客，留下了传颂千古的轶闻佳话，诸如"围魏救赵"、"二度梅"、"渑池会"、"将相和"、"黄粱梦"等故事传说，"毛遂自荐"、"邯郸学步"、"负荆请罪"、"纸上谈兵"、"奇货可居"、"完璧归赵"等成语典故，产地都在这里。

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颇有利于形成燕赵悲歌的人文气质。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文化则是其过程的符号，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连结社会交往的中介。无论它以哪种方式传承，是垂直式的文化继承——积淀，还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作为一种"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必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的制成品。

当然，人作为某种文化的载体，在社会生活中，不仅经常接受着一定文化的濡染，同时又不断地摈斥着某种文化的影响。因此，一定地域的文化构成，总会是驳杂、复合，不可能是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时，就奇异地发现了一种同悲歌慷慨，积极用世相对应的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这要从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邯郸古迹吕

公祠说起。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讲述渴望功名富贵的卢生在吕洞宾所授瓷枕上入梦，梦见与富家女结婚，并因妻子的财富贿赂当道，飞黄腾达，扶摇直上，封侯拜帅，位极人臣。在统治集团激烈的倾轧斗争中，浮沉宦海，几十年荣华富贵，风云变幻，醒来却是一梦，而主人的黄粱尚未煮熟。半生的休咎跌宕，不料一刹那间就完成了，说明富贵无常，人生如梦。吕公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清楚："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皆成梦幻，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邯郸梦与邯郸道，后来成为虚无之事和空幻之路的形象说法。前人有诗云："只因旧日邯郸路，梦里卢生误着鞭。"类似作品还有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叙述士人淳于棼居广陵东十里，宅南有一大槐树。一日醉卧，被二紫衣人引至槐安國国，招为驸马，生五男二女，位至南柯太守，二十多年备极荣显。后与敌战，败北，公主也死去，国王对他产生了疑忌，遂被放归。醒来方知是一场梦。入梦时朋友正在一旁洗脚，醒来还没有洗完。踪迹蚁穴所在，一一与梦中所历切合。从而悟出人世倏忽、荣辱无常之理，于是出家作了道士。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根据这两篇传奇，写成戏曲《邯郸记》和《南柯记》。由于都是通过梦境展开情节，连同另外两部戏曲，被称为"临川四梦"。到了清代，蒲留仙在《聊斋志异》中写了《续黄粱》，主旨大致相同。这类故事源于释道的出世思想，也有人目为"酸葡萄心理的产物"，就是说，是渴望荣华富贵而终于不能得的人写的。总的说，基调有消极的一面；但因作者是以否定的态度，通过梦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和士人们对功名利禄的热衷追求，客观上具有揭露作用，讽刺意味和一定

程度的认识价值、警世效果。有些人确实把个人的名利得失、荣辱升沉看得过重，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如果他们能读一点庄子，理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把浮名浮利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淡些轻些，就可以减去许多无谓的烦恼。

闲翻古籍，看到关于宋代权奸、号称徽宗朝"六贼"之首的蔡京的一则资料。蔡京被贬南迁，"道中市食饮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之，稍息。京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后数日卒。"应该说，是这么回事，但又不尽然。他不只是贪恋荣华，而是作恶多端，才有如此下场。

小时候听父亲说，他每次回老家大名府，路经邯郸，总要到黄粱庙去转一下。我还听他讲过，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吕仙祠，带着一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诗："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先生借枕头。"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更惨，最后因事入狱，一病不起。说到这里，父亲读了一首自己唱和陈潢的诗："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吟罢，他又补充一句："还是阮籍说的实在，'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呀！"

我想，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这可能是偶然的。但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和谐地融汇到一起，却颇

为耐人寻味。因为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为道义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他们和儒家同是主张进取的，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道家，各有旨归，各异其趣。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是互不相容，彻底分裂的，不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而且会在不同阶段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

其实，积极用世，热心进取与消极避世，任情适意这两种心态的形成，或者说这两种价值观的建构，同人们的年龄、阅历和处境也有很大关系。我父亲在年轻时，热心进取，任侠好义，迨至后来家道凌夷，亲丧子殒，一变而为心灰意冷，转向寄情山水，顿有看破红尘之感。这也算是一个显例。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老翁的答复是"坟场"；而女孩却说是鲜花，"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应该说，他们讲的都对，却都只是一部分。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入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映。

狮山史影

说起彩云之南的风景名胜来，人们会滔滔不绝地讲滇池，讲大观楼，讲石林，讲西山，讲苍山洱海，讲西双版纳，可是，十有九人忽略了滇中北部的武定狮子山，令人不免有遗珠之憾。其实，狮子山不仅风景绝佳，而且颇富人文价值。我在这里住了两天，仅仅看了三大景区中的一个角落，但已觉得充盈丰满，美不胜收。应该承认，这对一个景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

狮子山素有"雄奇古秀"之誉。在一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的风景名胜区内，有四分之三面积覆盖着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登高远望，但见翠海接天，不知何处是岸。穿行其间，两侧有寒流喃寒，古树栖云，纵使外面溽暑炎蒸，燎肌炙肤，此地依然清爽异常，确是理想的避暑胜地。林间草地上，山花野卉，姹紫嫣红开遍，引逗得蝶舞蜂喧，把一个寂静的山陬装点得霞拥锦簇，生意盎然。

我想，若说幽邃、僻静，风景宜人，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绝少污染，同时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很像川西北的黄龙山、九寨沟，也很像湘西的张家界。不同之处，是这里拥有无比丰富的历史积淀、人文景观，而且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传说遁入了空门的帝王的行止、出处展开的。这倒又一次为"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山上的正续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始建于元代。当时，似

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同明惠帝，即传说流亡出走的建文帝发生了联系，从此，便闹得沸沸扬扬，数百年持久不衰。漫步山中，几乎随处可见隐匿于此的建文帝的踪迹。进了山门，就看到迎面照壁上绘有“建文逊国”故实的大型壁画。如果说，这是近年弄出来的，不足为贵，那么，大雄宝殿前，那株树龄超过五百年、传为建文手植的孔雀杉，就非同凡响了。在天王殿的南侧，还有一处名为“帝王房”的宅院，顾名思义，乃是建文栖迟之地，院内也有他的手植柏。转到后山，在山半腰的林木葱茏处，隐约可见一处朴陋的建筑物，名曰“龙隐庵”，据说这里原是明廷搜索期间这位流亡皇帝的临时避难所。此外，陪同人员还一一指点了建文帝亲手栽培的白牡丹、虎头兰和木芍药。见我有些疑惑，他随手递过来一本古籍，名为《纪我所知录》，作者为罗养儒，中载：“建文住正续寺亦积有年，乃于寺之佛殿前植木芍药二本”，“此花在云南颇少，唯见鹤庆之朝霞寺内有此佳种，建文当日或由迤西移其种而来也”。说得凿凿有据，不容你再作无谓的怀疑。

最引人注目的是藏经楼下的明惠帝祠阁，有丹墀、品级阶、九龙口，呈帝王宫殿式样，内有于康熙七年雕塑的建文帝身披袈裟、坐九龙椅的塑像。阁门抱柱上，两条蟠龙作一升一降状。当场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分别隐喻位登九五的朱棣与遁迹空门的建文；另一种说法，象征着建文帝由天子沦为庶人的起伏经历。阁外廊柱上嵌有三副长联，都是充满诗情、理趣、禅机的史家上乘之作。其一曰：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

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寥寥四十二字，隐括了明初朱元璋、朱棣、朱允炆祖孙叔侄三代君王的行藏、史迹与传说。

上联说的是祖孙。所谓“僧为帝”，是指朱元璋，他家世贫苦，十七岁投皇觉寺为僧，手持木鱼、瓦钵游方化缘，过了三年“乞丐”生涯，又回到寺里，此时，皇觉寺已遭火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以骁勇机智为子兴所器重。朱元璋善于用兵，战功卓著。经过十几年的征战，一步步扩充实力，剪除群雄，略地南北，最后，扑灭元朝，作了皇帝。

为巩固皇权，朱元璋一手剪除了国初的功臣、宿将，一手定立了分封诸王制度，而这后一手却为日后皇室争权埋伏下了隐患。明初，封建诸王分内外两线，有的分封在内线，如太原的晋王、西安的秦王；有九王分封到边塞前沿，主要是防止蒙古侵扰。其中以燕王朱棣势力为最强大。允许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也交给他们一支护卫军和指挥当地驻军的权力，目的在于监视各地的异姓功臣，防止他们有变。后来，诸王权力越来越大，多者兵力达万余人至“带甲八万，战车六千”。燕王、秦王、晋王都曾屡次带兵出征，节制沿边诸将，权势日重。

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曾直言进谏，说：朝廷给诸侯王的权力过大，要警惕出现下强上弱，指挥不灵的局面。如不早作措置，等以后再去减地削权，便会引起诸侯王的怨恨与反抗，像汉朝的七国、晋朝的诸侯那样，或据险自守与朝廷抗衡，或率先入京制造叛乱，到那时就无法控制了。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过虑：那些人都是当前的皇子或未来的皇亲，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可是，

七国诸侯王于汉景帝皆为至亲，不是照样作乱吗？由此可见，分封制弊端甚多。昔日贾谊奉劝汉文帝尽早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希望皇上及早采取措施。本来这一建议特别富有远见，而且提得及时，可是，朱元璋听了却非常愤怒，认为他居心叵测，有意挑拨关系、制造混乱，嚷着要把他杀死，最后，终于将他击死狱中，此后就再也无人敢进谏分封一事了。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活了七十一岁。他去世前六年，太子朱标病故。没奈何，不得不向皇太孙朱允炆交班。诸叔王根本不把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凭借手中的雄厚实力，言多不敬，行辄越法，使这位皇太孙的帝位受到巨大的威胁。一天，燕王入宫，从皇帝专用御道上殿，而且，面君时不叩不拜。监察御史曾凤韶控告燕王对皇帝"大不敬"，建文帝说，都是亲人，不必追究。户部侍郎卓敬密奏建文帝说，燕王聪慧过人，酷似先帝。而北平向为强悍民族聚居之地，（金、元两朝都从北平发迹。应速将燕王改封到南昌，以绝后患。建文帝却说，燕王与我乃亲生骨肉，何至于此！卓敬问道：难道隋文帝与（杀害他的）杨广不是亲生父子吗？建文帝沉思良久，说：爱卿不必再提此事。

燕王朱棣为朱元璋第四子。从青年时代起，即跟随他的父亲进行反对蒙元和巩固明王朝统治的斗争，驰驱疆场，战功卓著，成为诸王中的实力派、佼佼者。面对诸叔王，特别是燕王声威日烈的局面，朱允炆越来越认识到形势的严重。燕王返回北平后，他即派都督耿瓛掌管北平都司业务，又安排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都是为了监视燕王府的动静。当事态进一步发展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接受了齐泰、黄子澄等谋士的意见，颁布了削夺诸藩的诏令。这使燕王朱棣得以援引《皇明祖训》，以讨

伐奸臣、“清君侧”为由，挥师南下，入京“靖难”，从而爆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争夺皇位的内战，史称“靖难之役”。

朱棣攻占南京，登了帝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明史》记载：“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而成书早于《明史》八十多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记为：建文从地道出逃，余者从水关出城。鉴于多人聚集多有不便，只留三人在建文身边。他们乘船经吴江、京口，过六合，而后陆行，取道襄阳，最后到了滇南，又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经常往来于云贵之间。整个过程，建文都是穿着袈裟，以僧人身份出现的。联语中说的“帝亦为僧”，本此。

乃祖僧为帝，阿孙帝作僧，这倒不是朱家与佛门有特殊的夙缘，更非一场简单的历史性游戏，其间有制度方面的深层的种因和时势背景。那位以撰写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闻名于世的清代诗人孙髯翁，在《登狮子山吊建文帝》一诗中，有“滁阳一旅兴王易，建业千官继统难”之句，凭吊兴亡，感慨无限。而清代大诗人、史学家赵翼则从更深层次上进行剖析，有诗云：“乃留弱干制强枝，招乱本由洪武起”。联语中“正觉依然皇觉旧”，分别讲了孙儿与祖父出家的处所。（建文在正续寺为僧，“正觉”隐括正续寺。）这也并非闲笔，里面同样寓着褒贬，从中看得出作者的倾向性。

这在下联就更明显了。下联是拉出叔侄来加以评断。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取了政权，因此，联语中“叔负侄”云云，容易理解。那么，“侄不负叔”又当作何解释呢？我以为，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根据：燕王朱棣起兵后，曾多次遭遇危险的处境，有一次他单身一人被朝廷的军队百余人围住，但没有一人去捕捉和伤害他。

因为建文帝曾向部下交代，双方交战，不可伤害燕王，以免背上杀害叔父的恶名。此其一；其二，当靖难军攻进京师时，建文帝尽管逃身在外，也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实力的。其时江南一带基本上还是他的天下，辽东仍控制在朝廷手中，孙岳、铁铉、梅殷等几个心腹重臣分别据守凤阳、山东、淮上，旦夕间即可开赴京师，举兵勤王。民间有个说法，建文帝为了解除内战中黎民之苦而甘愿逊位于叔父。这当然是臆测之说。但二百四十二年后，南明福王追谥建文为"让皇帝"，又似乎为此种说法提供一个佐证。

"四十载衣钵相传"，讲的是祖孙递嬗，系从时间上纵论；而"八千里芒鞋徒步"，则是讲建文帝的亡命行程，系从空间上展开。从史书中可以得知，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最先是由朱棣一锤定音的，他在诏书上写道："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焚"。后来官修明史便据此作了记载。在朱棣看来，若是建文帝真的死于宫中大火，这是最理想不过的。不仅可以减轻他继承大统时舆论上的压力，而且也消除了前朝复辟的后顾之忧。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只要这个皇侄还活在世上，就无异于树起一面神圣的旗帜，埋下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对他的皇权统治随时都会构成威胁。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相信建文已经死去。他在永乐三年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在域外侦探建文帝下落。《明史》上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从永乐五年开始，又遣侍从亲信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察仙人张三丰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暗察建文藏身之地，足足奔波了十年。永乐年间，成祖曾多次命礼部榜示天下，申明僧侣、道人"俾守清规，违者必诛"；还以对照度牒的办法，对出家人严加巡查。朱棣以篡弑夺位，当了二十二年皇帝，自始至终，都被这个侄子的疑踪搅扰着，说来也是堪笑又堪悲的。

至于建文帝出亡究竟去了哪里，至今史学界也没有定说，可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在近不在远”，认为建文帝一直藏身于苏州吴县的穹窿山皇驾庵，其庇护人竟是曾辅佐朱棣得天下的和尚道衍（即姚广孝），有皇驾庵的碑刻资料为证；并考证，穹窿山拈花寺后半山坡上的当地人所称的“皇坟”，即建文帝的陵墓。有的则坚持“流落滇黔说”，认为武定狮子山即其定居地之一。我在武定访问期间，为了揭开这个历史上的疑团，或者说，要为流落滇黔说多找到一些史证，没有满足于狮子山一带的传说中的遗迹，我曾走访了史志办、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可惜所获甚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清初《武定府志》的记载：“帝（建文）乃先入蜀，未几，入滇。虽往来广西、贵州诸寺，止于狮子山正续寺者数十年”。清乾隆时檀萃著《武定凤氏本末》一书，也有“让帝遁荒至滇，黔国公送之凤氏所”的记述。但即使这些资料，也都是事隔二三百年之后的往事钩沉了。

资料缺乏，载记寥寥，这原是容易理解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淹没无闻。何况，有明一代，以至清初，很多时间它都被当作一个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过，就我闻见所及，痛骂建文帝的还没有，这对这位倒霉的流亡皇帝来说，也算是够幸运的了。

我从史书及方志中抄录了一些传说是建文帝遁迹禅林后的诗篇。其中有这样一首七律：“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金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当是初入空门时所作。尽管诗的文学价值不高，但确是一种真情的流泻。那天，我漫步在狮子山的林间小径上，目注隐现在“云标”中的寺庙，默

诵着建文的述怀之作，觉得他虽然已经侧身缁流，但对于往日的凤辇龙袍、早朝陛见，仍流露出丝丝缕缕的眷恋，未能完全释然于怀。

后来，这位流亡皇帝经过南北东西的流离颠沛，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虽然未能如太上之忘情，脑子里有时仍然浮现着朝元阁、长乐宫的影子，但一切一切毕竟已经是梦幻、泡影了。这种情怀，充分反映在他的晚期的诗作中："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忽忽几十年过去了，松风吹白了鬓发，山溪涤荡着尘襟。"绝顶楼台人倦后，满堂袍笏戏阑时"。旧梦如烟，岂堪回首：风光不再，漏尽灯残。漫步山野间，这位白头老衲不禁慨然低吟："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这里与其说杂有某些颓唐之气，毋宁说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之后的一种智慧与超拔，是经过大起大落的一种高扬的澄静。后人也许正是根据这番诗意，撰写了一副对联刻在"建文祠阁"的廊柱上："沧桑变太奇，可怜一瓶一钵一袈裟，忽忽把君王老了，直到那华发盈头、面目全非，听夜静钟声、皇觉始归正觉；黄粱梦已醒，回忆走东走西走南北，处处都荆棘丛生，何如这昙云满地、庄严自在，看潭澄月影，帝心默认禅心。"

由于建文帝的下落是个极为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永乐年间被视为一个禁区。当时，本来知情者大有人在，但是，"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人人都噤若寒蝉。明代中期以后，禁网渐疏，朱棣的后代已不再担心流亡皇帝会复辟，于是，士大夫中开始有人议论建文轶事，自正德朝之后，甚至有人上书

请求为其追加庙号、谥号。就是这时，记载建文帝行止的书陆续出现。其集大成者为刊行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以专门一章系统记述了建文帝出亡过程和流落西南各地的行迹。因为作者谷应泰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史学家，而且这部书又被收入《四库全书》，有"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之誉，所以影响甚大。

但是，到了康熙十二年"朱三太子案"出现后，人们又开始讳言其事。京师有个叫杨起隆的人，诈称是崇祯帝的太子，谋划放火起事，事泄逃走。这在当时是绝对忌讳的。因为如果有明室的嫡裔子孙在，就可以系故臣遗民之望，可以为反抗新朝者资为号召。所以清廷遇有称为崇祯帝之子的人，一概断为伪冒而格杀勿论。议论建文之事，颇有借古喻今之嫌，因此人们都避开这一话题，有的则直接指斥出亡说之谬妄，以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自然受其影响。王鸿绪在《明史稿》及《史例议》中大放厥辞以谄媚时君，明史馆修撰之臣希旨迎合以定建文焚死宫内，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到了乾隆末叶，明亡已逾百年，朱三太子被获处死也过去了六十多年，朝廷已不再担心明室嫡裔复辟的事，于是在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把"建文焚死"改为"棣（永乐帝）遣中使出后（皇后）尸于火，诡言帝尸"。（见修改后的定本"四库本"明史。）乾嘉之际的赵翼在《金门川怀古》诗中，有"一领袈裟宵出窦，九江纨绮夜翻城"，"从亡芒履千山险，骈僇欧刀十族空"之句，坐定了出亡之事，并敢于议论永乐帝惨酷杀戮建文遗臣的暴政，也证明了这一点。

联语中"狮山更比燕山高"一语，寓意十分丰富而深刻。它涉及到建文帝与永乐帝的历史评价问题。这里的"狮山"借代建文，"燕山"指的是永乐。作者采用这种句法，是从唐宋诗人那里学来

的。唐人罗隐评价光武帝与严子陵，有"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的诗句。范仲淹则把东汉开国功臣拉出来和严子陵对比，结论是："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这些诗句，都是通过对严子陵那种不慕名利、淡泊自甘的风范的颂扬，体现出浓重的士大夫自鸣清高、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联语中揄扬退位隐居的建文，而贬抑攘权窃位的永乐，与此有一定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隐逸的传统。几千年前的《易经》上就讲，"肥（飞）遁，无不利"；"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特别是庄子，系统地提出了隐逸思想。他最先阐扬了对后世发生极大影响的身外之物论。他说，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托，寄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可是，人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寄去则不乐"。因此，他感喟地说："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这样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楚威王仰慕庄子的贤才，派使者带着厚礼来接他去，答应让他位居卿相他却笑着对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呀。可是您没有看见祭天仪式上用作牺牲的牛吗？好草好料饲养它几年，最后给它披上锦绣，牵进太庙里将它宰掉。到那时，这条大牛想像小猪崽那样活着，能办得到吗？您赶快走开，别污染了我。我宁可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也不愿为有国者所羁縻。我将终身不仕，以便无拘无束、痛痛快快地活着。"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热衷权势者的画像：权到手了战战兢兢，权势丢了痛哭流涕；睡了做恶梦，醒着不安宁。磨墨墨磨，弄权权弄。究竟是人在当官，还是官在弄人？这种隐逸思想文化的确立，正是泥涂轩冕、归钓江湖的严子陵被历代文人捧得那么高的社会思想背景，也是关于建文帝的这幅联语的意蕴所在。

由于这副联语是悬置于正续禅寺的，因此，它对于是非、高

下的判定，必然考虑到佛禅的"红尘觉悟"。佛家认为，功名富贵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偶遇，用终极关怀的眼光看，并不具备实在的价值、意义。建文帝王冠落地，红尘撒手，遁入空门，由大起大落而大彻大悟，在佛家看来，当然要比不择手段地追逐权位的永乐帝高超百倍。

如果不从庄、禅的角度，而是就史论史，专从事件本身来考究，联语中的结论也可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据明史记载，朱允炆继位之后颇有一番作为，深得人心。他"天资仁厚"，"亲贤好学"，对祖父的君主集权政治多所更张，注重发挥臣下作用，提高文臣地位；同时诏行宽刑薄赋，举遗贤，兴教化，重农桑，赈饥民。对于长期生活在高压、峻厉的政治环境里的官民来说，这种兴革措置自然提供了一种宽松、温煦的气氛，一时道化融洽，万民称治。不期这位颇得人心的青年皇帝，只维持了四年统治，就横遭惨败，饮恨终生，自然引起了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同情与怀念。明乎此，就容易理解：当朱棣进入南京后，建文遗臣中，不仅纷纷逃逸、誓不与新朝合作者达四五百人之多，而且有那么多人无视酷刑峻法，甘冒斧钺之诛，抗命不屈，死得极为惨烈。史称，"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所表现的气节，简直比改朝换代还要厉害。对此，明代诗人朱彝借凭吊死难遗臣方孝孺作了真实的描述："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岂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而对于朱棣，在明清两代文人中则多有微词。人们当会记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一位儒士之口，说："本朝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帝，就弄坏了。"说句公道话，永乐帝在历史上还算一位英主。他的名字将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修纂《永乐大典》的丰功盛烈同其千古。而且，

我们评议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既不应感情用事，也不能囿于封建伦理。无论叔侄谁作了皇帝，都是反动统治者当权。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永乐之失，在于登位后，大开杀戒，滥用刑罚，从开国元勋、硕儒、宿将，到诸司官吏、州县衙役，一直到平民百姓，凡有牵连，就要满门抄斩，直杀得朝野震怖，四海惊心，因而不免要受到后人的谴责。据史料记载，靖难之役中，有案可查的共屠杀了一万四千多人。有的灭十族，瓜蔓抄，转相攀染，村里为墟。而且，屠杀的手段也非常残暴，聚清剥皮，铁铉油炸，罪人的妻女则发付到教坊去作妓女。一般的娼妓是静候嫖客，而她们按照永乐定法，要不断"转营"，每个兵营里都要去几天，以便为尽可能多的男性所糟蹋，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更要遭受非人的待遇。这种对前朝遗臣的独特的惩罚，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持续十几年的血腥屠杀，不仅斫丧了国家元气，而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剧烈的创伤，以至清初有人总结明亡教训时，把这作为一个缘由。他们认为，由于朱棣残杀无度，毁坏了正气刚风，造成后来许多臣子只知持禄固宠，再无心顾念社稷了。

离开武定狮子山，已经三个月了。每当记起有关建文帝的种种传说和后人对明初这场惨烈的流血斗争的评判，我总觉得，西哲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耐心等待被虐待者获救的福音。"确是有些道理。

爱的悲歌

陆放翁诗名千古震烁。从童蒙时起，就知道他是一位豪情似火，壮怀激烈的爱国诗人。他那"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等战斗号角般的诗句，那"脍鲸东海，刺虎南山"，"裂眦嚼齿，愤切慨慷"的豪情壮举，刀刻斧削般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铸就一个热血丹心、刚肠铁骨的英迈形象。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他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这股热潮有时甚至泛滥到梦境里去。他确实无愧于"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语）的美誉。及至通读了《剑南诗稿》八十五卷，特别是看了后人吴梅霜编的《陆务观寄怨钗凤词》和京剧《钗头凤》，进一步了解到，豪情无已，悲愤激昂，只是他的一个方面；他的胸中还饱蕴着似水柔情和绵绵愁绪，因而常常从另一侧面抒写其丰富的感情生活，这方面同样是绚丽多彩，千古卓绝的。只有把这似乎对立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加以考究，才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诗翁形象。

梦雨潇潇沈氏园

正是抱着了解诗翁全貌的热切愿望，这次借杭绍之行，我特

意瞻望了那游荡着旷代诗魂，留下了千秋佳话的沈园的风采。流传下来的《沈园图》告诉我们，这座宋代名园曾经历过楼阁参差、林亭掩映、小桥流水、花影重重的峥嵘岁月。而今，昔年倩影已涣然冰消，只残存一个葫芦形水池算是"鲁殿灵光"，硕果仅存了。郭沫若六十年代初游沈园时，有"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的词句。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大体还是这般风色。我来时，恰好也在秋天，金风送爽，细雨霏微，正是"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天气。进得园来，假山当门，上有小亭翼然，为全园制高点。山下水池窄狭处横架着石桥，看去宛如系在葫芦颈上的一条绢带。池畔柳榭成行，照影清浅。这里那里点缀着一簇簇黄花瘦朵，衬着静水闲云，确也不乏野趣。越中毕竟明眼人多，他们没有在昔日名园周遭摆上座座华堂广厦，而是保持一种雅淡、萧疏的韵致，不使它为"都市文化"所熏染。假如为了招徕游人，追求洋化，硬是在荒园内外布下种种现代设施，那就无异于给白发老翁套上蝙蝠衫、牛仔裤，弄得不伦不类，令人意兴索然。今日沈园虽然仅是昔日的一角，可供游观的景点不多，但因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自有其存在价值。何况荒疏之美，堪入画本；天然平淡，容我低回、盘桓，暂时抛却那些世务酬答，享受一番"城市山林"的逸趣。

古城绍兴号称"山青水秀之乡，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名胜古迹颇多，但萧疏的沈园却偏偏吸引着大量的游客。这些他乡游子操着种种南腔北调，纷谈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凄绝千古的爱情悲剧，足见陆游的情操、诗品感人之深。

据史料记载，陆游二十岁时娶才女唐婉为妻。夫妇琴瑟相谐，情深意笃，以白头偕老相期。谁知陆游的母亲偏不喜欢这个

儿媳，视作眼钉肉刺，终于下了一道"慈命"，强迫儿子违心地休弃了妻子。一对真诚相爱的情侣，在吃人的封建礼教压力下，就这样生生地被拆散了。唐婉后来改嫁同郡宗子赵士程，陆游也奉父母之命另娶了王氏。

陆游情场失意，仕途也十分坎坷。他在进士科考中，因名列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秦桧重责主司；翌年赴礼部试，主司复置陆游于前，竟遭黜免。此后，便回到故乡山阴闲居一段时间。家忧国难，集于一身，其情怀之悒郁可想而知。在他三十一岁这年，一次春游时在沈园与唐婉偶然相遇。当时赵士程在场，二人无从互通情愫，心情十分痛苦。唐婉回去后，派仆人给陆游送过来一席酒肴。陆游含泪饮着闷酒，想到人世间彩云易散，离聚匆匆，不禁百感交集，顺手在粉墙上题下了凄婉动人的《钗头凤》词："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上阕忆述美满姻缘的破坏经过；下阕写春光依旧而人事已非，昔日温存仅留梦忆。相传，唐婉看到这首词后不胜伤感，并暗自和了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不久便悒郁而死。

清代诗人舒位就这场爱情悲剧写过一首七绝："谁遣鸳鸯化杜鹃？伤心姑恶五禽言！重来欲唱《钗头凤》，梦雨潇潇沈氏园。"寥寥四句，下笔如刀，无情地鞭挞着以"恶姑"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揭露了造成这场人为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雨滴稀稀落落地在漫空飘洒，葫芦池上泛起轻轻的涟漪。但

游人的兴致并未因之稍减。一对对情侣或林亭对坐，或池畔勾留，或站在后人补写的《钗头凤》题词前摄影留念。偶尔也有二三男女青年踏着芳草闲花笑闹嬉游。时代不同了，他们可以不受外在压力干预，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感情客体，因而也无从尝到旧时封建婚姻的凄苦况味。他们哪里想到，就是迈出这么"普通的一步"，前辈足足走了几千年时间。

放翁老去未忘情

纯真的爱，作为人类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必然表现，是不能加以强制命令的。外力再大，无法强令人产生情爱；同样，已经产生的情爱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的强大而被迫消失。陆游，这个生当理学昌盛时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以足够的觉悟和勇气，去奋力抗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但在他的内心世界，却始终不停地翻腾着感情的潮水，而且，一有机会就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作直接、率真的宣泄。诚如他自己说的"放翁老去未忘情"。他年复一年地从鉴湖的三山来到城南的沈园，在愁痕恨缕般的柳丝下，在一抹斜阳的返照中，愁肠百结，踽踽独行。旧事填膺，思之凄哽，触景伤情，发而为诗。这种情怀，愈到老年愈是强烈。

陆游六十八岁这年深秋，重游沈园，看到蛛网尘封中，当年的题词尚在，而伊人已杳。林园易主，流风消歇，不禁怅然久之。于是写下一首感旧怀人的七律："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河阳"一词，借潘岳悼亡比喻对唐婉的怀念。最后说，如今人天永隔，无

缘重见，只能心香一炷，遥遥默祷了。七年后，又一次去游沈园，怀着更沉痛的感情，写下了两首七绝："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诗人感叹韶光难再，四十载倏忽飞逝，回思既往，益增唏嘘。

八十一岁这年，他梦游沈园，醒后又写了两首七绝："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倍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仍锁壁间尘。"如诗如画，亦梦亦真。此时，陆游已届风烛残年，知道自己亦将不久于人世。但老怀难忘，仍然钟情于这位无辜被弃、郁郁早逝的妻子。对于美好的事物，人们总是无限追恋的。当残酷的现实扯碎了希望之网时，痛苦的回忆便成了最好的慰藉。第二年秋天，他又写了一首七绝："城南亭树锁闲房，孤鹤归飞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直到八十四岁高龄，他在《春游》诗中还写道："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幽梦匆匆"，追叹他们夫妇美满生活的短暂；"美人作土"是说唐婉已经死去五十余年。不久，诗翁也辞别了人世。

犹如春蚕作茧，千丈万丈游丝全都环绕着一个主体；犹如峡谷飞泉，千年万年永不停歇地向外喷流。爱情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数十年不变，着实令人感动。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会在心灵深处永存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这种现象，要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陆游与唐婉的爱情生活，在吃人的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下，

最终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因为爱情栖身的社会首先是一种现实，然后才是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无力摆脱失败的命运。但是，陆游与唐婉的感人诗章和美好的形象，却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芳衷脉脉漾愁波

写到这里，我忽然记起一桩往事。六十年代初，我在一家报社编文艺副刊，一次采访中，偶然结识了乡先辈凫潜先生的女孙、在中学执教的赵剑霞女史。她在闲谈中提到，祖父凫潜翁民国初年，曾在绍兴、萧山一带督学，公余之暇，常去鉴湖、沈园一带访察，于陆游、唐婉的爱情悲剧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就此写过专著，反右斗争时，先生还在世，怕惹祸患，连同其他一些文稿统统烧掉。剑霞姊妹多次听祖父讲过民间流传的关于陆、唐结褵和婚变的轶事。

据说，唐婉字蕙仙，早慧多才，父母去世后，往依在临安从政的叔父。因陆、唐两家是世代姻亲，经陆游的老师曾几作伐，便嫁到了陆家。蕙仙雅善弹琴、赋曲，颇不得陆母喜欢。加上尼姑算命，说唐婉命注孤鸾，克双亲，损夫寿，折子息，使陆母断然下令逐出家门。陆游曾另外找了一个地方把她藏匿起来，两下暗中来往，后被母亲察觉，登门问罪，只好彻底分手。

离散十年后，唐婉与陆游偶然在沈园重见，有馈食、和词之举，此后，这首《钗头凤》，便和陆游的词一同流传下来。实际上，唐婉辞世前还写过许多诗，备述她与陆游婚后鹣鲽相亲的生活和离异、被逐后的相思之苦。仅剑霞女史从祖父那里录下的，就有十数首之多。如《遇合》："款款情深展素心，西楼一霎悟前

因。渔郎识得桃源路，二月春浓欲问津。"《湖游》："记得花荫并影时，湖山痴恋晚归迟。十年怕作长堤忆，旧梦分明感不支。"《幽怀》："芳衷脉脉漾愁波，独立东风损黛蛾。底事花前无一语？梨林缟素似银河。"还有几首题为《恨别》的七绝，其一："镰月纤纤映碧池，闭闲无计憾芳时，空阶零落幽兰萎，怅问南园蝶可知？"其二："弦断音稀岂夙因？千秋薄命属才人。零笺碎简愁难遣，恨袅西风日半沉。"诗章情文双至，感怀真挚，凄怆动人，自非局外人所能措手者。

据剑霞回忆，凫潜翁还考证过唐婉与朱淑真的关系。朱钱塘人，年岁略长于唐，两位才女在一座都市里生活过，婚姻上又都遭际不幸，肯定会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二人可能没有见过面，但唐婉读到过《断肠诗词》，"碧云信断唯劳梦，红叶诗成想到秋"；"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都是她最喜欢的。

我曾想过，如果陆游与唐婉能够白头偕老，那么，他们留下的闺房佳话与风流韵事会比李清照、赵明诚的更加生动感人。赵明诚有学识，但比易安居士略逊一筹，而且并不长于诗词。闲居无俚，夫妻赌赛背诵《汉书》，负者要喝茶水。结果，每次都是赵明诚撑得肚皮发胀。若是唐婉与陆游赛诗，她自然也不是对手，但可以借此使更多的诗篇产生和留传下来。那样，陆老诗翁就不是"六十年间万首诗"了，说不定会翻上一番。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爱情不仅有利于提高人的精神修养，而且，通过爱的实现，能够全面促进生命力的增强，使男女双方的能量都能得到蓬勃的发展。爱的潜在的威力是巨大的，莎士比亚在一出喜剧中写道："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眩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到最微细的声音；恋人的感觉比戴壳蜗牛的触角还要灵敏……当爱情发言的时候，就像

诸神的合唱，使整个天界陶醉于仙乐之中。”

当然，由于爱情生活美满，陆游也许会久居山阴，不入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军幕，失去积极筹划进取中原的机会。而这恰恰是他创作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他自己认为，正是从那里得到了“诗家三昧”。不过，纵观陆游的整个人生观以及胸襟、抱负，长久地沉湎在温柔乡里，又是不大可能的。晚岁返回故乡，尽管他大部分时间流连山水，但仍念念不忘于沦陷的中原，念念不忘于地下的唐婉，这是他晚年的两大隐痛。“尚余一恨无人会”，“但悲不见九州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感情完整、境界高远的诗翁形象。

看过最后这一部分，有的读者可能要问：陆游是否看到过唐婉的那些诗句？就这个问题，我也曾与剑霞女史作过探讨。她说，没听祖父说过。在她看来，唐婉死后不久，陆游即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当时未必能够看到；五十六岁之后回到山阴，中间出去过一小段，以后再没有离开过家乡。按说，这么长时间，他不会毫无知闻的。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在他的诗词中却未见有所反映。我说，正面的反映不见，返光投影还是有的。“放翁老去未忘情”，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追念唐婉，这也许可以看作是间接的证明。

战地孑遗

晋北此行，旨在上五台、赴大同欣赏古代建筑的瑰宝和精美的雕塑艺术。可是，一路上谈得更多的却是山西的形胜和古战场。上车后，任职省上、全程作陪的G兄突兀地提起了一句唐诗。他说："崔曙这个人作诗不多，传世的更没有几首。可是，我倒特别欣赏'三晋云山皆北向'这个律句。"

"为什么？"我问。

他说，这句诗概括力很强。在神州的版图上，素有"表里山河，称为完固"之誉的山西省，地理环境是很独特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自南而北，逶迤千里，屏障一般壁立在东西两面。——这就是所谓"云山北向"吧？黄河蜿蜒北来，南下而东折，像一条玉带围住了西边、南边；中部的地形地貌，似一线串珠，自西北而东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其间不仅有煤、盐之利，而且是全省主要的农牧业经济区，又是自古以来纵贯南北的交通要道；北部面对着阴山、朔漠，这里自周、秦以来，相继聚居和游动着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多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它们虎视眈眈地分别觊觎着秦、汉、晋、隋、唐和北宋的皇权。而这些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所先后建都的咸阳、长安、洛阳、汴梁，又都在这条南北通道的附近。由于山西的地势北高南低，中部的五个盆地呈阶梯状顺势而下，所以，对于古代车、骑、步旅作战，自然是有利于南下

而不利于北上的。无论是西出汾河河谷，直抵关中，还是沿沁河、丹河河谷南下，威逼中原的河洛地区，都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其形势之重要，恰如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言："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因此，山西特别是晋北的中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这里，每个大盆地都曾是杀声震野、白骨如麻的古战场。

说起山西的古战场，自当首推平城(今大同)。我们这次特意寻访了城东二十里外的汉初古战场白登。原来，殷周以降，匈奴一向是北境的强敌。为防备其南侵，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在秦、赵、燕旧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秦汉之际，匈奴冒顿自立为单于，武力空前强盛，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步步侵吞长城内的边地。汉初，在降将韩王信的配合下，匈奴一度夺取了晋阳(今太原)。兵力所及，最近处距都城长安仅七百里。面对这一十分危急的形势，高祖刘邦于公元前二百年，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上征讨。在晋阳击败韩王信及匈奴大军之后，亟想乘胜直追，扩大战果，没等步兵大部队赶上来，他就率领一队骑兵深入晋北。结果，中了冒顿单于的计谋，没料到敌人隐匿了精兵，被羸弱疲惫的假象所蒙蔽，孤军深入平城。冒顿率四十万骑兵，把刘邦的队伍围困在白登，达七天七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战"。多亏谋臣陈平献计，暗地送重金厚礼，贿赂冒顿单于的夫人，才解除了白登之围，刘邦得以仓皇脱险。

这天，我们站在没有战迹标志的高阜上，环顾了白登的全貌。这是一片极为辽阔的丘陵地带，可以纵横驰骋，左右奔突，非常适于骑兵作战。冒顿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实施他的包剿战略，可见其才智过人。如果不是后宫专宠坏了他的全盘打算，

"汉之为汉，未可知也"。

公元前一三三年，刘邦的玄孙、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全面讨伐匈奴的战争。其战略是，先从东西两面切断匈奴与濊族、羌族的联系，然后在中部集合大军作为主力，给匈奴以正面的打击，第一仗就安排在平城南面的马邑（今山西朔县）。同六十七年前匈奴围困刘邦那次一样，也实施了诱敌深入的策略。武帝采纳大臣王恢的建议，三十万汉兵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然后差遣当地人聂翁壹引诱匈奴入境抢掠。单于果然出动十万骑兵前往。在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发现原野上牲畜很多，只是不见一个牧人，单于感到有些奇怪。经过多方探问，才掌握了伏兵的秘密，于是下令迅速撤兵，逃逸到边境之外。汉武帝原以为找到了不仅为其先人湔羞雪耻，而且可以一鼓聚歼的良机，不料功败垂成，枉劳师旅，非常恼火。王恢畏罪自杀，匈奴也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从此拉开了长达几十年的战幕。

迨至西晋十六国时期，中经隋、唐、五代，直到宋初，北方一些游牧民族同中原统一政权的战事，以及游牧民族之间的争夺战，主战场之一仍是山西，并逐步由平城南移至晋阳。

建立十六个地方政权的五个少数民族中，匈奴铁骑一直驰骋于晋北，最先起兵反抗西晋并建立汉国的刘渊，就是匈奴人，他出生于忻州；后来汉国分裂为前赵、后赵，前赵皇帝刘曜，为刘渊族子；后赵主石勒，羯族，山西武乡人。鲜卑族拓跋部世居山西并州塞外，建立北魏后，道武帝拓跋珪率领大军，同建立了后燕的本族慕容部在平城东南的参合陂鏖战，数万后燕军被斩杀、活埋。次年，北魏平城三万驻军遭后燕主慕容垂率军偷袭，全军覆没。不久，拓跋珪又率步骑四十万众与后燕决战，一年后，灭掉后燕，迁都平城。由于北魏统治集团决策正确，适时进行改

革，加之军事上控制了由塞外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借助晋北地势高耸的有利条件，得以高屋建瓴之势，相继扑灭了一个个敌国，终于结束了十六国对峙的混乱局面。

隋唐时期，由于主要的强敌是北方的突厥，因此，山西仍为军事重镇。隋文帝即位不久，即封其次子杨广为晋王，驻守晋阳，第一位的任务便是防备突厥入侵。后来，李渊父子起兵灭隋，也是以晋阳为根据地的，视之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唐朝定鼎于长安，仍以晋阳为北都，经过几次修建，晋阳城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十分巨大而坚固的城池，不仅是屏藩东西二京的北方重镇，而且在抵御安史之乱的叛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史思明部十万大军围攻晋阳，大将李光弼凭借金城汤池，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坚守五十多天，歼敌七万余人，终解城下之围。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先后建都于洛阳、开封，但作为割据势力，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而驱兵南下的。因此，有的学者论说："中国北方五代的历史，可以当作以建都于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来看。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

后唐晚期，太原节度使石敬瑭想凭借太原的优势夺取皇位，便以奉送幽州和雁门以北广大地区为条件，勾结契丹出兵援助。最后，他当上了儿皇帝，但燕云十六州尽归敌手。从此，晋北除雁门关外，再已无险可守，契丹南下侵掠，可以长驱直入了，终北宋之世，成为致命的祸患。这一时期的主要战场，在晋北的雁门关内外。

雁门关又名西陉关，古称勾注塞，在代县城西北二十公里雁门山腰。站在关前远望，但见四面峰峦错耸，峭壑幽深，中有险

路，盘旋纡曲，天开一线。关门两边对联的字迹已模糊难辨，陪同的向导指认为："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用这样的字句来概括雁门关的战略地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长城宛如一条灰色的巨蟒，起伏于危峦迭障之间，将雁门东西十八隘口牢牢地衔接在一起。关门左侧有边靖寺，俗称李牧庙。相传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曾在此大破匈奴十万骑兵。对面的六郎庙，是民间为纪念传说中的爱国名将杨六郎而兴建的，于今也仅存遗址。由于形势险要，又是南北交通必经的关口，因此，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有资料记载，从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四五七年）赵襄子兼并代国起，到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伏击日寇侵略军止，其间二千三百九十四年，雁门关一带共发生过较大的战争达一百三十多次。

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契丹十万大军进袭雁门，代州刺史杨业率数百名骑兵自雁门关冲出，大破敌兵于山下，杀了契丹附马侍中萧咄李。从此，北军闻风丧胆，每当看见杨业的旗帜便自行引退。六年后，宋军主将潘美与契丹作战，兵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送晋北各州吏民内迁，与敌军遭遇。杨业欲暂避其锋，但被护军王侁等指责为畏缩不前，只好违心地出兵迎击。临行时，约好在陈家谷以步兵强弩接应，可是，王侁等却提前退兵，致使杨家将陷入重围，杨业父子以身殉国。

这次，我们专程到鹿蹄涧村，瞻拜了为旌表杨业一家始建于元代的杨忠武祠。但当听到还要看传说中的当年主战场金沙滩时，管理人员却说，出于对忠良的敬仰和同情，这里的人对金沙滩不感兴趣。在鹿蹄涧唱戏，必须唱杨家将，演"七郎八虎出幽州"、"杨六郎威震三关"，绝对不能演《金沙滩》。——这一仗，老令公八个儿子只回来两个，人们嫌它晦气。

车出代县城，我们见到路西有一片苍苍莽莽的沙原，上面布满了一米多高的黄土堆，原以为这就是金沙滩。经问询得知，其地离此间尚远。那么，这些土堆又是什么呢？当地群众讲，一种传说是汉、唐以来掩埋阵亡战士的荒冢；另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争中用以迷惑对方的“谎粮堆”。不论哪个说法成立，都会使人产生一种苍凉、震怖之感。一霎间，我想起了唐人李华的名篇《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古战场，古战场，不觉陷入到沉思里。……

G兄拉了我一把，笑着说：“像‘拉洋片’似的，掀过了一片再一片，晋北的瑰宝你再看看！”于是，我们向五台山进发。我感到这种安排很有意味。

国宝之最是南禅寺。寺院坐北朝南，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雄宝殿等建筑。其中大雄宝殿比其他配殿高出一头，显得特别宏阔魁伟，建筑风格疏朗、大方，质朴、苍古。殿堂内无柱，亦无天花板和梁架，制作简练，宽敞明亮。大殿底层台基宽大，下部结构敦实稳固，中间略有收束，上层放开，轮廓十分美观。那么沉重的殿顶压下来，由于出檐很深，四角挑起，给人一种轻盈昂奋的感觉。内行人一看就知是唐代的杰作。据寺中碑石记载，始建时用的是郭家寨、李家庄的香火钱，其时约在唐代前期，尔后，逐渐扩大了规模。大雄宝殿重修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七八二年），就是说，存世已经一千二百一十五年了。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号称神州一绝。

当下，我问寺庙的住持：“这千年古刹，起码经历过两方面的多种劫难：一是风雨剥蚀。这几十万个日日夜夜，能够完好无损地度过来，可不容易呀！二是人为的劫难。公元八四五年，唐武

宗的'会昌灭法'，当时毁掉寺院四万多处；过了一百一十年，后周世宗又一次毁佛。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自然都是首当其冲。那么，这座大殿是怎么逃避过来的呢？南禅寺紧临雁门古战场，为什么没有遭到兵燹战火的毁坏？还有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它又是怎么过来的？"住持说，应该说，它是得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木质建构，一怕潮湿，二怕烽火。从自然环境看，晋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由于太行山脉阻隔，受来自海洋的温湿的夏季风影响较小，而受源于大陆内部的冷干的冬季风影响较大，因此气候比较干燥。这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从人文环境看，这里是一个偏远的山沟，远离五台山佛教中心区二百多里，距五台县城也将近五十华里，而且，寺院较小，向来烟火冷落，历代不被器重，不引世人注意。庄子说的"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长寿，与此有共通的道理。我笑说，禅师怎么讲起道家的《南华经》了？住持也抿嘴一乐，双手合十，口说"善哉，善哉"。

随后，我们又看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当年，除祖师塔外，佛光寺的全部建筑都毁于"会昌灭法"。公元八五七年，寺僧募资重建，后又屡遭劫火。东大殿为"鲁殿灵光"，硕果仅存。虽然比南禅寺大殿晚七十五年，但因建筑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和科学价值，堪称唐代佛教艺术的精华和木构建筑的代表作。赵朴初先生视察了这两座唐代的大殿之后，曾题词咏赞："二唐寺，瑰宝世间无。千劫何缘存象法？明时自不失玄珠。沉海庆昭苏。"说它们曾遭无数次劫难，今天如沉海明珠被打捞出来，重新放射出奇光异彩。

要论建构奇巧，别出匠心，还有恒山脚下半崖峭壁间的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后经唐、宋、明、清历代重修。整个建筑利用力学原理，在陡壁上凿洞插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楼阁间有栈

道相连。上戴危岩，下临深谷，楼阁悬空，望之如峭壁浮雕。登游时，攀悬梯，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回廊，跨飞栈，时出时入，忽上忽下，宛如置身神话世界。难怪走遍天涯、眼界宽广的徐霞客要赞许它为“天下巨观”。

我们此行的终点站，是大同市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在东西一千余米的延长线上，罗列着洞窟五十三座，造像五万一千余尊，大部分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魏书·释老志》赞之为“雕饰奇伟，冠绝一世”。在我国三大石窟中，素以石雕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采见称，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蜚声世界的大型艺术宝库。

面对这一尊尊精美的艺术珍品，面对一千五百余年凝固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先民，我真是由衷地赞佩，倾心地敬服。他们当时的生产手段，可说是简陋不堪的，不要说同今天这些遨游太空的上百吨的飞行器、每秒钟运算几亿次的计算机以及把人们观测宇宙的范围扩展到百亿光年的射电望远镜和天文卫星无法相比，就是可以称之为机械的普通工具，当时也并不具备。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极为低下的。所需一切，且不论质，即以量计，都无法得到满足，可是，他们凭着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历尽千难万险，居然创造出横绝一世、光照千秋，直至今日还让世人惊叹叫绝的艺术奇观。

当然，越是想到这些，就越是感到肩上有着不堪重负的千钧压力。文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留下的文化纪录，是无可代替、不能再造的。比如那两座称雄世界的大殿，那座构思奇巧的悬空寺，这些精美绝伦的佛像石雕，坍塌了便不能扶起，毁坏了也无法再造。因为，扶起来便被视作重修，而复制品或可称为艺术，但它绝不是文物，这些保存了千余年的旷代奇珍，它们已不再属

于某一个区域，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可是，今后，它们的命运如何呢？想到五台山的许多寺庙终日香火高燃，浓烟缭绕；想到武周山下运煤车辆昼夜穿梭，不仅石佛雕像披上一层尘灰的"袈裟"，而且整座石窟不断经受剧烈的震动，将会变得结构疏松，……真有些不寒而栗了。

市里的同志拉着我和G兄，要在十七米高的三世佛石雕前合影。摄影师嫌G兄神情严肃、心事重重，让他稍稍放松一下。他却说："我原来想，先看战场，再看艺术珍品，这更能显示出那些战地孑遗的可贵。没料想，这却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这些稀世瑰宝，饱经烽火，历尽劫难，得以保留到今天，实在不易。现在我们把它承继下来，又幸逢和平建设时代，不要说烧毁了、震塌了，就是出现某些人为的蚀损，也是无法向后人交代的。"我说："你说得好。借助赵朴老的清词，我也凑上一句：但得要津同虑此，'明时自不失玄珠'，三晋幸何如！"引起在场诸君会心一笑。

"咔嚓"一声，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太原城引出的话题

三晋名胜古迹甚夥，特别是地上古建筑之多，名列全国前茅。就中若论秀丽的自然景观与悠久的历史文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自当首推晋祠。晋祠始建于公元五世纪北魏之前，原名唐叔虞祠。史载，周成王与其幼弟姬虞为戏，把一片桐叶剪成玉圭形状，赐给姬虞，说要封他为诸侯。身旁的史官立即请成王择吉立之，成王说那是开玩笑。史官正言相告："天子无戏言。"成王无奈，只好封叔虞于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桐叶封弟"故事。叔虞死后，其子燮父以都城紧靠晋水，因改国号为晋，是为晋国之始。为了纪念唐叔虞，后人建立了晋祠。唐朝李渊父子起兵太原；拥有天下后，素有"太原公子"令誉的李世民曾亲祭晋祠，树碑制文，亲书之于石。晋祠古木名树很多，价值最大的是两株周柏，相传树龄已达二千七百多年。九百五十年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咏赞它们："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现在，仍然是那么苍劲挺拔，桑皮黛干，苍苍覆于空际，与朱栏碧甍、杰阁层楼，鱼沼飞梁，相映生辉。古柏，同涓涓涌流的难老泉、精美绝伦的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晋祠游罢，驱车五十里，来到太原城区宽阔的迎泽大街。我同身旁的文物局长谈到，原以为，既然太原为叔虞封地，晋祠又为纪念叔虞而建，肯定就在市区附近，不料竟离得这么远。这句话刚落音，就引起车上人们的热烈呼应，纷纷告诉我，太原古称

晋阳，故城在古城营村，确实邻近晋祠，而现在的太原城是后建的。公元前四〇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阳一度作为赵国都城。后来，东魏的高欢，隋唐的李渊，五代时期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依靠着雄据晋阳而坐上了龙椅。宋太宗赵光义登上皇位两年后，调兵遣将围攻北汉的都城太原，经过两个多月的喋血鏖战，终于夺下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古城。有人说这里有“龙脉”，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当这条蟠龙的腹心。宋太宗考虑到，隋唐以来这里出过多少个开国皇帝，确有“龙城”之兆。为了铲除这个地区孳生新的割据势力的温床，便下令彻底摧毁城池，撤销藩镇建制，改为平晋县，并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宫殿建筑及居民庐舍，老幼未及逃出者，多被烈火烧死。还引水灌城，削平城西系舟山，名为“拔龙角”，使千年故都化为一片废墟。尔后，在五十里外的唐明镇修了一个小土城，以安置流民，这就是后来的太原。新城不修“十”字街，只筑“丁”字路，意在钉住“龙脉”。经过大家指点，看出现今的太原市区仍有许多“丁”字街，当为旧时遗迹。宋太宗在毁城的同时，却在晋祠大兴土木，以积功树德。他效仿唐太宗建“贞观碑”的做法，在晋祠也竖了一个“太平兴国碑”。但碑文全部被老百姓剥掉，一个字也没有留下，作为一个变形的无字碑，被存放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车上，大家就这样，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宋太宗。有的说，就功业来讲他是大醇小疵，有的说是功过参半。他的最大的功业，一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二是重视发展文化事业，组织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类书。这对于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有利的影响。政治上，他大体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重视

择人选吏，惩治贪赃枉法者。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至于烧城祸众一事，在太原人民的心目中，则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往事越千年，时至今日，谈起他来，犹有余愤未平。其实，何止现在，太宗毁城200余年之后，太原的前代乡贤、著名诗人元好问过晋阳故城时，念及这座"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的北方屏障的惨遭毁坏，就曾伤情地悲吟："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汾河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尘昏。"诗人临风吊古，痛斥宋太宗焚毁晋阳城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无穷灾难，深致慨于后晋与赵宋王朝的失策——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

听着人们的议论，我虽然没有插言，但内心是赞同的。也许是先入为主吧。小时候看过一出名叫《贺后骂殿》的戏，剧情是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继位。赵匡胤的妻子贺后因其夫死因不明，令长子德昭上殿质问，光义大怒，欲斩之，德昭撞死。贺后乃携次子德芳上朝骂殿。唱词有："遭不幸老王爷晏了御驾，贼昏王篡了位谋乱邦家。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反倒说为嫂我拦阻有差。"她把赵光义比做曹操、王莽、赵高等篡权误国的奸贼加以痛骂，"只骂得贼昏王装聋作哑，只骂得贼昏王扭转身躯，闭目合睛，羞羞惭惭，一语不发。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对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看戏当时也觉得骂得痛快，真的呼出了一口闷气。

这出程派的名剧，是根据《湘山野录》"烛影斧声"之说演义而

来的。关于宋太祖之死历来有种种说法。有一些是荒诞不经的，如说，太祖生一背疽，光义入视，突然见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柱斧向鬼劈去，结果鬼未击着反落在疽上，太祖疽破肉裂，遂致昏厥死去。有的说，太祖病重，光义入宫问疾，夜间见太祖睡熟，乘机调戏其宠姬费氏。太祖醒来，以柱斧砍地，气恼地说：你做的好事！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太祖知大限已到，夜召光义入内，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后来又看到太祖以柱斧戳地，大声对光义说："好为之"。次晨太祖就死了，终年五十岁。从现存史料中，看不到太祖死前有生病和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死得十分突然。最大的可能是被他的胞弟赵光义谋害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如是说。宋史上的另一疑案是"金匮之盟"，即杜太后临终前曾有太祖传位于光义的遗嘱，其真实性也已无从稽考。史学家张荫麟曾指出它的五大破绽，断为伪造。

对于这两个"千古之谜"，官修的《宋史》皆避而不谈，所记只有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封建王朝的史书向来是为尊者讳的。但即使如此，有的史学家也还是提出了问题："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以至有的直斥太宗"褊急奸贪而攘天位"。后来兄子德昭被逼自杀，一年半之后，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德芳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尔后胞弟廷美又遭贬致死，心腹之患虽除，却遭致了人们的种种非议。就连正史也不能为之讳，明确地指出：此数端，"后世不能无议焉"。这一点，太宗自己也是了如指掌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曾对侍臣说，即位之始，"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为此，他采取了多种手段，以安抚人心，培植亲信，稳定局面。

《骂殿》的戏，正是针对赵光义这样一些龌龊的事来编的。作为一种舆情的真实而曲折的反映，它像《击鼓骂曹》、《审潘洪》、《斩黄袍》等剧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群众的心声和愿望。后来读了史书，才知道它与史实出入甚大。赵光义即位于公元九七六年，而贺后早在公元九五八年就已下世，骂殿之事当属子虚乌有；德昭也并非死于宋太宗攘位当时，而是在四年之后。但是，由于那慷慨激越、低回悲壮的唱词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底，再加上赵光义那些不义的行径，所以即使知道戏文失真，感情上也还是过不来，所谓"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也。

上了中学之后，开始欣赏李后主的词，尤其喜欢"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名句。为他未永其寿感到惋惜。尔后读书渐多，知道正是这首《虞美人》词使他获罪。治罪的不是别人，又是赵光义！而且，手段之残忍毒辣，令人发指。原来，李煜沦为亡国贱俘之后，痛感往事如烟、人生若梦，造物者残酷无情，使他承受了忒深、忒重的苦痛与愁恨，于是写下了许多伤怀感旧、思念故国的词。不意这些作品很快就不胫而走，传遍了江南，也早被朝廷的耳目报告给了宋太宗，自然激起这狠毒、雄鸷的君主的深深的忌恨。联系"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这些词句，想到日前传来的李煜悔杀忠臣的自责，更使宋太宗敏感地意识到，李煜活在世上就是江南旧梦死灰复燃的希望，因此万万留他不得。当即传旨御医，配制烈性毒药，并要设法使李煜的尸体作俯首屈身之状，以示永世臣服。于是，一场令人惨不忍睹的悲剧发生了。这年七月七日，是李煜的四十二岁生辰。宋太宗派人前来给他"祝寿"，李煜奉旨饮下御酒，登时五脏剧痛，全身痉挛，头足相就，状如牵机，在次日凌

晨气绝身亡。原来，酒中暗下毒药，乃是太宗惯用手法。据《烬余录》甲编，蜀主孟昶和吴越国王钱俶，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致死的。李煜死后，太宗又极尽奸雄之能事，虚情假意地封王厚葬，辍朝三日，以示哀悼，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闹剧。

看来，李后主的机灵劲儿，比那个叫作阿斗的刘后主差远了。据《汉晋春秋》，司马昭与刘后主宴集，为之做故蜀技，他人皆甚为感怆，而后主喜笑自若。异日，司马昭又问他：“颇思蜀否？”答复是：“此间乐，不思蜀。”这样就蒙骗过了司马昭。《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思蜀之心，昭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可是，这一韬晦之术，李后主却不会。一则他不是枭雄之子，没有掌握刘备那套“闻雷失箸”的家传；二则终属诗人气质，及其悲慨，忽忘形骸。当然，由于宋太宗必欲其死，即使李后主安分守拙、隐忍苟全，也不会放过他的。所以，其结局较之刘后主更惨，也和所遭逢的对手较之司马昭更阴鸷、更明察有关。

对于李煜来说，死也许是一种解脱。亡国被俘以后，他饱谙屈辱之苦。最为难堪的是，与他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小周后，经常被宋太宗召去陪宴侍寝，“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曾有记载。小周后每次入宫，辄数日不归，李煜痛苦万端，彻夜不睡。一个是“向君歌舞背君啼”，一个是“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自是苦不堪言。但是，宋太宗哪里料到，一个半世纪之后，他的嫡亲子孙徽宗、钦宗落到金太宗手里，他们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比李煜还要惨重。有的书在评论“靖康之祸”时，说这正是历史老人对于乃祖所施加的惩罚与报复。宿命论不足取，从中却反映出来一种舆情和民意。

忻州说艳

美色曰艳。古代戏曲里有《惊艳》，现代西方电影中也常见“寻艳”、“猎艳”的情节，本文未能免俗，也来凑趣题为“说艳”。

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次偶然的遭遇。那天，我们乘车从太原到忻州去，原本要访察元好问的故居、墓地和“野史亭”，不意在半路上出了个岔儿，这一岔就使我们像俗话说的：“本要去找草原，却一跟头跌进了马厩”。

金、元时代，忻州出过一位大诗人，当地许多人都知道；但他的墓地在何处，作陪的市里同志并不清楚。后来请了一位中学教师作向导，才弄清了具体方位。这位教师很健谈，上车就给我们讲：忻州出美女。元好问的妹妹美貌过人，风华绝代，而且诗文兼擅，出口成章。这下可招惹来麻烦，今天这个提媒，明天那个来会亲，都是官场上的大人物，哪个也得罪不得。可是，元妹又生性好静，对此深以为苦。为了避开红尘扰攘，便束发加冠，到尼姑庵拜了师傅，当了居士。宰相张当揆久闻才女之名，一心要娶她为小妻，这天特地差人前来打探意向。元好问据实相告，说，她已看破红尘，恐难成事。张相爷并不死心，便亲自前往求亲。当这伙声威赫赫的人群赶到时，元妹正在裱糊天棚，见有贵客来到，只好停下手中活计前来应对。进士出身的张相爷，设法装得斯文一些，便搭讪着问道：“久闻贤妹才名，不知近日可有什么佳作?”元妹早已知道他的用意，心想，正好借题发挥，加以断

然回绝。于是，随口应道："不才置身方外，已无意于人事。承蒙不弃，愿就眼前景物题诗相赠：'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当揆吃了个闭门羹，自觉没趣，"哦、哦"两声，一拱手就溜走了。……

大家正待要听下去，突然，一个临时搭设的牌坊式样的大门出现在眼前，门额上面赫然写着："欢迎远道客人来访貂蝉故里"，车上立刻一片哗然。

有人嚷道："忻州美女再多，也不能把貂蝉拉进来。这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历史上本无其人，怎么出来了貂蝉故里？"东道主感到十分尴尬，谈锋颇健的中学先生，此刻也缄默无言。

有人打了个"圆场"："现在正在上映《三国演义》电视剧，村里人逢场作戏，趁机开辟一些旅游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哪里都有。"

"意想天开，胡编历史，倒是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可是，怎么偏偏选在忻州这个地方？还是因为这里出美女？"有人立刻问难。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既然是文学形象，那就任何地方都可以落脚。"打"圆场"的进行答辩。"人家这里肯动脑筋，想出来了，其他地方没敢这么想。"

"这纯属拿历史开玩笑，哪里是什么敢不敢想的事。此风断不可长！"问难者斩钉截铁地说。估计这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

大家沉静下来以后，我随便说了一句："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貂蝉这个人，是有争议的。"没想到，一潭止水再次翻起了波澜。几个人同时对着我，问道："貂蝉史无其人，这还有争议吗？"

我说，生活于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杨升庵，在《升庵外集》中最先提出：世传吕布妻貂蝉，史传不载。唐人李贺

诗《吕将军歌》："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看来，还是有这个人。杨升庵之后，清代学者梁章钜也认为，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然她的名字未见于正史，但其事未必全虚。这里是指《三国志·魏书》中的一段记述：吕布奉董卓之命把守中阁，遂与董卓侍婢私通。恐事泄露，心不自安。这些记载，起码说明了戏曲、演义中的"吕布戏貂蝉"与王允巧计除奸，并非凭空构想，而是于史有据。但也只此而已，既不能否、也不好定与吕布私通的侍婢就是貂蝉，所以成为一个悬案。

问难者当即插言："这里有两个疑问，需要回答一下：第一，《三国演义》卷首调寄《临江仙》的引词，经过学者考证，原是杨升庵作的，就是说，他的作品被《三国演义》引用了；可是，刚才您又说杨升庵对于貂蝉出处有所论议，这岂不矛盾？难道他看到过《三国演义》吗？第二，为什么梁章钜指的是《三国志》，而不是《后汉书》呢？《后汉书》也有《吕布传》，而且时代较早。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

我说，先回答头一个疑问。罗贯中出生要早于杨升庵一百五十年左右，当然不可能把杨升庵的词引进书里。清代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这首卷首词和那句有名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话，就都是他们后添上的。至于杨升庵是否看到过《三国演义》，我想也许看到过，因为此书最早刊刻于一五二二年，这时他正在京城任经筵讲官，两年后才谪戍云南。但这并不重要。他说的貂蝉，既可能是"演义"中的，也可能指的是元人戏曲、平话。关于第二个问题，《后汉书》中的《吕布传》较《三国志》中的要详细一些，但有关貂蝉的记述完全一致。包括《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它们所依据的都是《三国志》。若论所写的时代，《后汉书》当然更早一些，但它

的成书时间却较《三国志》为晚，西晋的陈寿去世一百零一年后，写《后汉书》的南朝范晔才出生。

对于忻州的乡村推出来一个貂蝉故里，我也认为是牵强附会的，因为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还在打着问号，何来故里可言！但客观地说，当地民众这样来做，又并非毫无所据。元人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描写董卓专权，荒淫残暴，太尉杨彪请司徒王允设计除之。王允府中有一个侍女，本忻州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原为宫女，因掌貂蝉冠，遂唤为“貂蝉”。汉灵帝将她赐予并州刺史丁原，丁原又把她许配给义子吕布。战乱中，貂蝉与吕布失散，流入王允府中。一次，她在后花园焚香，祈求神灵保佑吕布，被王允发现。问知情况后，王允大喜，厚待如亲生女，因与密议，巧设了连环计。

“元人戏曲的作者把貂蝉安排为忻州人氏，有什么根据吗？”问难者又一次发问。我说，这部戏曲的本事，出于《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和《吕布刺董卓》两节。但有关貂蝉的身世，《平话》原文十分简单，只说：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我想，如果历史上的忻州真有貂蝉其人，这样安排乃是纪实；若属虚拟，其根据，也许和下述情况有关：王允是历史人物，献帝时先后当过太仆、司徒，他是太原人，离忻州很近；吕布出生于内蒙古包头西面的九原，也曾在太原服役过。这样，貂蝉与丈夫失散后，以乡谊流入王允府中，也说得过去。巧还巧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也是太原人。因此，忻州开辟个“貂蝉故里”的旅游点，也算不上过分的荒唐。

《三国演义》中连环计的情节与元人戏曲差异很大。第八、九回，叙述董卓迁都长安后，愈益专横跋扈，司徒王允欲诛之，苦

无良策。其府中歌伎貂蝉素被王允待如亲女，见允忧思愁闷，知有大事要做，愿以一死报之。王允乃设下连环计，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把盏，布悦其美貌，允即许以为妻。数日后，王允又请董卓赴宴，仍令貂蝉侑酒，卓为其美色所迷，允又把貂蝉献给了董卓。由此，吕布对董卓更加衔恨，又兼貂蝉巧施计谋，使二人矛盾日益激化，吕布必欲杀之。后经王允进一步策划，终于把董卓除掉。《三国演义》改动了《三国志平话》和元人杂剧中貂蝉与吕布原本是夫妻的情节，显得更合乎情理。

由貂蝉有无其人讨论到连环计，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当地一位同志又给讲了一个"貂蝉换头易胆"的故事。说的是，王司徒定下连环计之后，选了几个妙龄女郎来实验，虽然个个相貌姣好，但都缺乏风情、魅力，不足以迷人惑志。华佗见他忧心如焚，愁眉双锁，问明了原因，便说，这有何难，叫你府中的女伎貂蝉前去，万无一失。她的父母为董卓所害，又素承司徒深恩，当无见却之理。王允说，我早就考虑到她了，只觉得她的相貌平平，难以引令吕布与董卓争风夺艳。华佗听后深思良久，作别而去，几天后背着一个包袱来见王允，说，我这几天跑到了西施故乡诸暨－－那里以出美女闻名于世，恰好碰到一个刚刚死去的绝代佳人，割下了头，带回来给貂蝉换上。经过一番绝妙的手术，换头成功，七天七夜之后，貂蝉苏醒过来。王允见后，称赞说："真个是西施再世"。于是把连环计向她述说一遍。貂蝉愿意为国除奸，为亲报仇，只是胆气不足，吓得浑身乱颤。华佗皱了皱眉头，二话没说，又来到燕赵慷慨悲歌之地，壮士荆轲的故乡，弄到了一个特大的胆，经过麻醉处理、手术再植，貂蝉换胆成功。从此，这个貂蝉不仅有西施之美貌，且具荆轲的胆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除奸的功业。

对貂蝉的评价是一致的。大家认同毛宗岗的看法："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由称颂她的功业，同情她的难处，进而关注她的结局和归宿。

就已有的文字资料和民间传说，大概有五种不同的结局：大家所熟知的，是《三国演义》的处理：吕布助王允诛灭董卓后，以貂蝉为妾，后来曹操擒杀吕布，将她载回许都，此后便下落不明。元人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只存曲目，不详内容。从题目中得知貂蝉死于关公刀下，这与民间传说相似：曹操绞杀吕布，貂蝉落到刘备手里，刘备、张飞都想娶她。关公怕误了国事，一刀斩之。

还有一种传说：曹操打败吕布后，把貂蝉赐给关羽。这样，一则可以笼络住这个将才；二则可以让关羽沉湎女色，丧失斗志；三则能挑拨他们兄弟间的关系。不料，这个计谋早被关公识破，坚决拒绝接受。曹操无奈，只好让关公把她杀掉。貂蝉觉得，一片赤诚最后竟落到这个下场，便伤心地痛哭起来。关公动了恻隐之心，要放她出走。可是，到哪里去呢？貂蝉决心削发为尼，远离世事。于是，便护送她到了几百里外的净慈庵。貂蝉还有一种结局，是修仙得道，成了正果，事见明人诸葛味水撰《女豪杰》杂剧。

近时又有人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共分五场：水淹下邳；貂蝉修书；关羽慕蝉；群雄惊艳；残月芳魂。写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水淹下邳。貂蝉劝吕布归顺曹操，吕布不肯。为救满城百姓，貂蝉遣秦宜禄送书于素所钦慕的关羽，请他转致曹操以百姓为念，立即退水。关羽敬服貂蝉的品识，顿生爱慕之心。数日

后，秦宜禄缚吕布来降，曹操缢杀吕布，为笼络关羽，将貂蝉赐之。成婚之夜，貂蝉柔情似水，即兴唱《倾心曲》，羽亦心旌为之摇荡。刘备恐误大事，遂以送礼为名，提醒关羽勿忘"扶汉兴刘"大业。关羽无奈，只好遣走貂蝉。貂蝉突遭骤变，万念成灰，拔剑自刎。保持了侠骨柔肠、忠肝义胆的完美形象。

说到貂蝉的结局，我联想到了西施。论其行止，二人有相似之处，其事可嘉，其情可悯，当然，实质上都是作了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最后的归宿并不美满，原亦意料中事。貂蝉如上所述，那么，西施又怎样呢？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西施跟随范蠡泛舟五湖，隐居起来。这倒有些风流潇洒，很合乎一般士人的心理要求。范蠡是很有远见的，他早就发现勾践这个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自己"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因此破吴之后，便急流勇退，改变姓名隐遁下去。对于西施偕范蠡归五湖的做法，清代大诗人吴伟业极为欣赏，有诗云："霸越亡吴计已行，论功何物赏倾城？西施亦有弓藏惧，不独鸱夷（范蠡别号）变姓名。"这应该算是最理想的收场。可是，后来核诸史籍，作一番认真考察，才发觉这种结果并不存在。一是，上述情况《史记》中没有记载，只讲吴亡后范蠡变姓名，"浮海出齐"，并无西施随行之说。二是，《吴越春秋·逸篇》载："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墨子·亲士》中亦有类似记载："西施之沉"，以"其美也"。细想一下，这是符合越王勾践阴险狠毒，刻忌寡恩的本性的。虽然同是悲剧角色，相形之下，倒觉得貂蝉的悲惨程度要差一些。

大家一路上，八舌七嘴，聚讼纷纭，不觉已经进了村，来到了据称是貂蝉的出生地，看了根据《三国演义》编绘的"本事"展出和貂蝉的画像，一致感到十分失望，不仅故事显得干涩无味，形

象也黯然失色。这原是必然的结果，《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从小说、戏曲到电视剧，早已深入人心，可以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活灵活现、光彩照人的貂蝉，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可爱有多可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任何什么画像、展览，都成为蹩脚与多余的了。



濠 濮 间 想



走向大自然

“诗意地居住”

我走过许多名山大川，游过不少奇观胜境，每当徜徉于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一片敞开的大地上，总有一种生命还乡的欣慰与生命谢恩的热望。我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于是有了那些写景抒情的文字。

“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因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悠悠万物，生息繁衍，无始无终，而每一个人只是这世界上的短暂的过客，人在大地上的居住只是匆匆过客的短暂居停，而要使这短暂的存在超越瞬间而走向永恒，走向自由，就理应把存在审美化，使之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用海德格尔的话讲，就是"通过原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四者统一于一”。由此便产生了原根意义上的诗性。

其实，在中国，从庄子、屈原到李白、杜甫、王维、苏轼，从诗经、乐府到唐诗、宋词，诗人们一直行进在寻求存在的诗化和诗的存在化的漫漫长路上。这些诗哲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幅幅风景画，它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情绪，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它是人“诗意地居住”的情怀，是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与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美的虔敬与敏锐的审美感受

力相比。

当我面对自然山水时，前人对于自然的盛赞之情便从心中涌出。这些美的诗文往往成为我精神上的导游，引我走向那些人与自然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构成的审美境地，从古老的文明中寻求必然，探索内在超越之路。

曾经游黄山，逛西湖，看绍兴禹陵，蹑长岛诗踪，……在那些留着千百年来许许多多诗心墨痕的所在，我往往是"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美以游心。并不想按照景点导游图的指点，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到此一游"而排队拍照，而宁愿在景深人静处长久伫立，脚踏在实实在在的自在的敞开的大地上，一任尘封在记忆中的此一景的诗文涌动起来，与那些曾经在这里驻足的诗人对话。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一束束性灵之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大自然，成为人们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泉、艺术之源。

当我站在大自然的一座座时空立体交叉桥上，任心中滚滚波涛翻腾的时候，常有一种凿穿了时间隧道、生命隧道的欢愉，有一种超拔的愿望和飞腾的觉悟，有一种走向自由、自在、自为的轻松。渐渐地也有了对于儒、释、道以不同的方式界说的"天人合一"的深悟。

当我沿着历史的长河漫溯，极目望去，也常会感到生命之"重"，前思古人，后望来者，天地悠悠，周而复始。在自然的这一个点上，作为地球上的暂住者，"我"又能想些什么，说些什么？难道仅仅是匆匆一过客？于是，我也留下了自己的心音："春

宽梦窄”，“鸿爪春泥”①。它们，都是我在这自然的怀抱中“自由”居住的宣言书和身份证，是我探寻真源的心灵印迹和设法走出“有限”的深深的感悟。

当我仰望星空，俯瞰大地，许多人生感慨也会从心底涌荡出来。正如清人方熏所说，“云霞荡胸襟，花竹怡性情”。面对自然，“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宣泄心灵深处的欢乐与悲哀、沉重与轻松，物我双会，见物见心，还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生命，这实在是一个召唤，一个诱惑。正是从这里出发，我读懂了许多作家，也读进了自己。青天云霞，让我看尽了女作家萧红的风景线，也隐约展现了自己内心的风景。绍兴沈园，梦雨潇潇，写下陆游一生“爱别离”、“求不得”之苦痛，半个多世纪的爱之梦和沈园那雅淡、萧疏的韵致一起走到我心灵深处，触发着我的情思。七夕牛女鹊桥会凄绝千古的动人传说和“巫山云雨”恍兮惚兮的爱情神话，同样是在自然中倾注心声，也使我“思与境偕”（司空图），一展寓意之灵。

我也曾经来到许多前人未曾涉足的山水之中。在那些未经开发的、原始粗犷的自然景观中，蕴藏着一种野性的力量，一种蓬蓬勃勃的生机，并且总是在熏染着、启迪着、暗示着人们，给人以旺盛的、健朗的生命活力，给人以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给人以冬春相继的乐观信念。千里翰海、万顷荒原、巍巍高山、莽莽苍穹，这样一些在时间上悠远，在空间上浩瀚的景物，往往成为可以与之直接对话的生命之灵。

在九寨沟，我惊叹造化神工，“清风白水”般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令人忘情。“那淙淙飞瀑，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

① 作者的散文集和诗集。

虫鸣，那水中五光十色、迷离扑朔、绚丽多姿的碧波，山上宛如娇羞不语、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笑靥的杜鹃花萼，那隐现在水雾氤氲的瀑面上，酷似七彩神龙夭矫天半的虹彩，那原始森林中绿茵茵、暄蓬蓬、绒毛地毯般的地衣和悬挂在枝头的一丝丝、一缕缕、随风飘荡，如新娘头上轻柔的婚纱的长松萝，那五角枫、高山栎、黄栌木、青榨槭的如霞似火、燃遍天际的醉叶，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都在人类感情的琴弦上奏起美妙的和声，不期而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在这里度过一个假日，真像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清风白水》)

在新疆，行进在茫茫瀚海之中，才真正感到生命有涯而大块无涯。"坦坦荡荡的大戈壁，无丘无壑，无树无草，平展展一直伸向天际，苍茫的大地托着浩渺的天穹，显得格外开阔"。至此，才真正有了"春宽梦窄"和"百年一瞬，万古如斯"的感叹，才在灵魂深处与千百年前的那个声音和鸣："哀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

在西藏，独特的社会历史、民族风情，神奇的自然环境和高原风光，以及那随雅隆河一起流淌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史事，给人以更多的遐思，而美丽动人的神话又增加了它的神秘感和诱惑力，使人渴望融入这色彩纷呈的大"一"。

"保护、保存"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是我们"诗意地居住"的前提，是我们以性灵之光驱逐黑暗，让大地不再被遮蔽的路径。然而，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却往往忽视和忘却了大地的恩泽，野蛮地践踏它。有朝一日，当大自然失去了青春、活力和平衡时，它会痛苦而愤怒地对人类实行报复，这种报复又立即会使人类陷入尴尬的困境。我曾经对践踏和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表示愤

怒，为那些戕害大地也贬低自己的人感到沉重。有时，我甚至想，假如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那么，宁愿让自然美景再沉睡百年，直到人类的“居住”真正成为“诗意的居住”。

无论如何，山水万物与我们同在。诗人何为？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似乎读懂了庄子，也读懂了海德格尔。又似乎与荷尔德林长谈，吟着他的诗，“我们每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

把山水捧起来读

山水是自然景观，而在诗人眼中，则是以丹青妙笔描绘出来的一幅幅绵长浩渺的画卷。有一千个诗人就会有一千种形态各异的画面。艺术忌讳雷同，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画出自己心中的山水画，通过巧思、气韵和独到的用笔之功，创造出自己的“这一个”，实在是大费周章的。

我写《读三峡》这篇游记散文，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关于三峡的名篇，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都是大手笔。超越他们不容易，创新却是大有文章可作的。艺术探索的天地，广如寰宇，深似渊海，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坚持一个总体把握的路子，努力从大处落墨，做全景式叙写。不侧重当时、当地每一具体景物的描摹，不局限于个人所见的事物本身，不停留在某件具体事物上，不着意于刻画个别情节。设法写得超拔、空灵一些。

首先，我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捧起来读。就是说，我不是由点到线，移步换形，而

是着眼宏观，进行总体把握，从现实有限的形相转入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开拓出融心理境界、生活体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于一体的多维向度。我写，“一些峭拔的石壁，由于亿万年风雨剥蚀，岩石显现出许多层次异常分明的轮廓，或竖向排列，或重叠摆放，或向两侧摊开，使人想起‘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诗句。”我进而感慨，“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履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作品中讲述了与三峡紧密相联的悠悠岁月，从大溪文化讲起，联想到几千年的历史、人物，不惜笔墨，大写特写。这些虽然不是三峡本身的景物，但与三峡关系密切，写得好，可以增加历史感，使人深思遐想。

我觉得这种游记写法，即以一种博大的胸襟，尽量把它放到历史的流程中去进行宏观把握，可能增强深度与力度。在散文创作（包括游记）中，愈是自由地联想、概括，省略一些事物的特殊过程、众多细节、微妙差异，形象往往愈是鲜明。没有概括，就难以进行形象的净化与情思的聚焦。通过宏观把握，通过概括与联想，可以凝聚历史、凝聚哲学、凝聚生活。当然，概括不是空泛的议论，不等于大而化之，还必须体现感情客体的特殊点，否则你笔下的滕王阁就与岳阳楼没有差别了。

写游记散文，并不单纯为了写景，亦是感情的自然流泗，是一些难剪难理的情怀的疏通。是在寻求内宇宙与外宇宙的沟通，唤回对自然的感受，以此来丰富现实生活的内在性、多样性的心

灵欲求。这种充满苦累的心灵跋涉，并非得之于红灯绿酒，舟车簸荡之间，多是成于心境沉酣之际。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迸发于内心深处，是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的思想感受。就这个意义说，散文是为自己而写的。

有了独特的生活感受，就往往可以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即一个"以心灵映射万象"(宗白华语)的独特的艺术视角。它是艺术构思的起始点、切入点，是感染读者的最佳导向，是作家与读者的心灵交流的焦点的最佳选择。

我写游记，不论是写景、抒怀，面对着感情的客体，总习惯于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认识它，把握它，表现它。在纪游中，种种意蕴、情态，往往以一个独特的意象，以直觉的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情呈现，就是把视点归结到直觉形式上。直觉形式看似很简单，但它背后所包罗的几乎是作家的整体生命。以我的游记散文《青天一缕霞》为例。萧红是我喜爱的一位女作家，幼时读她的《呼兰河传》，记忆最清晰的一个意象是"火烧云"，七八月的巧云。后来读到聂绀弩的"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的诗句，更强化了这个意象。待到访问萧红的故居，一下子又想到了当时她双手支颐，仰望云空的情景，想顺着她的视角看一看北国的云霞。这里也加进了我个人的癖好，就是常常把天上的云和地上的人联系在一起思考。云，成了这篇游记散文的独特的视角。我也考虑过，如果不是这样构建这篇游记散文，这篇作品很可能写成一篇平庸的泛泛的文字。

再如，《祁连雪》，这是我游览河西走廊后写的一篇游记。每一个面对这大漠戈壁的作家，相信都会发思古之幽情，射出无数支向往的神矢，鼓振着玄想的羽翼，设法观察、描绘它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诸般色相。这里，奔驰过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车骑，勇

探虎穴的班超的鞍马，飞扬过和亲乌孙的细君、解忧两公主的车尘、闪现过乘危远迈、策杖孤征、西天取经求法的玄奘的身影，也展现过隋炀帝会见二十七个国家君主的盛大场面，这里也有大漠孤烟，瀚海行旅，悲笳互动，驼铃丁冬的动人图景。驰车河西走廊，眺望那笼罩苍冥的一派空蒙，仿佛能谛听到自然、社会、历史的无声的倾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激动和沉甸甸的时空感被呼唤出来。觉得有许多世事已经倏然远逝，又有无涯过客正向我们走来。为了把如此丰富、复杂的心灵观照统摄起来，经过苦苦思索，我找了一个贯穿全局的特殊视角，就是祁连山的雪。通过它的连缀，把我对河西走廊的历史感、沧桑感、亲和感描绘出来。正如毕加索所说的，“观念与情感终于在他的画幅之内成了俘虏。无论怎样，它们不再能逃出画幅了。”如果把画幅作散文理解，即作为视角的直觉造型来理解，真是确切不移的了。

总之，散文作家心中要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绿洲。记得过去看过这样一则趣话：有位农夫好心地询问一位正在林中潜心作画的风景画家：“先生，这大片森林都在您的庄园里，您已经拥有了它，为什么还要在画布上画那些桠枝杈杈的老橡树呢？”画家一边涂着画彩，一面漫声答道：“名下所有与心中拥有不是一回事。”艺术是心中拥有的东西，而创作，则是进行情感交流，让精神的灵苗自由自在地湍动往还，在这自由的天地里，敞开“本我”。或收心内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或径情直遂，与二三知己开怀畅叙，无忧无虑地披露心迹、个性，把襟怀、气质、追求、取向赤裸裸地交出去，这毕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

（本文是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的讲演稿）

采石江边

像一匹奔腾不羁的骏马，万里长江挟着巫峡雨、洞庭烟、匡庐雾，穿过楚尾吴头，滚滚东来。进入当涂县境之后，由于天门山的拦阻，又扭转身躯向北狂奔。人们把江东采石矶与北岸和县相对的这一段江面称为横江。李白的诗句"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都是写的这里。作为金陵的咽喉，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群雄角逐的战略要地，南北争衡的江防要塞、关津渡口，素有"险塞甲于东南"之称。

有人统计，从周灵王二年到清同治二年的二千四百三十三年间，仅附近的芜湖一地，就发生过五十四起大的战役；而采石矶（古称牛渚）还要大大超过此数。最早见于史册的，是发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吴楚长岸之战。这是一个以智取人、转败为胜的著名战例。先是楚令尹公子弃疾杀楚灵王自立，是为平王。吴国乘楚之乱，出兵讨伐。平王心衔此恨，整军经武三年，至周景王二十年，乃使令尹阳匄、司马公子鲂率舟师伐吴，在长江东岸采石矶至马鞍山一线号称"长岸"的地方，摆开战场。吴军初战失利，最大战船"余皇"为楚俘获。入夜，吴军统师公子光派人潜水往伏"余皇"之旁，然后，率众夜袭楚军舟师。楚舟师列阵不动，吴军不敢近前，便环绕舟师呼叫"余皇"，船上竟有人答应，三呼三应。守"余皇"的将士因搜寻内奸而自行混乱，邻近各船前往救助。吴军遂乘乱袭击，楚军舟不成队，西向奔逃。

此后，战事就像连山列阜一般，绵延不断，史不绝书。其中密度最大或说频率最高的时期是两晋南北朝。一次，晋武帝与羊祜密谋伐吴之策。羊祜认为，伐吴应借上游之势。遂密令龙骧将军王濬在蜀治水军，以万余兵士造舟舰器杖，操练水军三年。公元二八〇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当日东吴兴于牛渚，此时全局尽输，亦与失去牛渚有重要关系。当然，东吴之败，是由于长期府库空匮、民不聊生、君臣疑忌、军心涣散使然。但晋吴之战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江控制权的争夺。长江要津，当时有夷陵、江陵、江夏、武昌、巴丘、牛渚等处，对于东吴来说，牛渚作为京都屏障，尤为重要。而开战之初，吴军却主动放弃牛渚，因而造成了羊祜所说的“一处倾坏，则上下震动，虽有智者亦不能为吴谋”的不可收拾的局面。当然，这是就当时而言。时移世异，史影苍茫，难免如王右军所喟叹的，“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五百多年之后，唐代诗人杜牧，泊舟牛渚，览江山之胜迹，吊晋吴之兴亡，题诗叹曰：“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帝业王。至竟江山谁是主，苔矶空属钓鱼郎。”

西晋灭吴，天下复归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季以来九十余年的分裂局面，但战事并未就此终止，而是根盘结错，像麻团一般，愈扯愈乱。八王之乱中，晋右将军陈敏据牛渚对岸之历阳叛乱，遣其弟陈宏戍守牛渚，占领江东之地。兵败后，琅琊王司马睿据此，始建东晋基业。十五年后，大将王敦叛乱，自芜湖出兵进袭牛渚，攻占石头城，临淮太守苏峻率军入卫建康，平息了王敦之乱。而后，苏峻又据牛渚以叛，为陶侃所平息。再往后，桓玄篡晋，刘裕讨伐桓玄，都曾攻取牛渚，陈兵采石江边。刘裕小字寄奴，以匡扶功，受东晋恭帝禅让，为南朝第一位皇帝，即宋武

帝。八百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怀古伤今，以词赞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漫步采石矶头，放眼横江两岸，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就是那些攻城略地的"一世之雄"，包括"孙家兄弟"、"晋龙骧"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都可谓战功赫赫，名重当时，可是，为什么竟没有几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相反，"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倒是那个名叫李白的无拳无勇的落拓文人，却能在采石江边，独步千古。对此，太白楼一幅联语作了更明确的概括："大江淘尽英雄，诗卷长留天地。"诗人杜甫也有类似的论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究其原因，也许白居易《李白墓》的题诗道出了一丝隐秘："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明代文人方孝孺有《吊李白》一诗，讲得更为透彻："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我言李白古无双，至今采石生辉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终当埋没声不扬。黄金白璧不足贵，但愿男儿有笔如长杠。"

采石矶一带古墓葬很多，最负盛名的要算青山的李白墓，而且，里面实实在在地埋葬着诗人的骸骨。令人奇怪的是，离它不远的地方，采石公园里还有个李白的衣冠冢。古往今来，这类事例可说是绝无仅有。原来，对于太白之死，历来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很流行的传说是，李白身着宫锦袍，醉酒采石矶头，跳江捉月，溺死横江，其衣冠被渔人捞出葬于采石。现今江心洲尚有宫锦村，相传李白衣冠即打捞于此。后来，不少诗人都在诗词中坐实其事。邱濬诗云："当时落水非失脚，直驾长鲸归紫清。至

人虽死神不灭，终古长庚伴月明。”李东阳说得更好：“人间未有升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为此，千百年来，采石矶的李白衣冠冢与青山的李白墓，长期并存，同样因墓主李白而名闻遐迩。这类跳江捉月、骑鲸上天等美丽动人的传说，广泛流传于民间，反映了人们的善良愿望，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位伟大的诗人，不仅为世世代代的文人墨客、达官政要所倾慕，而且活在广大普通民众的心里。

采石矶另一处著名古墓葬，是早于李白五百多年的三国时期朱然的墓。朱然为东吴名将，北抗曹魏，西拒蜀汉，建安二十四年与潘璋在临沮生擒关羽，一生累建战功，官位与周瑜相伯仲。这在《三国志·吴书》中早有记载，但后来的《三国演义》并没有着力描写他，致使后世知之者较少。说来也很有意思，这样重要的一位名将，后人、包括当地的父老，竟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直到一九八四年马鞍山市纺织厂进行基本建设时，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墓地，无声无息地在地下沉埋了一千七百多年。这与李白墓的红红火火，沸沸扬扬，恰成鲜明的对比。

记得一位著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人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例子，他举了颜渊、伯夷等人。我以为，李白也是。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先启后，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士有遇与不遇之别，山川也不例外。滁州的琅琊山，有很高的知名度，一篇《醉翁亭记》使它名满天下，万世生辉。但是，假如欧阳修当年不到滁州，或者虽到滁州却无醉翁、丰乐二亭之记，那么，这座普普通通的琅琊山，就会像它的万千同辈一样，永远不为外人所知。琅琊山下有个西涧，欧阳修曾说：“西涧无

水。"可见宋代就已干涸。但因入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篇，便与三光、五岳同其不朽。而且营造了一种意境，人们只要想起那草生涧边，莺鸣深树，晚雨潇潇，春潮急涨，一舟浮荡，野渡无人的荒疏、幽静的景致，眼前便会展现出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艺术境界。此之谓文章的伟力。实际上，琅琊名胜的开发始于唐代大历年间，早于欧阳修三百多年，比韦应物题诗也要提前近二十载。唐滁州刺史李幼卿凿石引泉，鸠工建寺，尔后经过数十任州守踵事增华，才有后来的隆盛。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欧阳修那样，"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也没有留下《滁州西涧》之类脍炙人口的诗章，结果，只能让欧、韦二公后来居上，占尽了风流。

桃花源，不过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乌托邦"，是诗人创造出来的理想国，实际并无其地。但千余年来，人们因文设景，从未间断过对它的寻觅、营造与追求。结果，各地出现了多少个桃花源。湖南不但有个桃花源，连它所在的县都以"桃源"命名；江西也有一个，因为陶公的家乡在那里，又当过彭泽令。两地都说得真真切切，有互不相让之势。其实，真正的桃花源只在陶渊明的心中。不用说这类经文人专门描写过的风光、人物，即使只在某篇名作中被随便点上一笔，有许多也名传千古了，如刘子骥、滕子京，就是。

联系到这些实例，觉得曹丕说的"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确是不刊之论。当然，话又说回来，也并非任何人、任何文都能如此。伟大与永生，总是同社会发展、人类命运这些崇高的事业联结在一起。而且，时间无情，读者无情，留存下来

的只能是精品。一部文学史，就是一条巨浪淘沙的大江。面对这“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不禁懔然怵惕了。

濠濮间想

《庄子·秋水》记载：一天，庄周和他的朋友惠施同游于濠梁之上，看到鲦鱼出游，庄周说："鱼这样从容悠闲，它们很快乐呀！"惠施反驳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庄周回问道："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秋水》篇还记述了庄子钓于濮水，楚王聘他为相，遭他谢绝的事。后以"濠濮间想"形容逍遥闲适、淡泊无求的思绪。语出《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康熙皇帝先后在北京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庄建了"濠濮间"和"濠濮间想"的同名景亭，可见他对庄子的清高与玄想是很欣赏的。当然，也和他久居宸闱，向往林泉有直接关系。《庄子》旧注，濠梁在安徽凤阳钟离郡。秋初，因事道经其地，我想到濠梁遗址看看，通过体味庄、惠观鱼论辩的逸趣，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濠濮间想"。

可是，实际碰到的却是另一种风景。原来，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所以，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街头充斥着"大明"、"洪武"之类的广告；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标明曾是朱皇帝的御膳。还有凤阳花鼓，更是关系至大。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却于花鼓戏情有独钟，从小就喜欢哼哼几句。位登九五之后，家乡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去祝贺。皇上看了，乐不可支，特意颁下旨令："一年三百六十

天，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这些人得了圣旨，自是兴高采烈，一年到头唱个没完，谁还肯去出力种地！特别是由于连年劳役，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结果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里就涉及到两处工程浩大的“皇帝项目”：一是明代中都城。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决定在家乡建都。动用全国百工匠作、民夫、兵士达四十万人，持续六年之久，“造作之费以万万计”。在即将竣工的前夜，因为万方怨悱，才以“劳费”为由下令中止。六百多年后的今天，站在城池、宫阙基址上，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的闳阔和宏观的壮伟。另一处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九年间，建了皇城、砖城、土城三道，皇城内有正殿、金门、廊庑、碑亭、御桥、华表，和三十六对石人石兽。现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细，宏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两处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但从个人情趣来说，我却觉得嗒然无味。

我的兴趣还是在濠梁之上。可是，得知我的想法后，当地朋友劝阻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怕是什么痕迹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我却认为，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所谓“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型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超越时空限界。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论、逻辑思维、艺术哲学等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个大哲学家的思想、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鱼乐与否，庄子是凭自己的经验推测出来的。自己“出

游从容"，感到心里愉悦，于是推测鱼必然也是如此。于人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通感"，人与人之间便无从知解，失去了心灵沟通的可能性，艺术创造也就无法实现了。艺术家总是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仿佛外物也具备了同样的情感。这种心理活动，在美学上叫做"移情作用"，例证举不胜举。比如，路上我看到一幅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内容十分深刻。但是，何以华灯如梦、明月有心，它们也具有了人的思维和情感？原来，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说过，在濠梁观鱼中，庄子所代表的是以无用为用、忘我物化的艺术精神；而惠子所代表的则是"遍为万物说"，以"善辩为名"的理智精神。二人的辩难，悉由此不同的典型性格而来。这是颇有见地的。两人的志趣确实有异。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的一往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从而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感情与知觉对鱼作美的观照，或如康德所说的进行"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在进行理智解析，以他的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当然，若作深一层的探究，他们之所以如此，又与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紧相关联。

还是在《秋水》篇，庄子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为梁惠王相，庄子去见他。有人说，庄子此行意在取代惠子的相位。惠子听了很紧张，连续搜捕了三天三夜。庄子却主动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栖，

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当时飞过来一个鹞鹰，嘴里叼着一个死老鼠，见鹓鸰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现在，你也惊怕我来夺你的相位吗？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载，庄子在孟诸垂钓，惠子过之，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心里很不得劲，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跋扈的轻蔑态度。由于他是高踞精神之巅俯瞰滚滚红尘，而以超拔自命，因而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自由，追求的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从濠梁观鱼中也看得很清楚。

见我执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请来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车出凤阳城，直奔临淮关，来到了钟离故地。我们谈到，二百多年前著名诗人黄仲则曾经到过此地，这从他的以《濠梁》为题的七律中可以看出："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蹟唤停车。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经过一番寻寻觅觅，我们终于来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庄惠临流处"。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旧，只是太污浊了。当年如果竟是这样暗流翻滚，恐怕庄老先生就无法看到"鯈鱼出游从容"，也就作不出那篇水清鱼乐的传世之文了。

生命的承诺

在春与夏交接的时刻，我披着一身蒙蒙的雾雨，投入了张家界的怀抱，践了生命中的一个信约。

我不只一次地听人说过，不到张家界，休谈自然美。因此，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实地验证一番这句话的准确程度。过去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名山胜境，过蒙青盼，屡经品题，然而声名过实，留给人们的无非是失望，是怅惘；而芸芸众庶的旋风、潮水般的趋从与膜拜，更加剧了它们的俗浅。这自是胜地的悲哀。

号称"峰三千、水八百"的张家界，山川秀色极富个性魅力，般般美景都在我的经验与想像之外。可以说，任谁身临其境，都会目眩神摇，惊叹大自然天工开物，鬼斧神工。说"身在画中游"，绝无半点夸张，我就是把它当做一幅幅硕大无朋的泼墨的山水画来观赏的。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它的神韵。清新，清丽，清静，称得上是三清化境，却又不是一个"清"字所能了得。

蛛丝、断线般的细雨，飘飘洒洒，如雾如烟，给翠树青峦罩上一层梦幻似的影象。随着脚步的移动，眼前不断地展开米家父子笔下的霭霭的烟云。置身其间，有不知寄身何处，悠然意远之感。绿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的底色，四月的林峦更是绿得鲜活、秀媚，诗意盎然。叶片在雨雾中生光发亮，原本就绿得醉人，此刻，那青青翠色更逼近到人的心房里。一位同伴为他的奇异发现惊叫着："大家看哪，我们的须眉鬓发，怎么都是绿的？"另

一位朋友郑而重之地补充一句："我觉得，连你的欢声笑语都染上了一层新绿。"

万绿丛中，这里那里，时而露出游人的一把把花蕾、香蕈般的雨伞，衬着青枝翠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浮荡着，也称得上林中的一幅绝景。"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伴着林间的关关鸟语，清洌的山溪一路上弹奏着冰弦，流漾出几许清芬，又似带着淡淡的幽思和清怨，许是因为它眷恋这人间仙境，不愿趁赴那攘攘尘寰吧。雨后的空气，清纯如酿，只要鼓动起双肺的小风箱，吐纳几口芗泽，就立刻觉得神清气旺。难怪美国著名作家梭罗要把瓦尔腾湖畔的新鲜空气装进瓶子，卖给那些睡早觉的人。我真不能想像，久居这人间仙境，看惯了盈盈翠绿、绣水画山的张家界人，有朝一日，面对他乡某些地方童山濯濯的景色，将如何排遣他们心灵上的枯寂，安顿那无奈的情怀呢？

有些地方的山峦，往往隽美中透着几分矜持，又兼远哉遥遥，可望而不可及，不免有一种疏离感；而张家界的山总是凑在游人的眼前，像古人说的"即之也温"，显现出热切地渴望人知的恳悫，予人以亲切、温馨的愉悦。同时，游人也产生一种归属感，觉得自身已经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不禁从心底里认知"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油然漾出那几句稼轩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徜徉于淡烟薄霭之中，和着风声林籁与大自然在同一旋律里脉动，渊然脱却了种种俗嚣物欲，顿有潇洒出尘之感。宛如裸体的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充分体验到心魂的欢愉与自在。这也许正是庄子所肯求的"乘美以游心"的消魂境界；或者，荷尔德林的诗中摹画的"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庶几近之。

张家界的范围实在太大，没有十天半月工夫，是不可能饱览

其秀美的全貌的。一般的游人只能从不同的路径切入，享受一点点自然美，然后带着"尝其一脔"，未尽其余的遗憾，怅然离去。这样也好，龚自珍有诗云："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处好。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踏不上的土地总是最迷人的。留下一种牵肠挂肚的蒙胧追思，付诸余生遐想，胜似不留余地，一览无遗。

早就听说，湘西地区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热情、大方，爱美，喜欢唱歌，可惜由于下雨，失去了一睹风采的机会。正怅憾中，突然从前方隐约传来一串清脆的歌声，似天外飞来，悠扬悦耳。我们快步赶去，只见一块林间隙地上，两个苗族打扮的青年男女正在对歌，四周围着一些观光的游客。姑娘身着色彩艳丽的衫裤，袖口和裤脚都镶有别出心裁的刺绣，看去十分漂亮。歌喉自然是顶儿尖儿。原来，对歌并没有现成的歌词，都是即兴发挥，出口成章，而且合辙押韵。彼此情意流转，表情丰富，映衬出生命的充盈润泽，予人以真的启迪和美的享受。忽然，姑娘向观众扫了一眼，热情地招手，请一位小伙子出来，然后用自编的歌儿，谑而不虐地同他调侃，有两句是："看你美貌不寻常，奈何含羞口不张?"越说小伙子越不好意思，竟飞红着脸，一转身钻回人群中去了。观众欢声雷动，纷纷用掌声对两位歌手表示鼓励和谢意。

大家十分惬意，交口称赞这种颇具湘西特色的人文风景线，东道主听了自是高兴，但话语中仍流露着一种歉然："毕竟我们这里人文景观太少，显得文化氛围淡薄一些。"应该说，这也是实情。文化，作为社会的遗产，个体心理在历史银幕上的映象，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一般风景名胜区，总是历代文化积淀深厚，诗人、名士留下许多屐痕、墨痕的所在。灿烂的华夏

文明几乎为每一处名山胜境都注了册，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因之，我们在赏鉴自然风物时，实际上也是在读诗读史，从一个个景点走入历史的沧桑。而张家界恰恰缺少这一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足迹遍半个中国，写下了《水经注》，可惜他没有到过这里。徐霞客走的地方更多，却唯独漏掉了张家界。古代许多寄兴林泉、钟情山水的诗人，如谢灵运、李白、王维、孟浩然、陆游等，都和此地缘悭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往者已矣，但来者可追。今天，张家界的朋友正在作补偿工作。比如，他们在著名景点黄狮寨的最高处，修了一个六奇阁，凭栏远眺，可以纵览山、水、云、石、动物、植物之奇观，并请羊春秋教授撰联："名动全球到此真堪三击节，势拔五岳归来不用再看山。"隽景佳联，交相辉映。"但肯寻诗便有诗"，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很欣赏他们的这番话："在几千年的秦风汉雨中，我们的祖先错过了太阳，今天，我们再不要错过月亮与星辰。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张家界的山水文化推上一个新的层次。"

是的，同一切资源一样，文化资源颇有待于开发。我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中，得知这里有张良墓，据道光三年的县志记载，张良得黄石公授书后，从赤松子游，殁后归葬于此。听说张家界的得名即与此有关。据我所知，陕西留坝县有祭祀张良的留侯祠，门旁竖有"留侯辟谷处"的石碑，里面还有回云亭，取功成身退，返回云山之意。这也同样是传说。似可两说并存，因为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硬去辨一个真真伪伪。张家界还流传着当年秦始皇驱山填海，把赶山鞭留在这里，化为金鞭岩的神话。此外，还有维妙维肖、石相天成的"儒士藏书"、"天书宝匣"等景观，都引起了四方游客的浓厚兴趣。一时，我也发思古之幽情，即兴为上述两

个石景题了三首七绝：

祛老天书匿碧虚，山深未走始皇车。
可怜不得长生术，难免沙丘伴鲍鱼！

秦火虽严却也疏，深山犹自有天书。
当时若果张良见，肯向桥头纳履无？

千载攻书立险峰，今时犹见古儒生，
凭虚欲问经纶策，地哑天聋唤不应。

第一首，是讥刺秦始皇的。说为了逃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士们把书册藏匿在高耸云天的山里，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到处寻觅的传授祛老、长生术的天书。只是由于他的征车没有到过张家界，结果，长生术未能到手，最终难免死于河北的沙丘。"伴鲍鱼"也是用典。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尸首放在辒凉车里。时值盛暑，死尸发臭，为了迷惑人，把发臭的鲍鱼放在车上。这里有调侃的意味。

第二首，引用张良的故实。张良少时，曾在桥上为黄石公纳履，黄遂授以天书，说"读此则为帝王师"。后来，果然辅佐汉高帝得天下。这里说，尽管经过一番"秦火"，深山里也还藏有天书，如果张良当时得以见到，那他就不必卑躬屈节地给黄石老人拾鞋纳履了吧？

我觉得，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画布上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可以把游观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有助于他们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

现实风物、自然景观的鉴赏力和审美感。

当然我也认为，即使没有任何社会人文景观，张家界也仍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那种原生状态、荒情野趣，未经人工雕饰的自然天籁，同样是美的极致，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宁馨儿（朱光潜语）。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如何珍惜它、保护它，留下一方方天造地设的美的净土给子孙后代，这乃是世间最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道理很简单，自然创造是一次性的，既没有副本，又不能复制，而且，自然美是易碎品，一旦毁坏了就万难补偿。而审美又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没有人的欣赏，任何自然美都无从谈起。于是就产生出一个悖论：发现了自然美，有时却意味着同它告别；欣赏的同时往往带来人为的践踏。就这个意义来说，张家界开发得晚，未始不是它的幸运。

在我的印象中，张家界是前所见到的管理得最好的风景区。可是，以后会怎么样呢？——对此，我也表示了忧虑与担心。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下述情况确实存在：人们向往于“诗意地居住”，但由于我们的行为并不那么“诗意”，“居住”的结果竟与初始的愿望相左。许多风景区都曾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一经住进，很快就变成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了。

临歧握别时，主人嘱咐我们放心，说：“为保护好张家界的生态环境，我们已经作了生命的承诺。”

三江恋

人们习惯于把祖国的东北地区比喻为引吭高歌的雄鸡，那么，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冲积而成的三江平原，便是这只雄鸡的丰满的颈部和奇突的头部，而素有“东北第一镇”之誉的抚远县乌苏镇，就恰是美丽的鸡冠。

这是一个神奇的所在。盛夏凌晨两点多钟，祖国的其他地方都还在夜幕笼罩下酣然沉睡，而这个小镇已经蓬然醒转过来。在东北方向天地交接之处，首先现出一条红色的亮带，顷刻，毫芒四射，光华耀眼，紧接着一轮红日像顽童似的一蹦一蹦地向上跳动。记得那年也是这个季节，站在泰山日观峰上看日出，是四点三十分，大家都以为是绝早了，可是比这里还晚了两个小时。此刻我才憬然领悟：怪不得小镇边防哨所的战士，将“我们最先把太阳迎入祖国”十一个大字写在墙上。占据着如此优越的地利条件，谁能不充满自豪感呢！

登上高耸云天的瞭望塔，凭栏远眺，但见奔腾北下的乌苏里江在这里与浩荡东流的黑龙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浴着朝晖，闪着粼光，一同欢快地滚滚东奔，追赶那一轮红日。云水苍茫中，乌苏里江上驶过来两艘运载杂货的机船，一幅绝妙的《清江晨泛图》呈现在眼前。遗憾的是，我没有悦耳的歌喉，不然的话，一定要高歌一曲《乌苏里船歌》。

面对着接天盖地的茫茫翠海，我张大着渴望的双眸，尽力在

绿到天边的莽原上，搜寻与辨识着豆畦、麦垅、稻海、粮原，但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绿，这宇宙间最鲜活、艳丽的生命的原色，此刻涵盖了一切，模糊了一切。红日初临，碧空如洗，益发显得天色瓦蓝瓦蓝，以至于浮游的云朵轮廓异常清晰，宛如镶嵌在翠蓝的天幕上的白玉浮雕。一只雄鹰平展着双翅，悠闲地在碧空中滑翔。条条点点的清溪水泊，像白练，像明镜，在下界静静地闪耀着光华。

我见过祖国无数的大小平原，也曾驻足大西北，骇叹过千里戈壁的辽阔，游目骋怀于北美加利福尼亚州的茫茫沃野，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修远、如此完整的弧形地平线。凭高远望，一时忽发奇想：展现在眼前的分明是一把其大无比的打开的折扇嘛，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恰似两个扇骨，地平线相当于扇面的边缘，而脚下的乌苏镇，正处在两个扇骨的中轴，这把大折扇上画满了浓绿、淡绿、翠绿、嫩绿的风景。以前无论在哪里，总嫌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参差错落的建筑群，那些形形色色的障碍物，遮蔽了眼界。这次在三江平原，才真正领略到望眼连天、极目千里的快感。此情此景，大约只有置身天空、海上，尚可得其仿佛。

我这次寻访三江平原，只是涉足它的腹地，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抛在视线之外，不免有遗珠之憾。但就是这些，已经使我梦绕神驰，流连忘返。这里土壤肥沃，水质优良，日照雨量充足，生态环境良好，交通方便，具备发展以绿色食品为主的生态农业和林、牧、渔业的优越条件。这里有成批的国家一类口岸，有内河深水良港和内陆地区借江出海，经鞑靼海峡直达太平洋沿岸诸国的黄金水道，有正在兴建的北起同江、南至三亚的纵贯全国的高等级公路。这里的“三花五罗”、鲟鳇、大马哈等特种鱼和

雪兔、紫貂、丹顶鹤、白尾海雕等珍禽异兽，久负盛誉。一种能够捕获天鹅的猛禽——海东青，自辽金时代即被列为贡品。条件优越，而人烟稀少，区内人口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其发展潜力是无与伦比的。

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世界少有的没有充分开发的亚次处女地，三江平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盛的物质产品，而且是北方理想的旅游胜地。无论是秀绝神州的花开叶落、鸟啭虫吟、牛羊哞哞、流水潺潺的莽原朔野，还是独具塞北特色的森林公园、狩猎场、滑雪场，以及赫哲族民俗村、博物馆，都以其无穷生趣吸引了中外游人。置身其间，仿佛投身母亲的怀抱，回到幼时的摇篮，顿觉远离尘俗，宠辱皆忘，神清气爽，返璞归真。纵有千般尘虑，万种忧思，也会涣然冰释。

三江平原是民族的大家庭，有近四十个民族在这里生养蕃息，和睦相处。又是北方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摇篮，数千年来，他们在耕渔采猎中濡染着风习，开创了文明。统治中国北方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女真族，就是从这里跨上了征鞍，创建了金国，最后跃马中原，灭辽蚀宋的。全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世代聚居此地，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向我们昭示了这个民族的世系源流、经济生活、文化礼仪、风土人情。这个民族富有爱国情怀和抗暴精神。史载，一六四三、一六五八年，赫哲族与达斡尔、满，汉族民众一道，先后三次击溃沙俄的入侵。当地传颂着一首《烈妇歌》，叙述一八六〇年冬月，赫哲族少妇抗拒沙俄暴徒凌辱，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赫哲女子颜如花，夫出从猎妻守家。突来碧眼黄须虏，闯门入室难要遮。妄思鸠占饵以利，继乃威逼戈矛加。由来女子抱贞性，此身可碎心无他"，"彼众我寡势不敌，至死不屈宁嗟呀"。"遐方女子知大义"，"肯将皎玉遭污瑕？"

承赫哲族聚居地街津口乡乡长告知，敌伪统治时期，惨遭日寇迫害，整个赫哲族只剩三百多人，现已增长了十倍。从穿鱼皮，住地窨子、乘狗爬犁，以捕获大马哈鱼次数计算年岁，到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现代化，从单一捕鱼到多种经营。他们说，新生活真是一步一层天。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建国后国家组织了一批批转业官兵、地方干部、科技人员和知识青年，进军北大荒，开发建设三江平原。这里不须费更多笔墨，只要听听沿途的建三江、换新天、红兴隆、大兴、创业、友谊、星火、前进这些农场的名字，就不难记起这支建设大军与万千拓荒者的煌煌盛绩。为开发建设北大荒，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漠漠荒原上，撒播了知识、爱情、友谊、信念的种子。就中有欢乐的乐章，也有沉重的悲歌，有憧憬，有思考，有忆念，有收获。三江平原是一种诱惑，一种挑战，一处献身的祭坛，更是一处建功立业的疆场。有些人已埋骨荒原，他们和同伴一起经历了昨天，却不再拥有明天。也有相当数量的佼佼者，从这里起步，跨上了科学、文艺的殿堂。他们带走了伴和着冷雪清霜的残夜断想，带走了半是甜蜜半是凄苦的难忘的岁月，带走了对黑土地魂牵梦绕的苦恋；而把用汗水血汁和青春的激情、理想的诗意书写的创业史，留给了江花边草，留给了粗犷的荒原，留给了子孙后代。

经过两代人四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十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发展了佳木斯、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城市，建设了一批大农场、大工厂、大林场、大煤矿为主体的新兴经济区。于今，北大荒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改革开放以来，三江平原更跨上了飞驰的骏马，并开始走向世界。

夜深了，昂首疾驰的南下列车载着我踏上归途。我依依不舍

地望着车窗外的佳木斯的万家灯火，望着万籁无声的漫漫荒原，那绿色的晨风仿佛仍在心上吹拂，富含健脑提神的负离子的清新气息还存留在呼吸间。当下吟哦一首七绝：

船歌高亢牧歌甜，碧草如茵接远天。
我与三江期后约，流云逝水两茫然。

晓来谁染霜林醉

凉秋十月，水瘦山寒，霜清露冷，一般是没有多少绮思艳意了。可是，当面对丹枫满坞，绛雪千林，影醉夕阳，光炫远目的奇观丽景，又会觉得秋色撩人，不禁兴薄云霄，飘然神爽。你会带着哲人般的明悟，领略那烦嚣后的萧闲，清寂中的逸趣。作为秋的时令神，红叶包容了春的妖娆，夏的热烈，也承受了风刀霜剑的峻厉，好似揉合着绚烂与平淡、顺畅和蹉跌的七色人生，体现了一种成熟、厚重与超越，是生命的第二个青春。

也许正是为此，古往今来，才有那么多的诗文咏赞它，流传下来许多凄清、隽美的"红叶题诗"的佳话。"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幽怀独抱，寄慨遥深。"乌桕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瑰奇的想像，咏天然的谐趣。同是写醉叶、溪流，"清溪曲逐枫林转，红叶无风落满船"，诗中有画，看了觉得意静神闲；而"劳歌一曲送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美则美矣，却令人有别绪苍凉之感。

健全的人生需要不断地发掘美、滋润美，而竞争激烈、变化急遽的现代社会生活，尤其不能离开审美的慰藉。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应该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同生命的精神补偿统一起来，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因此，每到九秋佳日，无论是北京的香山、南京的栖霞，还是杭州的西泠、长沙的岳麓，举凡观赏霜林醉叶的佳胜地，总是车似洪流，人如潮涌。这原本

是趣味高洁的雅事，可惜由于人满为患，有时一番盛会过去，便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失衡，造成自然景观的人为践踏。目睹美的告别，参与对于美的酸楚的祭奠，这该是最令人痛心与伤情了。

其实，美是到处都有的，关键在善于发现。人情贵远而贱近，踏不上的泥土总认为是最甜美的，遥远的地方都存在着一种诱惑。至于说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则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对此，诗人刘大白意甚不平，感喟无限，有诗云："故乡多少佳山水，不似西湖浪得名！"这使人想起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的故事：两个孩子走遍了天涯海角，也没有找到象征着幸福的青鸟，最后失望地回到故乡，却意外地发现，青鸟原来就在自己家里。

回过头来还说红叶。辽东山区有个宽甸，宽甸北部的天桥沟是个观赏红叶的好去处。就人文景观来说，较之前面列举的几处名山胜境，当然甘拜下尘；若论观赏红叶，天桥沟则毫无逊色。一曰壮美。整个景区面积达六万亩，真个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霜飞一夜，红透千林，赤叶灼灼，喷焰缀锦，确是最壮观最浓艳的秋色。无以名之，也许称为"醉美"略能得其仿佛。二曰清幽。跨进山门，就闯入了红枫世界，顿觉高邈的天穹和弥望的林峦全被烈焰烘着了，只把一带寒光留给了喧腾的溪涧。红枫潭里，倒影摇红，上面是赤叶烧天，下面有红潮涌动，煞是迷人。偶尔一两片醉叶翩翩落下，顺着回曲的山溪款款漂游，我们的神思似乎也随之悠然远引。山坳里稀稀落落地点缀了几户人家，襟山带水，掩映在红云绛雾之间，在静如太古的苍茫中，织结出一幅如烟如梦的桃源仙境。小村的名字，方志中没有记载，地图上也找不到，可是，那种超渺的意境，在宋元人的画卷里却似乎领略过。

过去观赏红叶，常常是驰车路上，望中确也是霜红满眼；可是当停车静睇时，却又往往不见了那种绚烂与辉煌，未免嗒然失望。原来，因为车速很快，入望的景色还没在视界中消失，前面的景色又重叠过来，我把这种反复重合的现象，杜撰为"虚幻的聚焦效应"。天桥沟不存在这个问题。漫山遍坞，塞谷堆崖，红叶触目皆是。无论是走着看还是坐下瞧，效果都不会发生变化。当然，最理想的还是拾阶登临四百米高的莲花峰。凭高四望，千林红树宛如火伞齐张，把暗壑晴峦都妆点成了锦绣世界。在红雾弥漫中，独独凸现出俗称"四面佛"的四个石景：一个酷肖弥勒，一个状似菩萨，一个像孙悟空，一个像撅嘴扛耙的猪八戒。这还不算蹊跷，出奇的是，悟空面西，表明西天取经矢志不移；而八戒脸朝东北，一心想回老家长安。神工鬼斧，石相天成，看后令人拍掌叫绝。还有值得缀上一笔的，是"天桥沟"这个名字的来历。承一位同志告知：这里雨过天晴之后，常常出现一条天桥般的彩虹，"桥身"架在南北两座山上，"桥背"顶着浩渺的青天，构成一种独特的景观。

说来也是一件憾事，这般"绝代佳人"，却幽藏深谷，无声无臭地度过了无涯岁月。同行的一位政协委员说，怨只怨历代的诗人赋客足迹不到，所以，这里就没有留下枫桥夜泊、西林题壁之类的千古名篇，也不见有望岱、登楼的佳作。县委书记笑着接上了话茬儿："咱们这里虽然没有文豪光顾，却有过万古流芳的名将。"他指的是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八年，杨靖宇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和抗联一军转战东南满北部山区，曾以天桥沟为中心根据地，利用山深林密的有利地形条件，与日寇、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山下的方家隈子，建立了东北早期的乡级红色政权——四平乡人民政府。解放后，安东

市政府在天桥沟树立了抗联遗址纪念碑。至今，深山里还保存着杨将军住过的岩洞——群众亲切地称之为“杨洞”，以及战士的密营和简易医院的遗迹。如果红树青山是一排排回音壁和录像机，当会录下六十年前抗联战士伏击日军守备队的震耳枪声和少年营血战崔家大院的悲壮场面。这里现已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古人有“景物因人成胜概”之说，于此进一步得到印证。

在天桥沟，听到一个引人深思的小插曲：前两年，林业局普查山林，两个青年职工历尽艰辛攀上一个峰峦，兴奋之余，自豪地说：“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登上这座高峰的人。”话刚落音，转身瞥见一根已经锈蚀的步枪通条挂在一棵老树杈上。面对当年抗联战士的遗物，他们为自己对历史的无知而脸红了。

时间老人毕竟是峻厉无情的。一经流逝，便旧影无存，不问金戈铁马还是碧血黄沙，转瞬间都成了背景式的记忆。结果，在许多后人看来，这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从来就是一片乐土。殊不知，中原血沃，劲草方肥；没有先烈们“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又怎会有今朝的红葩硕果！

晓来谁染霜林醉？此刻再看满山的红叶，我觉得对于四百多年前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诗句：“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加深了一层理解。

八公山下吃豆腐

去年夏初，接到淮南市的淮硖画院的一份专函，谈及该院定于第五届中国豆腐文化节期间，举行书画作品展览，“旨在弘扬民族书画艺术，展示当代名家风采”，特邀我为这次书画展提供一份诗词、书法作品。

我与这家画院向无联系，也没有任何熟悉的同志；而且，我的字也缺乏功力。本拟婉言辞谢，但又考虑到，这样处理很没有礼貌，有负画院千里驰函的一片诚意，便硬着头皮写了个条幅。至于内容，当然应该切近淮南这个特定环境。我曾想到，淮南为我国大型能源基地，有“华东动力之乡”的盛誉；这里有距今约十亿年的古生物化石群，一千六百多年前发生过著名的淝水之战；还有“桔逾淮而北为枳”和“淮南一叶落，天下便知秋”的故实；我也记起了曾被王国维击节称赏的白石词中“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的名句。——这些都可借来作些文章。但我还是选了豆腐这个主题。

《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是国内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汉高帝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召集文士数千人，探讨学术方技，研求治国良策，著书立说。同时与左吴、李尚、苏非等八人在都城寿春的北山（今八公山）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仙丹没有炼成，却制出了豆腐。从此，淮南的八公山豆腐便出了名。其

实，丹结黄白之术本属于虚乌有，服食成仙者绝无，而中毒致死的数不在少。倒是豆腐确有丰富营养，久食可以延年益寿。这也叫"歪打正着"。一九九二年以来，为了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淮南市政府每年都在豆腐祖师爷刘安诞辰的九月十五日举办一次豆腐文化节。届时开展多种经贸洽谈活动，也包括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想来书画展便是其中之一。因为索稿甚急，来不及自铸新词，我便采取了偷懒办法，把明代号称"景泰十才子"之一的苏平的《咏豆腐》七律写出来，寄过去。诗云："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退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去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一扣淮南，二扣豆腐文化，倒也贴切。

由于有了这一段"姻缘"，八公山也就在我的胸臆中打了个情结，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魂之外，又多了个"豆腐西施"的倩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一睹其姿色。事有凑巧，去年秋末，因事道经淮南。接待中，当地主人说起了参展的事，并陪同我们游览了黛色苍苍、钟灵毓秀的八公山，看了淮南王刘安的墓，自然也谈到了"淮南鸡犬"的典故。宋代诗人晁之道的诗句："一时鸡犬皆霄汉，独有刘安未得仙"，固然别有寄托，而求仙者最后还要埋骨地上却是实情。

午间，东道主热情地在八公山区举行了豆腐宴，招待我们一行。八公山的豆腐，果然是"名下无虚"，不仅洁白细腻，清爽滑利，而且品种繁多，营养丰富。仅在那天的筵席上，我们就品尝了采用烹、炸、煎、烩、炖、汆、烧、扒、炒、煨等烹调方法做出的近二十种豆腐佳肴。翌日，在寿县的八公山乡，我们又享用过有"三绝"之誉的奶汤、漂汤、鲜汤等多种花样的豆腐烧汤。席上有一味"凤阳酿豆腐"，主人还给我们讲了这道明代宫廷名菜的

来历。原来，凤阳离八公山很近，这里也盛产豆腐。朱元璋的父亲就卖过豆腐，但朱元璋小时候却很难吃到。一天在讨饭中，他偶尔得到一块豆腐里夹上馅经过油炸而成的酿豆腐，吃了觉得特别香。当上皇帝之后，他还总是怀念这味食品。于是，便从家乡请了一位厨师到宫廷里，专门给他做这道菜。这道明宫中的必备佳肴，色泽金黄，外脆里嫩，味道酸甜适口，鲜美异常。后来，中原战乱，这一带的居民迁移到广东东江地区，成为“客家人”，又把做酿豆腐的技术带过去，于是东江酿豆腐成了蜚声中外的一道名菜。

至于上了菜谱的地方风味的豆腐名菜，至少也在百种以上。像川菜中的“麻婆豆腐”、“崩山豆腐”，鲁菜中的“三美豆腐”、“九转豆腐”，闽菜中的“珍珠豆腐”、“卤豆腐”，湘菜中的“开口豆腐”、“包子豆腐”，粤菜中的“蚝油豆腐”，浙菜中的“三虾煎豆腐”，鄂菜中的“葵花豆腐”，京菜中的“朱砂豆腐”，等等，风味独具，各臻其妙，赢得八方食客的交口称赞。于今，八公山的豆腐已经飘洋过海，走向世界。同名震环宇的中国四大发明一样，制作豆腐的技术传遍了亚、欧、非、美各大洲。日本人传说，中国豆腐是由鉴真和尚传入东瀛的，时在公元七五四年。日本豆腐业一直敬奉鉴真为师祖，至今，豆腐包装袋上还印有“唐代豆腐干淮南堂制”字样。一九六三年日本纪念鉴真大师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到古都奈良唐招提寺参加盛会的，各行各业都有，其中豆腐制作业的人最多。中国四川的“麻婆豆腐”，风味独特，具有汁色红亮、麻辣嫩烫、肉末酥香的特色。日本人掌握了它的制作工艺之后，改为软罐头包装出口，深受东方及欧洲社会的欢迎。

“走遍了南北东西，吃过无计其数的豆腐，为什么同是大豆作原料，八公山的豆腐却最为鲜美呢？”席间，我向东道主提出了

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一凭人工，二靠自然。所谓“人工”，就是原料挑选严格，豆子磨得精细、均匀，豆渣淘得干净。理学家朱熹有一首五言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似乎做豆腐比种豆子容易，可以坐获财利，其实并不尽然，这里面有很精到的技术。主人说的“二靠自然”，是指借助地利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当地人们就用这一带的甘洌爽口的山泉做豆腐，做出的豆腐细如脂，白如玉，柔软细嫩，格外鲜香可口。细细玩味朱老夫子的诗，也许包含这层意思。

八公山一带有二十四名泉，其中以凤凰山下的珍珠泉为最。明代御史杨瞻有诗赞曰：“清清灵脉发，闪闪瑞光浮。尘垢难污洁，珍珠不断头。”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变化。清池四周绕以石栏，内有珍珠般的泉脉汩汩涌出，水极清洌，无纤毫杂质，数米之下的硬币可以清晰地透视花纹。泉水通过一石刻龙头滔滔滚滚地流出去。两千余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淹城访古

常州，世称“八邑名都”，是一座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古城。当地的同志很谦虚，说是：只缘毗陵（常州）无山水，一丘一壑也称奇，敝帚自珍，无足观赏。实际并非如此。诸如号称“东南第一丛林”和“梵刹之冠”的天宁寺，被誉为“拟仙都之仿佛”的红梅阁，传说“开甲第之先兆”的千年古塔文笔塔，以及一代文豪苏东坡的终老之地孙氏馆和“孤舟一夜许相依”的舣舟亭，都是遐迩闻名，颇堪游览的。但我因为记起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便只选定了淹城遗址，其它名胜限于时间只好割爱了。

报载，淹城坐落在常州城南九公里的武进县湖塘乡，是三千一百年前的商朝淹国都城遗址，在我国最古老的地面城池中算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九五八年以来，这里出土了独木舟和多种青铜器具、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陶器。被称为“开天辟地第一舟”的独木船，全国现今只发现十几只，而淹城一处就出土了五只。最大的长十一米，口宽零点九米，系用整段楠木刳空而成。科学鉴定证明，这只船公元前一千多年即已投入使用，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诗文中有一种“神游”、“卧游”的讲法。我就是身尚未到淹城，心却早已向它开放了。行前翻了些资料，发现关于淹城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吴地传》：“毗陵县南故城，古淹君地也。”商代，在今山东曲阜、泗水一带曾有一个诸侯国奄

国。商周递嬗时，它曾联合徐、淮等东方邦国进行抵抗。这个淹君是否奄被平服之后流窜东南的一支呢？甲骨文中，有“弇”而无“淹”、“奄”二字，它们是否相互通假呢？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三让王位，被吴王诸樊封于延陵（即今常州），吴语中，“延”、“淹”谐音，或许淹君即季札公子？淹城为季札所筑？

脑子里带着一大堆问题，坐上了市文化局备好的轿车，南出市区，径直上了武（进）宜（兴）公路。正是秋熟时节。两旁稻海连天，推涌着起伏的金浪，展现出锦绣江南的丰年胜景。向导小章是一位健谈而博雅的姑娘，沿途作着有关故实的解说。过了湖塘桥，在西向拐弯处，小章指着一个村落说：“这里距淹城五里，是古留城的遗址。”接着，她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古老的传说：

商朝末年，淹、留都是诸侯小国。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两国君主常相过从，还作了儿女亲家。后来，留君听说淹君得到两只白色灵龟，属于稀世之珍，便再三要求借回去与妃嫔传观，但始终未获准诺，于是蓄意并吞淹国。淹君察知了这个用心，一怒之下，把归家省亲的女儿扣住，不许她再返留城。同时筑设三城三河，严加防守。城外烽墩罗列，用以登高瞭望和升烟报警。城墙外侧种满倒钩、蒺藜、唐球、弯角毛树等带刺的灌木丛，形成了防御敌军偷袭的天然屏障。留军几次强攻，都没有得手。……

说话间，淹城到了。轿车开进了外城，停在三座高墩前面的广场上。由小章导引，我们顺着传说是淹君的跑马岗往里走去。原来，城凡三重，均为泥土堆砌。外城略呈圆形，周长五里，城郭约为七里；内城呈方形，周长三里。恰如《孟子》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相符。宫城，俗称紫罗城，周长一里。每道城只开一门，外城门朝西北，内城门向西南，宫城门对正南，这也

符合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自己权力的传统表示方式。三城外侧均有护城河，宽五六十米不等，互不通流。宫城河已湮为农田，内河、外河静水澄鲜，作蛙绿色。微风吹过，摇碎了满池的云影天光。宫城地势高耸，内城、外城渐低，远望之形似旋螺。城墙虽已倾圮，但基址仍高出水面十米左右。中国古代城堡的形制，多数比较简单。沪南奉贤县的柘林古城，不过是个土围子。即使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故城和赵邯郸、齐临淄等古代名城，也只有两重方城，有的部分还互相重合。像淹城这样内外三层，层层相套，高达数丈，实属少见。小章念了一首民谣，基本上钩勒出淹城当日的胜概："里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罗城，三套环河四套城；内高墩，外高墩，周围林立百高墩，城中兀立王女墩；内河坝，外河坝，通道唯有河西坝，独木舟渡古无坝。"现在，除墩台有所减少外，余者大体如是。

武进县志记载了明代陈常道的两首淹城纪游诗。其一曰："谁叱冯夷去巨兵，凿开湖埠壮南营？山藏孤岛围千嶂，堑挟重汤控一坪。盘谷蛇形森踞虎，昆池迭影浩翻鲸。可怜王气今蒿莽，落日群鸥空自盟！"于兹可见，在数百年前，虽然城池早已笼罩在荒烟蔓草之间，但气魄还是十分壮伟的。

我们踏看了城墙上下，共同赞叹古昔工程的浩巨。遥想淹国当年，深沟高垒，负险固守。三道城门不在一个方向，该是考虑了城堡防御的要求；而唯独东面无门，又似乎标示出当时主要敌人的方位。"但是，偏偏没有守住。"说着，小章续讲了前面剩下的半截故事：

单说留国的军队围困淹城一个来月，也没有攻下。正在无计可施之时，留国的军师给太子出了个主意，让他以过去惯用的飞箭传书的方式，与年轻貌美的妻子（淹君之女）相约在城外会面，

倾诉两地相思的缠绵悱恻之情；说明照此死守下去，夫妻永无团圆之日；进而诱使她提供破城之策。留国太子按计行事。淹君女对父王割断他们情丝的作法早有腹诽，此刻，为了重圆鸳梦，当即答应了丈夫的请求，泄漏了淹国的机密。她说："冬令祭腊之时，父亲将带兵出巡，城内兵力空虚。你们可趁机在城外放火，烧掉墙上的棘刺，然后架桥设梯，攀上城头，我在里面按时接应。"留国太子照办不误，结果五百精兵一夜之间尽数涌进宫城，劫走了白龟和大量财宝。淹君归来，知是女儿通敌所致，未容分说，便手挥青铜剑将女儿碎尸三段，分别埋葬三处，上筑高墩，以警臣民。后人称它们为头墩、肚墩、脚墩。

站在三千年前的城堡上，我陷入了沉思。是在考虑原来想到的几个问题的答案吗？不是。"揖让征伐几废兴，陈年史影费猜评。"隔着历史的重重帷幕，有些史疑一时很难廓清，还是请历史学家去论证吧。我想的是这个古老的传说留给后人的一些教训。

他从这里走进了历史

日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莫斯科新处女修道院陵园，拜谒过长眠在那里的俄罗斯古典作家契诃夫，晚上又兴致勃勃地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艺术剧院观赏了他的名著《樱桃园》的演出。艺术剧院创建九十多年来，一直以上演古典名著饮誉世界，《樱桃园》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之一。剧院场地不算宏大，但建筑装饰十分精致；宽敞的休息室里，陈列着建院以来著名导演、演员的照片和演出剧目的剧照。从中可以看出，契诃夫的几部重要剧作都是通过这些导演和演员的艰辛劳动而和观众见面的。难怪当年剧院的负责人丹钦柯要说，艺术剧院就是契诃夫剧院。的的确确，契诃夫把剧院艺术化了，而剧院则把契诃夫舞台化了，二者融为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像的。

看着艺术剧院的标帜——舞台丝绒绣幕绣着的银灰色的海鸥，我蓦然忆起了剧院建立之初上演契诃夫的《海鸥》所获得的荣誉。当时演员们互相亲吻祝贺，兴奋得跳起怪诞的舞蹈，台下欢声雷动的热烈场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我出神地向楼上的包厢搜寻着，想像着当年列夫·托尔斯泰观看契诃夫的另一部剧作《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情态和演员谢幕时向这位文学大师频频鞠躬的场景。至今人们还传为美谈，当年这里上演契诃夫的《三姊妹》时，第一幕刚刚落下，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员谢幕达十二次之多。也是在这里，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七日，契诃夫观看了

《樱桃园》的首场演出，这一天又是他的命名日，剧院借此机会为他举行了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作家激动地站在舞台前，不住声地咳嗽着、面色苍白、憔悴，豆粒大的汗珠从额上滚出。一位作家事后回忆道，那是一次充满忧伤情调的聚会，场上洋溢着一层葬礼气氛，实际等于大家向他作最后告别。果然，五个月后契诃夫便与世长辞了。

契诃夫的剧作独树一帜，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只是由于他写了近千篇小说、札记，有“短篇圣手”之誉，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剧作家的声名。在他的剧作里，找不到矫揉造作的戏剧性冲突和情境，他无情地唾弃了列宁所斥责的“杂耍技艺”和别林斯基批评过的“纸牌戏”的技巧。开始读他的剧本时会感到枯燥和沉闷，但是，读着读着便觉得渐入佳境，生面别开。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樱桃园》是一部非常难演的戏，它的美蕴蓄在微妙的深沉的芳馨里，要想感受它，必须精心地开启蓓蕾，使花朵绽放。契诃夫在生命终结前，几乎用全力精心结撰这部剧作。为了演得成功，他甚至两次写信，向剧院提出如何分派演员角色的建议。

白云黄叶送走了九十度春秋，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远道客人，为能在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剧院观赏这部名著的演出而感到庆幸。由于对剧情比较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语言上的障碍。我看到，在一座散发着霉气的旧式地主庭院里生活着一个灰色的人群，他们懦怯、自私、昏愦、腐败，崩溃、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具有象征意义的樱桃园，尽管它在城里颇负盛誉，连百科全书都把它列入要目，尽管主人们和忠实的老仆如何眷恋过去那繁华的岁月，但是旧的生活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樱桃园已经易主。最为残酷的是，樱桃园

的买主竟是他们祖辈的农奴的儿子。这个过去连主人的厨房都不准进的商人，现在却趾高气扬地向公众宣告，要把园里的树木伐掉，然后盖起能赚钱的新型别墅。当然，契诃夫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商人洛帕欣身上；他的作用是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破坏、“吞食”那已经衰亡的东西。剧中安排了一个头脑中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剧作家通过他来表达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新生活的呼唤。

契诃夫把满腔热情倾洒在他的“新人”身上，通过这位大学生之口，剧作家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熬受痛苦，坚持不懈地工作。只有通过勤奋的劳动创造，世界上才能出现美丽的乐园。这位大学生像一团烈火一样，从事摧毁旧世界的秩序，拥抱新生活、走向新天地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对地主的女儿阿尼娅说：“你们是负着债，靠着别人，靠着那些你们不许走进内院的人过活的。”“您的祖父、曾祖父和您所有的祖先，都是占有过许多活魂灵的农奴主，难道人类的精灵不是从花园里每一棵樱桃树上、每片树叶上、每一根树干上，向你们望着？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在特罗菲莫夫的启发下，十七岁的阿尼娅视野开阔了，心灯燃亮了。当她的母亲、女地主依恋旧宅，叹息新主人会把老屋拆得稀巴烂时，女儿却“脸上发着光，眸子闪动得像两颗宝石一样，为走向新天地迎接新的生活感到惬意”。尽管剧作家本人也怀疑过这个大学生的说教究竟有多大力量，高尔基更是嘲笑他只说漂亮话，嘴说“必须做工作”，“而自己无所事事”；但当他和阿尼娅的扮演者出来谢幕时，我还是尽情地为他们热烈鼓掌。

四幕话剧《樱桃园》是契诃夫在雅尔塔写成的。由于健康的原因，他需要离开莫斯科，到温暖的南方定居。为此，他与彼得堡

一位出版商签订合同，以出卖自己所有著作的版权为代价，得到一笔钱，在雅尔塔郊外买块荒地，建起了一座别墅。有人说，创作是羞怯的，这在契诃夫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是从不在别人目光下从事写作的。而他又要从早到晚不停地写，这就造成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也都有一种疏离感。加上他那特有的持重、安详、平静的举止和发表意见时的严肃态度，使他的言谈往往具有很重的分量和判断的性质，这都仿佛为他套上一层难于穿透的甲胄。

契诃夫是孤独的，没有更多的欢乐。尽管他也不懈地追求家庭的温馨和爱情的幸福，但并没有充分地享受过。这一方面，由于严重的疾病使他不得不远离亲人，过着自愿的"流放"生活，如他所说："就跟将来将独身一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人生活。"另一方面，他也舍不得支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同旁人周旋。即便晚年与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克尼碧尔结婚，他也仍然信守着过去向一位友人申明过的主张："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她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作为一个医生，契诃夫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但却充满希望地憧憬着未来，越是临近生命的结局，越是对人类灿烂的明天，对"永恒真理的王国"满怀坚定的信念。他说："我预感到幸福已经越来越近了。即使我看不见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会看见它的。"在《樱桃园》中，他借助特罗菲莫夫的嘴巴喊出："前进呀，我们要百折不挠地向那明亮的星光前进！"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表现了作家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尽管由于他的思想立场从未

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渴望的“新生活”不过是一种朦胧的憧憬，并不明确创建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樱桃园》是20世纪初俄国革命前夜的一曲新生活的赞歌，而契诃夫则是一只歌喉婉啭、呼唤天明的黎明鸟。

我们是在观赏了《樱桃园》的演出之后，来到雅尔塔的契诃夫陈列馆访问的。这是一座式样别致、整洁明亮的建筑。别墅上面有外国神话中常常说到的那种小望楼和露天凉台，下面是镶着玻璃的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大小不等的窗子。里面有一间书房，近窗处摆着写字台，旁边贴着一张“请勿吸烟”的标语；后面凹进去的地方放着一张土耳其长榻，壁炉上面是著名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再往里走，便是契诃夫的单身卧室，里面空空荡荡，伟大的作家已经从这里走进了历史，进入了永恒。

建筑周围是一片花木繁茂的果园。不知作家在构思剧作中的樱桃园时是否借鉴了自己的果园，反正我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看的。听工作人员介绍，契诃夫并不十分喜欢雅尔塔这个地方，但也许孤独的生活使然，他对自己所经营的果园却爱惜备至，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向俄罗斯各地订购树木和果苗；写作累了，他就到果园里为花木整枝、灭虫和除草。今天，当我们从别墅的平台上鸟瞰整个果园时，还仿佛在花木掩映中看到他那穿着外套、拄着手杖的瘦削的身影；耳畔响着他的浓浊的声音，似乎在向远道的客人介绍：“这里过去到处是石头和杂草。我来后，把这块荒地变成了美丽的花木园。”

当年，果园外面是一片马蹄形的空旷的谷地，一直伸向海边，于今已经建成鳞次栉比的楼群了。北面由一列铁栏杆将果园与公路隔开，公路那面原是一处荒冢累累的鞑靼墓园，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个比较开阔的广场，正面立着用黑色大理石雕成的契

诃夫半身像，左侧平列着五块大理石屏．上边镌刻着“套中人”等作家塑造的典型人物。作家戴着夹鼻眼镜，半眯着眼睛，仿佛在冷峻地审视着病态人生，细致入微地观察着身旁这些可怜的小人物。

涅瓦大街

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句“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的名言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被列宁引用以来，涅瓦大街一下子就飞向了全世界。其实，早在一八三五年果戈理就曾以《涅瓦大街》为题创作了中篇小说。不同的是，车氏与列宁是借用这条笔直、宽阔、平坦的大街来说明事物曲折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哲理；而果戈理则是通过这个车马络绎不绝、行人接踵联袂的煊赫、繁华的“首都之花”，揭露它后面掩藏着的上流社会惊人的矛盾。他富有讽刺意味地称涅瓦大街为“人间一切最优秀的作品的展览会”，可是在这个展览会上，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截然不同，“涅瓦大街老是在撒谎”。

涅瓦大街自十八世纪初辟建以来，经过二百余年的踵事增华，于今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史上最有特色的街道之一。尽管它所在的列宁格勒已经恢复了彼得大帝建城时的名字，但是时代的飚轮毕竟驰向二十一世纪，当年大街上那些花花公子、男女豪商以及“经常在羽毛褥子和枕头上过日子”的贵妇人，穿制服、挂十字章的小官吏不见了，果戈理笔下的形象猥琐、姓名逗趣、沉默寡言、“谁也看不起他”的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维奇·巴什马奇金之流也都无影无踪了。变化不大的是，涅瓦大街留给人们的印象，依旧是那种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的晦暗、沉闷的情调。时当岁杪，气温并不甚低，湿度却比较大，日影晦黯，风色凄

迷，天空灰蒙蒙的，是一种典型的酿雪天气。

涅瓦大街仍旧弥漫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放眼望去，两旁建筑呈现出极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整体看是十八世纪的建筑风格。高超的艺术技巧，朴素的表现手法，没有缤纷的色彩，没有奇突的错落，庄重、谨严的俄罗斯古典建筑形式与奢华、隽美的巴洛克式的装饰艺术交相辉映。楼房多为三、四层，米黄色，大量使用石料，壮美、古雅的圆柱、回廊、雕塑、高凸浮雕，随处可见。风致、情调、格局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而各个建筑却又互争奇巧，富于变化，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正是这种浓重的艺术氛围，使我漫步涅瓦大街时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十九世纪上半叶活跃在这里的俄国作家群，今天又陆续复现在大街上。看，那位体态发胖、步履蹒跚的老人，不正是大作家克雷洛夫吗？他是从华西里岛上走过来的，他喜欢花岗岩铺就的涅瓦河岸，喜欢笔直的涅瓦大街和开阔的皇宫广场。在他后面，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仿佛正在吟咏他那把感情和心绪加以人格化的诗章："这里，有着忧郁的回忆；/这里，向尘埃低垂着深思的头颅。/回忆带着永不改变的幻想，/谈论着业已不复存在的往事。"

那个匆匆走过来的穿着军装的青年，该是优秀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吧？是的，正是。他出身贵族，担任军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场，但他同沙皇、贵族却始终格格不入。一八四〇年新年这天，他出席彼得堡的一个有沙皇的女儿、爵爷的贵妇和公主参加的假面跳舞会。在那红红绿绿的人群的包围、追逐下，诗人感到十分疲惫，极度厌恶。他找个借口离开舞厅，急速地穿过涅瓦大街逃回家去，恚愤中写下了那首题为《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的著名诗篇，以

犀利的笔触尖刻地嘲笑了那班昏庸的权贵，把他们讥为"没有灵魂的"，"晃来晃去的人样的东西"；对那些胁肩谄笑、假意虚情的女士同样投以无比的蔑视。他的灵魂离开了令人窒息的舞厅，翱翔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宇，他眷恋着池塘的浮萍，远村的炊烟，田野的黄叶和幻想中的美丽的女郎，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亲切。无奈，梦幻毕竟是虚空的，最后要落脚于丑恶的现实，诗人失望地叹着气，唯一的报复是向那"可憎的人群"射出一颗"注满悲痛与憎恨的诗的铁弹"。

别林斯基也是涅瓦大街上的常客。他个头不高，背显微驼，略带羞涩的面孔上闪着一双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瞳孔深处迸发出金色的光芒。他是君主、教会、农奴制的无情的轰击者，他激情澎湃地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奋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在涅瓦大街上，看到"玩趾骨游戏的赤脚孩子、衣衫褴褛的乞丐、醉酒的马车夫——悲哀，沉痛的悲哀就占有了我"。当然，最了解"彼得堡角落"里下层民众疾苦的，能够用"阁楼和地下室居住者"的眼睛、用饥饿者的眼睛来观察涅瓦大街的，还要首推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他亲身经历过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寒风凛冽的涅瓦大街上，他穿不上大衣，只在上衣外面围了一条旧围巾；为了不致饿死，他在街头干过各种小工、杂活。一八四七年，他写了一首描写城市生活的著名诗篇——《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以一个丈夫沉痛回忆的方式，叙述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在独生子死去、丈夫奄奄一息的困境中，为了给儿子买一口小棺材，给丈夫买药治病，不得不走向涅瓦大街出卖自己的肉体。诗人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农奴制度社会的黑暗，对被损害、被蹂躏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年龄各异、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中，偶尔也插进一些穿着学生服装和华贵的制服的青年人，目的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向某一位心爱的诗人鞠上一躬，或者掏出记事本来，请作家们签名留念。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就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一八二八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不久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使他经常陷入心绪不宁，抑郁苦闷之中。

果戈理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兴奋，时而消沉，时而忧伤，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忘记了饥肠辘辘。他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一八三一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普希金对他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把现实主义的世态描摹和浪漫主义的神话渲染加以巧妙的结合，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很欣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语言的清丽、华美，比喻的奇突、恰当；同时尖锐地提出：“难道乌克兰就没有其他更勇敢、更强有力的人吗？难道拥有那么多关

于自由、幸福、爱情的奇妙传说的乌克兰民族，就从来也没有为另外一种生活——光明、美好的生活奋斗过吗？难道你就不能讲讲这种人的故事吗？”果戈理深受触动，并始细心研究乌克兰的民族历史，这些史料把他带回到两个世纪前的查波罗什，那些高傲、雄壮得像狮子一样的战士，时时从这个光荣的策源地冲出来，勇敢地保卫着自己的土地，抗击外国侵略者。于是，塔拉斯·布尔巴这个光辉的形象诞生了。普希金创办《现代人》杂志后，果戈理立即把他的小说《马车》寄去，诗人非常高兴，说：“《现代人》坐在果戈理的《马车》上，就可以负重致远了。”

果戈理想把彼得堡的对上逢迎、对下鄙吝、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官场狠狠地曝一下光，但苦于凭空结撰，全无依傍，便求助于普希金，说：“请给我提供一些题材吧。我将迎合目前的风气，写出一部五幕喜剧，而且保证写得比什么都更滑稽。”普希金满足了他的要求。有一次，诗人去奥伦堡，原是为撰写普加乔夫的传记收集素材，却被当地官员误认为彼得堡派来私访的钦差大臣，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果戈理以此为蓝本，两个月就写成了讽刺剧《钦差大臣》，并于一八三六年四月正式在亚历山大剧院公演。普希金看后满意地说，任何人都不能像果戈理这样出色地运用他的馈赠。诗人还帮助果戈理构想了《死魂灵》的某些情节，并读过这部小说的开头几章。过去他听果戈理诵读新作时总是面带微笑，从容玩味；这次却神情忧郁地说：“天哪，我们的祖国多么可忧虑啊！”不久，便传来了伟大诗人普希金去世的噩耗。果戈理为失去一位最崇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感到绝望，从此他进入了一个痛苦的忧伤时期。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再也见不到果戈理的身影了，他离开了祖国，寄身罗马。在那里，他把无尽的哀思写进了《死魂灵》，并在小说中浓重地加以点染：“我们的国家被我们

自己毁坏了"，应该用艺术力量来拯救它。

我多次漫步在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我为这里留下过优秀作家群的珍贵足迹，为俄罗斯高超建筑艺术的弘扬感到骄傲。早在一八四〇年，别林斯基曾经预言："我们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们，他们在一九四〇年一定会看见俄罗斯站在文明世界的先端，接受全体文明人类的顶礼、崇敬。"先哲的预言，有些方面已经成为现实，而有些方面却难免要打折扣。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泪　泉

我们访问风光秀美的克里米亚半岛，头一站是著名的海滨疗养胜地古尔祖夫。这里四面环山，气候宜人，街道整齐、曲折，房舍多作淡褐色，楼层不高，阳台很大，建筑特色十分突出。东面崖岸高耸，下临万古喧腾的蔚蓝色的大海，阿尤达格山酷似一头巨熊将毛茸茸的胸脯俯伏在海面上，低垂着毛发浓密的头颅在贪婪地饮水。山上有古代克里米亚人的城堡和热那亚人建筑遗迹。当年，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很喜欢漫步在山顶羊肠小道上吟诗咏怀，普希金也曾登临纵目，流连忘返。离开古尔祖夫，我们又来到古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巴赫奇萨拉伊，这里有建于一五一九年的著名的鞑靼王基列伊的宫殿和陵墓。在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上面，嵌着一钩带"十"字的新月，相传是基列伊为纪念他痴情苦恋的一位波兰郡主而修建的。普希金就着这个题材，经过想像加工，写了一部题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长诗。王宫一七三六年毁于大火，后来为了接待叶卡捷琳娜女皇巡幸进行了部分整修，现已辟为历史博物馆。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在列宁格勒看过一台名叫《泪泉》的芭蕾舞剧，就是根据普希金这部长诗改编的。基洛夫剧院名气很大，号称全俄第一流豪华剧院，从外观看特色并不鲜明，但内部装饰十分精美、华丽。圆形的穹窿顶上绘有圣母、天使图像，下有七层包厢，四壁装饰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从建院到现在，

已上演过七百四十个剧目，像这类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舞剧是长盛不衰的。入场前，观众一律把外衣、帽子和手提包存放在寄物处，女士们一般都对镜整容化妆，有的还要换鞋更衣；男士们也都衣着整肃，像是出席盛会一样。这个期间正值卢布贬值，通货膨胀，商品供应奇缺，也许有些人排队半晌也没能买到什么东西，可是到剧院来却显得如此悠闲，实在令人有些费解。开幕铃声响过，观众鼓掌欢迎，指挥率乐队全体起立致谢。全场秩序井然，除配乐管弦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

舞剧共分四场。第一场表现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聪明美丽，天真活泼，整天酣歌畅舞，无忧无虑。谁知好景不长，突然灾祸降临：鞑靼可汗基列伊率兵侵掠，父王罹难，郡主本人成了俘虏，可汗把她关在巴赫奇萨拉伊的豪华宫殿里。第二场，可汗的后宫有美女无数，但无论哪一个他都不中意，唯独对这个外来的波兰郡主情有独钟，以致把年轻美貌的皇后也抛在脑后了。颇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之概。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玛丽雅郡主却对可汗冷若冰霜，视同陌路，整天愁眉深锁，缄默无言。第三场，一天晚上，可汗又来到玛丽雅郡主身旁，摘掉了王冠，脱下了斗篷，显得殷勤备至，恭谨有礼，却照例遭到了冷遇，郡主全然不理不睬。可汗无奈，只好悻然离去。玛丽雅在无边的孤寂中静静地睡去，双颊上燃烧着处女的幽梦，还带着两行新鲜的泪痕，显得越发娇柔妩媚，楚楚怜人。王后莎莱玛对可汗钟情于玛丽雅始终耿耿于怀。这天深夜她悄悄来到郡主住所察看，发现可汗的王冠和斗篷留在那里，顿时妒火高燃，遂将郡主刺死。可汗闻讯，怒气填膺，当即命令卫士将王后抛入大海，予以最严厉的惩罚。第四场，可汗陷入极度的悲愤之中，大臣们百般劝慰也不能解脱。他发狂地点燃起战火，发兵侵掠了

高加索邻近诸国和俄罗斯的和平村庄。班师回朝后，为了寄托对玛丽雅的无尽哀思，在王宫幽静的一角建立了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泉水盈盈珠泪般日夜滴淌。尾声：可汗呆立在喷泉前，眼前幻象环生，郡主与王后相继出现，他在昏眩中晕厥过去。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于一八二一至一八二三年写成，是普希金四部南方长诗中的一部，被誉为积极浪漫主义的范本。一八二〇年四月，普希金由于写诗讽刺沙皇和鼓吹自由，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恨，被调离首都彼得堡流放到南方。途中遇到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应邀到著名疗养胜地古尔祖夫做客。将军的女儿们都有浓厚的艺术情趣和很高的文化教养，也颇喜欢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同她们在一种家庭般的气氛中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后来他说过，在古尔祖夫过的是一种“那不勒斯流浪汉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还同拉耶夫斯基将军一起，骑马跑了几十公里，专程游览了著名古城巴赫奇萨拉伊。其时鞑靼王宫已经倾圮，唯有那眼清澈的喷泉依旧顺着一个生锈的铁管缓缓地流出，好像在柔声地诉说着悲怆的往事。也许那些坍塌的殿宇要比它们完整地保存下来更能说明过去的一切。

遗址周围浓荫匝地，玫瑰花在阳光下无情地怒放，葡萄藤到处蔓延，高大的白杨树与清真寺的古塔静静地投下了颀长的身影。它们无言而雄辩地表明，往昔的万种繁华、千般壮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普希金默默地折下两枝红玫瑰，——像他一八二四年在《致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这首抒情短诗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把它放在潮湿的大理石上。那个叙述爱情与死亡的鞑靼民间传说和这座孑遗的喷泉，使他沉浸在深邃的思索与忆念之中。又是凑巧，我在莫斯科参观美术作品展览时，曾看到过著名画家切

尔涅佐夫作于一八三七年的珍贵油画《普希金在"泪泉"边》，画面上描绘的正是这个场景。"眼睛里闪耀着泪花，心儿激动得收缩起来"，那些倾诉痛苦的爱恋和无望的追求的诗句，从笔端喷泉般地涌出。就这样，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诞生了。

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那里流传，
知道它的有两位年轻女郎，
于是那座阴森的建筑物，
便被她们称作"泪泉"。

关于这首长诗中提到的"两位年轻女郎"究竟是谁，在前苏联的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大别之有两类：普希金研究专家伊凡·诺维科夫认为，是指拉耶夫斯基的两个女儿叶卡捷琳娜和叶莲娜，正是她们将那个凄婉动人的传说讲给普希金的（见《普希金在流放中》）。而在列·格罗斯曼所著的、被国内外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的普希金传记中，则认定是指波托茨基家的两姊妹索菲娅和奥尔加。她们是定居在彼得堡的著名希腊女人索菲娅·康士坦丁诺芙娜和波托茨基的女儿。两姊妹自幼住在克里米亚世袭领地的别墅里，在巴赫奇萨拉伊听到过有关本家族中这位悲剧性人物玛丽雅·波托茨卡娅郡主的传说，并由姐姐索菲娅讲给了她们的朋友普希金。那首根据法国诗人巴尼的诗《西色拉的一瞥》意译的《柏拉图式爱情》，便是普希金于一八一九年底献给索菲娅的。诗中表达了他对这位冷若冰霜、拒绝了爱情青睐的少女的炽烈恋情。后来索菲娅嫁给了基谢列夫将军。普希金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灵感的惠予者，就是那位被他"长期愚蠢地爱着"（即一种毫无希望的单相思）的女郎。在这部

长诗中，鞑靼可汗对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的单相思与诗人对索菲娅·波托茨卡娅的一厢情愿的狂热恋情恰相照应。因此有人说，普希金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

在长诗的结尾处，他奋笔疾书，直抒胸臆：

我忆起同样可爱的目光，
和那依稀是人间的玉颜，
我的全部思念都向它飞去，
在逐放中依然把她眷恋……
啊，痴人，算了吧，
再别燃起这无益的灯盏！
令人心魂不宁的单恋的幻梦，
已使你作出了够多的奉献。

由于“普希金是用自身的炽烈的生命来温暖它们”，所以，他的“南方长诗能够唤起读者炽烈的热情”，显得格外凄怆动人。不管两位女郎究竟是谁，我想，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论断，人们当无异议。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

在我到过的独联体、东南亚、东北亚、北美的国家中，涉及到那里的作家生活、文学创作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十九世纪上半叶那里活跃着一个作家群；一个是日本的北陆地区，著名诗歌总集《万叶集》产生在这一带；另一个就是美国的纽约，从十八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当代，这里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国际文坛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充塞于头脑之中的，不是那些触目皆是的"石屎森林"，也不是那种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象，而是那灿若群星的纽约作家群及其所创造的林林总总的文学形象。我首先想到了欧文，这位出生在纽约，堪称美国文学之父的小说家、散文家。人们当会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纽约外史》，淋漓尽致地讽刺了荷兰殖民者在纽约的统治，曾受到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激赏。当然，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纽约作家惠特曼的《草叶集》。在恢宏、绮丽的诗章里，诗人创造了"人"的光辉形象，一种惠特曼式的新型的人。他们身体健壮，心胸开阔，有崇高理想，永远乐观，从事劳动创造，鲜红的血沸腾着，好像那消耗不尽的力量的火焰。

与惠特曼同年出生在纽约的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杰作《白鲸》，是一部绚丽多彩，蔚为奇观，充满艰难险阻而又英勇壮烈的长篇

小说。作家通过象征、烘托、借喻、曲笔等表现手法，翔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捕鲸者的紧张、惊险的生活，叙述了曲折迭宕的故事，刻画了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抒发了他对美与丑、善与恶、文明与野蛮、民主与奴役、命运与自由的见解，表达了他对普通人民特别是黑人的深挚的同情。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由于思想超越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以致长期受到文学界的冷遇。直到作家去世三十年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它，于是，又是出作者全集，又是写传记，拍电影，闹得沸沸扬扬。这也是古今中外文坛上常见的令人为之扼腕的现象。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在纽约又同时出生了两位作家，这就是赫尔曼·沃克和阿瑟·德勒。前者以长篇小说《战争风云》叱咤文坛，后者因创作出被观众称为“一枚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大厦下面的定时炸弹”——典型现代悲剧《推销员之死》而扬名于世。

纽约这个地方，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是颇富诱惑力的。纷繁万状的世相，你死我活的争夺，随时发生在作家的身旁，刺激着他们的神经，激发着他们的灵感，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也许正是有那么多的作家从纽约起步或者以纽约为创作背景的重要原因。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有个著名的格林威治村。说是“村”其实并非乡村，而是这个大都会中一个比较幽静的所在，历来是作家、艺术家喜欢居住的地方。在这里的咖啡馆，你常常可以听到涉及文学艺术课题的交谈；漫步此间一些公寓和住宅的门旁，你会发现一个个铜牌，从而得知埃德加·爱伦·坡、托马斯·沃尔夫、亨利·詹姆斯、尤金·奥尼尔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这些作家、艺术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漫步在纽约街头，无时无刻不感到他们的存在。诚然，这里有难以计数的齐云摩天

的高楼广厦，有熙熙攘攘皆为利谋的各种肤色的人群，有经济、政治、军事、贸易方面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激烈争夺，有五光十色的西洋景、众生相，但都掩盖不了文学创作的光辉。它们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由于国情的差异、民族的隔阂、语言的障碍，我们这些他乡游子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之后，不仅“举目有山河之异”，而且社会人情各个方面都感到生疏、隔膜，交往的圈子很窄，没有机会同平民百姓接触，加之时间短暂，手抚一斑，难窥全豹。一条重要的沟通渠道，是借助于文艺作品。比如，一些作家描写过的纽约的种种景观，一些摄影师、画家提供的市井风情，等等。这次身历其境，置身于百老汇街、时代广场、中央公园、五大道，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将社会真实描述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细心地寻觅“二十号街”的踪迹，为的是想亲身体认一下出生在纽约的著名进步作家艾伯特·马尔兹笔下的《二十号街的星期日早晨》的实况：大街上阳光灿烂，一群穿着节日服装的孩子正在玩球，跳绳的小姑娘发出“踢哒、踢哒”的声响，一片繁杂、热闹景象。突然传出“有人自杀了”的信息。街坊邻居以及收尸工人对这种人间悲剧早已麻木得无动于衷。公寓楼上的窗口出现许多面孔，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走开，谁也不下楼。不久，房东太太在事主大门的玻璃上挂上了“空屋出租”的牌子。着墨不多，而人情世态毕现无余。

街头闲步，见到前面有一座歌剧院，刚好散场，人们挤挤撞撞，匆匆离去，我却久久伫立，深情地注目。心想，这也许就是美国女作家埃迪丝·沃顿《天真时代》中描写过的剧院哩，观众里面有没有那位伯爵夫人奥伦斯卡呢？记得小说是这样描述的：某

天晚上，纽约一家歌剧院的包厢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穿着与众不同的奥伦斯卡伯爵夫人身上。她的丈夫是个行为放荡的波兰贵族，为了摆脱他的羁绊，她返回了故乡，渴望离婚，却又慑于社会舆论压力，心情十分苦闷。她与新派律师纽兰·阿哈，通过频繁交往，由相知、相悦而相爱，但却受到同样爱着阿哈的表妹的干扰。作家通过深入描写阿哈同两姐妹的"三角恋"，反映了由于习惯势力这堵墙的阻隔使真正的爱情无法实现的悲剧。小说的结局是这样的：三十年过去了，表妹和丈夫都已经去世，分处两地、久久离别的这对情人有了结合的条件。这天，奥伦斯卡夫人邀请阿哈带领他的儿子前去作客。阿哈如约而至，但在最后一刻，他只让儿子进屋，自己却凝望着楼上的灯光，在窗外伫立着。他唯恐爱情的甜美回忆会无情地被历尽沧桑的自己的衰老形象所粉碎。小说具有优美、醇厚的艺术韵味。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这里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富可敌国的豪商巨贾在进行着紧张、繁忙的经贸活动。然而，我想到的却是两桩发生在纽约市区，微不足道却震撼心灵的"买卖"。一桩是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中所描写的，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与贫民窟相差无几的公寓里的德拉，正在愁着没有足够的钱为丈夫杰姆买一件圣诞礼物。她刚刚哭过一场，此刻站在镜子前，望着美丽的披肩秀发，毅然决定把它卖掉来买礼品。这样，她为杰姆那块祖传三代的金表买了一条金表链。晚上，她煮好了咖啡等待丈夫归来。可是，杰姆回来后，一见德拉的短发立刻怔住了，原来，作为圣诞礼物，他为德拉买了美观大方的镶着珠宝的高级发梳，但是长长的秀发已经不见了。德拉一边安慰着丈夫说："没关系，我的头发长得快。"一边拿出她为丈夫买的金表链。可她哪里知道，杰姆为了买发梳已经把金表卖掉了。真是"贫贱夫妻百事

哀"！可贵的是，他们没有为日常生活的拮据而丧失其美好的感情，都想为对方献上一份爱心。这种事情发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就弥足珍贵。作者欧·亨利与埃迪丝·沃顿同龄，（看，又一对同龄的美国作家！）虽然他不是出生在纽约，但曾长期居住在这里，经常出入于贫民公寓、小客店、小酒吧、下等剧院，广泛接触下层人民，一直自认为四百万纽约小市民中的一员。

另一桩"买卖"反映在短篇小说《灾星》里。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刻画纽约小市民、女主人公迪尔维亚的贫穷与孤独。迫于生计，她卖了妈妈送的手表，卖了獭皮大衣，卖了晚上出门用的金网银提包，待到手头再没有东西可卖时，就如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在《屠场》中借马利亚之口所说的："人到穷苦无告时，什么东西都会出卖的。"她就以五美元的代价出卖自己的梦。但失去了梦，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失去了灵魂。因此，她又冀求再把梦找回来。作者就这样迂回曲折地用畸型怪诞的形象，表现了小人物的绝望与辛酸。

应该说，这是最为凄神寒骨、令人心灵震撼的。如果认为欧·亨利的小说是"含泪的微笑"，那么，看过《灾星》之后恐怕是绝对笑不出来的。悲哀如果还有泪有笑，则人心尚有感有觉，此可谓悲哀之最初境界；若到了泪与笑都没有时，则为彻底的悲哀，自是悲剧的最深层境了。



书趣文丛……❺

天　涯　寻　觅

疗疴心史

一

年轻时得过结核病，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三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事。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此后，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了“四叶亭侯”。

平时，身强体壮，确实体察不到病痛缠身的苦恼，也未能充分感受到至爱亲朋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一刹那，这一切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忽地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躺在襁褓中处处要人呵护的婴儿。鱼刺要人一根一根地摘，米饭要人一口一口地喂，转侧要人帮，下地要人扶。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测一次血压，摸一次脉搏，还要详细记载便溺时间、次数、颜色。令人想起古代的“起居注”，于是，一眨眼又变成了皇帝。

几天过去，渐渐能下地走路了，护士又严厉警告：动作不能像从前那样速度很快、幅度过大。过去吃饭如风卷残云，蚕食桑叶，刷刷刷，一眨眼，整碗饭就进肚了。现在，受到严格限制，但只要医护人员不在场，依然是我行我素。此无他，积习使然也。

然而最大的约束还是不准读书。理由是看书损耗精力，不利

静养。因此，只要发现我在翻书，轻则警告，重则没收，直至把我床头所有的书全部缴械，令我叫苦不迭。从识字起，五十余年与书为伴，虽然没像古人说的那样，“饥以为食，寒以为衣，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一日废离，却是千真万确的。书之于我，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

手头没书，颓然静卧，又睡不着，急得我抓耳挠腮。实在挨不过去，就悄悄地把要看的书目写在一个纸条上，趁护士不在，交给前来探望的亲友。这样，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给养。苏东坡、黄景仁的诗，梁遇春、余光中的散文，又都悄悄地跑来给我作伴了。我趁医护人员不在，抓空拚命地读下去，如逛宝山，如饮甘泉，直累得两臂酸麻，全身疲累。这里顺便说几句。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它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疗疴岁月，我很喜欢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街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的《别老母》诗：“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了令人凄然涕下。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景仁莫属了。

按说，用脑过度，积劳成疾，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早就该牢牢地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元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此刻如果聂氏在侧，相信也会写出悲叹书痴的诗句。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

经有了自画像。诗的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原诗是："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思梦里又相寻。"说是自警，实际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也不是胃口不佳，而是失眠。有的人脑袋一贴上枕头就堕入黑甜乡中，心身都获得宁息，诸念全消，五根俱净。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过去多少年的往事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事情，未来的谋划，也都聚上心头。下狠心排除一切杂念，可就是办不到。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耳朵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街上的轮蹄，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在我都成了空谷足音。

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这位华山道士，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一天客人过访，正赶上他在睡觉，旁面有个异人，听其鼾息之声，以笔记之。客怪而问，其人曰："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看来，陈老先生不仅能睡，而且会睡。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几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这也常常是奢望，万般无奈，只好请出安眠药来帮忙。而负责护理的小护士，一到夜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罚款。正如黄宗羲所说："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面是有觉不准睡，一面是想睡睡不着，真是天大的不公平。

二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葡萄干给他送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归来发现案头放着一封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写的，内有一个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让她猜。猜的无非是钞票、粮票、饭票之类，自然不对。我告诉她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病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俘获的战利品并俚句一首，借博一笑："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后，大家央求我讲故事。我就说，王安石好抬杠，这天，苏东坡拿过一个砚台让他看，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的。王问有什么特异之处，苏说，呵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说，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也不值几文钱，恐怕你一连呵上五年也不能把成本收回来。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否落下来？"她们一致意见，花瓣不落，并举出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是："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写诗批评："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一般地说是这

样，但也有特例。后来苏东坡在黄州就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他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板不住。可是，他身旁经常有人打“小报告”，结果弄得他被四处流放。他来到杭州做官，好友文与可力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又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开恩，得免一死，最后贬到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他情不自禁地又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小护士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真可恨。我说，以后我看书，你们也不要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个弯子来表示抗议。”

“一卧沧江惊岁晚”，转眼间过去两个月了，心情十分烦躁。术后伊始，不间断地插管、换药、打针、拆线，体温升高盼着降下，胸部阵痛渴望平复，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企盼与热切的期待之中，腾不出心思来想其他事情。可是，当病情日见好转，体质逐渐复原，却还未能走上工作岗位之际，整天僵卧床头，无所事事，就开始心烦意乱了。苏东坡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无奈闲则闲矣，心却安不下来。躺在病床上，心潮涌荡，百感中来，半个世纪的般般往事，个人的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骄矜与愧悔，得意与失落，带着一种辽远的时空感，忽刺刺攒聚心头。

过往几十年间，朝朝暮暮，绷紧生命之弦，“拚命三郎”似

的，奋斗、拚搏、磨炼、积累，对于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认为应该作出更多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灭顶的风涛，面对着时时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蓦然感到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顿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变成意冷心灰。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般涌来。大概偶然的东西一多，人们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误区，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必然与偶然、存在与虚无之间茫然却顾了。

三

长夜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疾病又是伴随着生命而来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获得生命之后，不能只知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须考虑怎样滋育它，调适它，想到弄得不好还会失去它，有朝一日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索回。特别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渐衰减，人生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古人有"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说法，反映了老、病相关的客观规律。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误以为自身体质绝佳，往往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缺乏一种对疾病的警觉。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老舍先生说过一番哲理性很强的话："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得过一场大病，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也增强了承受能力。就这个意义来说，病床也是大学校。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池水不惊、波澜不兴的小时代，人心觉悟的机会，似乎只在病床上。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健康比一切都要紧。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可能一转眼间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这时，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之处。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常常是一下病床就悄无踪影了。

卧病期间，常有一些作家、学者前来探访，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我首先谈到：从前，人们常用“贫病交攻”来概述一个人的穷愁潦倒，习惯于把贫和病联系在一起，这本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有趣的是，见诸文字，却只听说汉代的扬雄有《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而未见到有谁发出讨伐疾病的檄文。胡大川的《幻想诗》中倒是写了：“但愿百年无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不过这乃是近代的事。扣其缘由，也许是因为古代大气、水文、土壤、食物污染少，生态环境平衡，各种噪音也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加上古时候人们思想单纯，所以发病率相对地低，人们对于疾病的威胁感受得不深。但这话一出口，我马上就感到有漏洞。果然，一位朋友问难了：那么，同在古代，为什么印度的和尚对病苦的反应那么强烈？这话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据说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曾经游城四门，一门见生苦，一门见老苦，一门见病苦，一门见死苦。佛家说的四苦或者八苦，都包括疾病这个内容。他的结论是，其间的差异要从儒、释两家的不同宗旨上找原因。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友们

各抒己见，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大有苏东坡说的"宾主谈锋敌两都"的气势。

实际上，不要说禅门衲子，就以常人而论，也不会有人否定生活中的"苦谛"。这表现于多方面。比如，占有欲就是一个"苦"源。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欲却会无限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陷入失望与苦恼之中。沙特的小王子只有十四岁，每星期有六百万美元的零花钱，银行存款十六亿美元，拥有三架喷气机，七辆豪华型轿车，号称世界上儿童中的首富。他完全不知辛苦、困穷为何物，但却经常陷于极度苦恼之中。他有着把一切攫为已有的强烈的占有欲。一次，随父王出访伦敦，在白金汉宫拜见了伊丽莎白女王。事后，居然提出要把白金汉宫买到手。当他知道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时，非常失望，痛苦万分。一般人的苦，往往来源于想什么不能有什么，如健康、爱情、安宁、顺遂等等，而不想有什么却偏偏有什么，如病苦、离别、挫折等等。这是包括圣人、皇帝在内都免除不了的。还有，随着知识、眼界的扩展，人的要求、欲望也往往随之扩展。希望越高，失望会越大，烦恼就越多。一次，"三八"节聚会，两位年轻女作家说起各自的凄苦来，竟然涕泗滂沱。我说，若论你们的物质条件，村姑农妇是无法比拟的；而你们所感到的痛苦与烦恼，也是她们所梦想不到的。你们的苦楚主要在精神方面。"人生识字忧患始"，实在是见道之言。

四

生与死，这是文友们的另一个热门话题。佛教与禅宗常说，生死事大。宋儒批评说，"生死"放在一起论说，重点在"生"；连

带说"死"是舍不得死。实际上，在重生、乐生方面，儒释道三家是大同小异的。庄子虽然讲了"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但他也引述过古人畏死、讳死的故事：郑国有个神巫名叫季咸，能预知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说的年月旬日非常准确，郑人见之，都远远避开。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止，逃避死亡，这是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课题。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西征凯旋归来，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但是，这话出口不多久，他就在清水县行营病死了。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累建奇功，横绝一世，曾发出过"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的豪迈誓言，可是，最后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四十二岁。人类永远征服不了死亡，当然，死亡也同样战胜不了正义与真理。正如培根说的，死亡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人类心中有许多种感情，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敌忾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唯有怯懦、自私，使人在还未死亡之前就先死了。可以说，人生最美的挽歌，是他在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民族发展等富有价值的事业中奉献了一生。

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所谓死亡的恐惧，乃是对于死亡所引起的价值虚无的一种自我意识。动物缺乏这种意识，人是唯一不满足于有限生命而追求无限生命的存在物。说一个人"不朽"，是指他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可以永世流传的社会财富，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不朽的"价值生命"，死后也还能存活在千百万后人的心中，存活在历史之中。

至于说，古代疾病相对地少，这自是先民的幸事。然而，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的症候，在古代，却眼睁睁地看着

它置人于死地，而束手无策。《左传》记载，成公“病入膏肓”，疾不可为，意思是成了绝症。今天看来，所谓“膏”，系指心尖脂肪；而“肓”，按中医说法，在心脏与隔膜之间。病入此间，总不会是不治之症吧？现在，不仅许多病都能治愈，而且有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流行疫病，如鼠疫、脑膜炎、天花、霍乱等已经被一一征服，而逐渐绝迹。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疾病，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现在简直到了无时无地都必须同它打交道的地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走上街头，墙壁上，汽车上，甚至电柱上，随处可见治病售药的广告。人类与疾病，这大概是永远也消除不了的一对矛盾。只能听任它肆意吞蚀无量数的旷世奇材，制造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单说一个肺结核，单说它扼杀的中外著名作家，就能列出黄景仁、契诃夫、济慈、高尔基、鲁迅、萧红等一大串名字。每当人们提到这些作品比岁月还多的哲人，都深为痛惋不已。萧红十年时间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黄景仁作诗达两千首，而他们都才刚刚活过而立之年。设想如果他们寿登耄耋，其成就为何如哉！而李贺、梁遇春比他们还小，在二十七岁的锦样年华就被病魔抓走了。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的道理。我们也注意到了，正是疾病与伤残诱逼一批天才人物同缪斯女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以对宇宙人生的超常感知与体悟，以一颗经过灾难磨砺的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无常，世路的艰辛，生命的飘忽，生活的沉重，认知与体验情绪变化的微妙，心灵世界的奇异，以及创造的甜美，奋斗的幸福。深邃的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对于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叩问，伤残病苦这些人间的不幸，会为人生之河增添无限色彩与波澜。而这一切，往往是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有助于作家坚定创造的意志，迸发

出创造的活力。我常想，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自己患有精神病，他对人类的深层的精神痛苦，就不会体会得那样准确、那样深刻，也就无法在《白痴》和《罪与罚》中描绘得那样淋漓尽致。正是癫痫病，使他以正常人的感觉难以达到的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去洞察隐秘的感觉世界和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心灵境域。同样，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牙痛大婶》，也得益于他晚年的一次剧烈的牙痛。美国评论家哈·阿顿说过，关于牙痛的描写，恐怕谁也比不上安徒生，他把主人公的痛苦比作一首交响乐，每一个痛苦的音符，都由智齿内的铜鼓、铜号、短笛和伸缩喇叭分别演奏出来。

五

前面谈到的那些情节与思絮，已经是三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许多朋友看到我健旺如常，精神振作，都问我是如何破除迷惘，战胜疾病的。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身体上的病痛可以交给医生，而心灵上的病痛却只能留给自己。但要我说说"自胜"的经验，却又讲不清楚，正是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那种境界。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医治病讲究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讲究阴阳平衡，解除我的心理失衡状态，应用的是同一原理。就我切身体验，至爱亲朋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一张笑靥，一束鲜花，一封亲切温馨的慰问信，一罐清香的甲鱼汤，一个甜甜的哈密瓜，灯前月下，情切切、意绵绵的耐心解劝，鞭辟入里、恰中肯綮的开导，包括文友间的开怀畅叙，探赜发微，都对那些迷妄与失落的瘀结起到了消融作用。

我也颇得益于郊原闲步。我体会，在大自然里以自由姿态来

来往往，很快就会溶为它的一部分。每一个黎明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每一个黄昏都是一场亲切的告别。当你沐浴着晨风，踏上一片新绿，你会惊异于生命自身的伟大。野草，看去是那么卑微，柔弱，可是却异常顽强。任凭野火焚烧，牛羊践踏，只要春风拂过，照样绿意葱茏。面对这茫茫翠野，这雄浑壮美、涵容万汇的大自然，即使幽忧抑郁填胸塞臆，也会涣然冰释，还你一副潇洒、坦荡的情怀。

就我来说，书籍的疗效更是功莫大焉。一编在手，便可沉酣今古，浪迹宇寰，不受时空限制，任情与异代、异地的知己倾心交谈，而且，通过读书能够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置身其间，可以达到物我两忘，得失消融的境界，什么失落呀，幻灭呀，都一股脑地逃到了爪哇国。难怪陆放翁要说，“病须书卷作良医”。

天涯寻觅

三千多米高、终年戴着雪冠的巍巍连山，像一道上接苍冥，凌空而立的屏障，遮蔽了流云，遮蔽了长风，也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这一原本就甚为偏僻的遐方殊域，更显得与世隔绝，天遥地远了。山的阳面，是一处莽莽苍苍的林茂粮丰、水草肥美的原野，一道万古长流的清澈山溪，傍着一条新近筑成的沙石大路，笔直地伸向远方，把这片绿锦缎般的茫茫碧野齐崭崭地切割成两半。左面，从林掩映中的营房大院被一列长长的红砖墙包围起来；右边，翠苇森森，簇拥着一潭清澈的湖水，朝朝暮暮，镜子般地面对着万里晴空，没有波澜，没有污染，给人一种亲切、自然、澄净、安详的感觉。而晨兴、入夜响彻营房内外的嘹亮的号角却在明确地提示人们，这里存在着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这里的自然同样是人化的自然。

几位散文作家应边防某部的邀请，来这里采风已经一个多月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过去在机关里，即使是星期天、节假日，也常常苦于纷繁杂沓的俗务与应酬。剥啄的叩门声，清脆的电话响，镇日间不绝于耳；回到家里，又会昼夜淹没在饭馆的卡拉OK、小贩的沿街叫卖、广告车的往复喧腾的噪音狂潮里。现在，它们总算被一股脑地抛掷在千里万里之外，称得上是“轮蹄不到红尘远，一枕烟波梦也清”了。此刻，他们刚刚自湖畔游泳归来，正从过午的炎阳下逃避到院里的凉亭中，围拢在一起聊

天。忽然一辆军用卡车开进大院，嘎地一声停了下来，一位五十左右岁的中年妇女从驾驶楼里钻出，向司机道过谢后，便径直走了过来。她那修长的身姿，文静的气质，一副透着几丝忧郁的眼神，引起了文友们的注目，大家同时都起身让座。直到这时，伊凉才意识到这位不速之客是专程前来会见他的。五天前他曾接到一封寄自山西朔州的快信，署名姜敬好。信写得很简单，开板就说："我总算找到了您，哎，天涯苦觅，已经三十多年了！"她要马上启程前来，叮嘱伊凉一定等见上一面再离开这里。文友们就信的内容作了种种猜测，有的认为，她是老伊的一个失散了多年的亲属；而素有"关东才女"之誉的白凌则歪着小脑壳，若有其事地说：看来她是伊兄的早年的女友，旧影依依，前情未忘，所以才不惮山长水远，要来这天之涯地之角重温宿梦。但伊凉自己心里有数，知道这肯定是一场误会。

此时，大家已经悄然散去，凉亭里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听伊凉说信已经收读了，敬好立刻眼睛一亮，笑着解释："都怪我太匆忙，急着把信发出，就是怕拖延了日期您收不到。结果话也没说明白，让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伊心想，莫说当时，就是现在，我也还是处于蒙昧状态。便说："从信址得知，您是晋北人，我呢，世居辽河之滨，我们过去既无一面之识，又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恐怕是搞错了。这种误会十五年前我经历过一次，那时我在省委机关工作。当时收到一封由天津《散文》月刊编辑部转来的信，寄信人是南方某城市的一位女教师。一九三七年她的胞兄与一家人失散，四十余年杳无踪影。一天，她看到《散文》上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竟与其胞兄的完全相同，欣喜之余，就给编辑部写信，请求帮助与作者联系。作者是我，编辑部就把信转过来了。结果竟是一场由同名同姓造成的误会。"伊凉说，生活中这类

巧合致误的事原是很多的，不足为怪，只是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赶来，却扑个空，未免太亏了您。看着敬好瘦削的身躯和由于连日奔波而略显疲倦的神色，他竟有些过意不去了，尽管他也知道咎不在己。

敬好一改开始时的激动，现在却异常平静，不动声色地听着，看得出她是在一旁仔细地打量着伊凉。这时才莞尔一笑，还是那么娴静："没有错。怎会错呢？"像是向对方申明，又似自言自语。说着，从提包里珍重地取出一张四寸大的黑白照片，双手递了过来。伊凉一看，竟是四十年前他和一位名叫颜亦尊的上司的合影，不由得"啊"了一声："快告诉我，老颜现在哪里？"谁知这一问竟惹得她伤心地啜泣起来。"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以问作答，她继续呜咽着，直到白凌来招呼他们吃晚饭。小白像发现了外星人的秘密那样，惊奇诡异地观察着眼前这一男一女，心里在证实着她预先织就的那张"罗曼蒂克之网"。而伊凉，一边走着一边也在琢磨：她是老颜的什么人呢？当然不是妻子——老颜的妻子我熟悉，姓何，矮个，年纪也比她大。可是，那种深情，那张照片……席间，客人总算恢复了常态，几个青年文友围拢过来，开着善意、亲切、谑而不虐的玩笑，她都大方、得体地应酬着。白凌知道老伊饭后还要接受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采访，便说，晚上，大姐住在我那里。你们都暂告休息。"背朝着客人向老伊作了一个鬼脸。

由于闷葫芦还没有揭开，伊凉显得心事重重，晚上的"记者问"也没有答好。记者以为是疲倦所致，提议明天再谈。老伊巴不得领下这道赦令，便匆匆离开，径直跑到白凌的房间。显然，她们已经谈了许多，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伊凉已从"罗曼蒂克之网"中被解脱出来。小白也不再耍怪态了，惊世骇俗的悲

喜剧告吹，大导演英雄没了用武之地，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斜倚着墙歪在床上。伊凉和敬好便开始了竟夜之谈。

敬好说，一九五七年反右，老颜可能有点言论。“情况是这样，”老伊补充说，“他大学毕业后先是教书，后来调进机关来办报。我的经历与他相似。那时机关里工农干部占绝对多数，大学生是凤毛麟角，我们都酷爱文学，气味相投，共同语言比较多。喜欢在一起谈论晏几道、李清照的词，欣赏中外的名曲，读些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而颇不满于报社主编的不学无术却妒贤嫉能、妄自尊大。老颜当时是副主编，笔头子硬，小有名气，主编怕他取而代之，便到处说他的坏话，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十足、骄傲自负’等等，工作却又离不开他。背地里讲过，对付颜亦尊这号人要像对付鸬鹚那样，既要让他拚命捕鱼，又得给他戴上脖套，防止他吃饱了不玩活计。反右开始后，这位主编首先起来揭发老颜的反党言论。”现已回到原来的话头，他请敬好接着讲。敬好说，“还是您说，您是当事人，最有发言权。”

伊凉便又接着讲：我记得，有天晚上，主编特意把我找到家里，先是夸我年少有才，具备发展前途，接着话锋一转，色厉辞严地告诫说：“你眼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不同颜亦尊撕开面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片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果然，第二天就开了批斗大会。会议由主编主持，首先就喝令颜亦尊交待反党罪行。老颜昂头说道：“我十六岁就投身革命，拎着脑袋找共产党，怎么现在变成反党了？笑话！”主编看他太不老实，便亲自甩出一颗重磅炮弹：“你对党的干部政策怀有刻骨仇恨，你说共产党对你实行‘鸬鹚策略’，真是反动透顶！”颜亦尊先是一愣，接着，斩钉截铁地吐出了六个字：“这是栽赃诬陷。”这时，主编以凌厉的目光盯着我，示意我起来揭发。我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慌忙站起，嗫嚅地说，老颜没有讲过这个话，好像……好像听别人说过。主编厉声追问"谁说的"，我真想说"就是你"，但没有这个胆量，就不再吭声了。会议卡了壳，大家也泄了气，便不了了之地散了。

"以后呢?"敬好紧着问了一句。伊凉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条没有扣上，又罗织了别的罪名，并以态度恶劣，给他定性为"极右"，以后就不知下落了。当年冬天，我也被下放农村改造锻炼。两年后作了异地安排。小白看敬好有些倦怠，便下地将毛巾用冷水浸过，递给她擦了脸，又给老伊续了杯茶水。敬好建议到外面散散步，走着谈。白凌立刻拍手响应："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早就该出去走一走了。"这时刚好是十二点一刻。

营房大门上了锁，三人便在宽阔的教练场上，踏着清凉的月光闲步着。月色浸润着整个大地，远山近树，旷野平畴，千般万象都涂上一层在白昼时从来也想像不出的颜色。天空没有一片云，清泠泠的，透明而洁净，令人感到无限的高远。近处的蛩吟，远地的蛙鼓，一迭连声地喧嚣着，可是，这边疆的夏夜却益发显得宁静。

敬好接上前面的话题，低沉地说，老颜被投入内地一所监狱里圈了起来，妻子老何怕连累了孩子，加上组织出面反复动员，不得不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就带领孩子隐姓埋名，投奔山东老家去了。出狱之后，老颜私下里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是觉得往事不堪回首，因而不愿意返回本省、返回家乡，于是被就地安置在我所在的县文化馆里当编导，发挥他诗文兼擅、能歌善舞的一技之长。我们经常一块下乡，很谈得来，对他的满腹经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为良师益友。我那时还没有处对象，馆内同志便加以撮合，于是就走到了一起。婚后，我经

常听到老颜念叨你。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的境况已经相当艰难了，还曾和我说过：“人世沧桑，如今也不知道这位老弟落到了哪一步。当年，他坚持正义，为我受了很重的牵累，我却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无由表达。今生今世，如果能够相见，一定要向他珍重致意。”伊淙万万没有想到，当时那么一句虽是反映实情却显得十分软弱、怯懦的话，竟被他们珍视、记怀了几十年。

此时此刻，他更加怀念老颜，当下忙着追问：老颜也在朔州吗？现在景况如何？由于背着月光，看不清敬妤的面容，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凄然地说：“唐山大地震时，他正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被活活地埋在瓦砾堆里。转眼间，又过去了二十年。‘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我带着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无依无靠，只好转到山西的哥哥那里，在矿上教小学。现在，孩子大学毕了业，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新近我办了退休手续，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按说，可以告慰于地下亡灵了。可是，从他去世以后，心中就老是记挂着这件事。作为未亡人，我应该实践他的未竟的遗愿，走遍天涯也要访察到你，想办法见上一面，说上几句感念的话。如此而已。为此，我苦苦寻觅了二十年。心想，幽冥、人世，阴阳永隔，永生永世再没有见面机会，倒也死了那股肠子；怎么都在一个太阳底下，山不转水转，早不见晚见，一个大活人就会杳无踪影呢？有时在大都会里，人海茫茫，万头攒动，却突然迎面碰上一个意想不到的熟人，把握之余，共同慨叹‘世界真小’。可是，那经常叨念、昼思夜想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倒很像作梦，最想念的人反而往往梦不见。亲友们都劝我丢掉这个念头，可我就是不死心。往各地发出过许多封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有的回函说‘查无此人’。总之，失望连着失望，后来真的有些绝望了。我觉得就是死了也难以瞑目，因为一

旦与老颜地下相见，实在无法交代。”

走着走着，敬好突然问道："听过没有，老颜唱法国的名歌《天鹅》?"伊凉说，听过不知多少遍，现在曲调还有印象，只是歌词记不住了。她说："我把天鹅当作我们的幻影，一想念他，我就唱上一遍。"现在，她又月下怀人，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哼了起来，当唱到"伴侣啊永眠在梦乡，只听得水波轻轻歌唱，天鹅她垂头眼泪汪汪，她在月亮下独自彷徨"时，竟泣不成声了。这种浓情挚意，令老伊和小白都深深为之感动。他们苦于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便陪着她回房间去。灯下，三个人又默坐了一会儿，敬好如梦初醒，从提包里翻出一张边防某部接待客人的名单，上面赫然印有伊凉的名字。原来，二十天之前，伊凉他们去边防某部访问，在那里住过两天。记得有位接待科长曾与他热情交谈，问询过他的情况。敬好说，那是她的亲侄，这次多亏他牵线搭桥，传递了信息。伊凉说，其实我的散文集上就印着我的简历。她淡然一笑，说，山野之人看不到啊。

外面，天大亮了。小白回到屋里不知什么时候在床上悄然睡去。老伊简单地向敬好介绍了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她很欣慰，揉了揉眼睛，长舒了一口气。她说："人也见了，话也说了，心也安了。有一年我上五台山，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沿着台阶，从山下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爬到山顶上，礼了佛，进了香，双肘双膝都磨破了，心却特别安然。她告诉大家，这个终生的夙愿总算偿还了，回到家里就能安心睡觉了。"敬好说，她现在也是这种心境。

吃过早饭后，她的侄子、前面说过的那位接待科长，带车前来接她。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依次地同她紧握过双手。伊凉请司机开车走在前面，然后同小白一起，陪着敬好沿着那条沙

石阶，又步行很长一段路程。分手时，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模糊了，以致根本没有看清楚敬好是怎样登车上路的，直到汽车腾起的滚滚烟尘在视野中消失了，才憬然醒悟到她已经走远了。

母亲的心思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正在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突然，一位领导同志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凄然地说："刚刚接到电话，你母亲病故了，赶快返回去。"尽管老母亲已经八十九岁高龄，平常身体也不算健壮，但这个噩耗毕竟还是来得过于突然，一时我竟哽咽得吐不出一个字来。我的眼前模模糊糊映现出老母亲伛偻的身影，可是瞬息间便消失了。我马上意识到，从此已经和母亲人天永隔，再见面只能在魂梦中了。记得一位大作家说过，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只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去了母亲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当时，我确是整天忽忽悠悠，心神不宁，真有点像白云无根似的。在奔丧的路上，我忘记了昏晓，也不觉得饥渴，整个意念都沉浸在无边的悲戚和痛苦的回忆里。

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世家，她的祖上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小时，我在外祖父家看到过黄马褂、雕弓和八股文试帖，记得还有一部朱笔点批的《朱子大全》。但我母亲并没有上过学，外祖父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不许女儿识文断字。母亲能够看些通俗的弹词、话本，都是出嫁后跟我父亲学习、磨练的。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我猜想，母亲刚嫁过来时，我们家的生活可能还比较富裕；只是因我祖父中年弃世，父亲年轻不谙世情，不会理家，家道逐渐中落。母亲以一个大家闺秀，突然经

历这困苦的生涯，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迅速适应了艰难的环境。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像孔老夫子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相夫教子，安贫乐道，全家上下、街坊邻里都交口称赞。

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我落生时，父亲已四十五岁，母亲四十三岁。姐姐大我二十二岁。她也非常聪慧，受家庭影响，从小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一部《红楼梦》，据她对父亲说，读过七遍。每番读过，都是泪湿衫袖。姐姐在我两岁时，不知患了什么病，早早地故去了。姐夫是一个电话生，当时悲痛欲绝。他把两岁的女儿，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然后长跪在地下，连着叩了几个头，呜咽地说："妈妈，实在对不起你。原谅我这个不肖的儿男吧！"尔后，在一个风雨凄其的夜晚，鸿飞冥冥，一去便再无踪影，再无音信了。这样，母亲便怀抱着我和甥女这两个都只有两岁的孩子。我们整天嚷着要奶吃，母亲眼含着泪水，敞开衣襟，把两个已经干瘪的乳头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可是由于吃不到实惠，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又同时哇哇地哭叫起来。甥女出生在营口，习惯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乍一到穷乡僻壤，油灯不亮，土房低矮，不见高楼，不见熙熙攘攘的闹市，终日哭诉着要电灯，要高楼，要逛街。每一声哭闹，都牵动着母亲的思女之情。

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在这令人肠断的日子里，我的二哥又病倒了。二哥大我十六岁。他还在读书时，就写得一手潇洒、俊秀的赵体字，三间屋里每面墙上，都有他的墨迹。不幸的是，在我三岁时，结核菌就夺去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妈妈眼望着墙上的字迹，想起来就痛哭一场。为了免去见景伤情，父亲伤心地用了一整天时间，把墙上的字一个个铲掉，然后再用抹泥板抹平。时间

老人也是一把抹泥板，父母亲心上的伤痕刚刚被它抹平，谁知，灾难又降临了。二哥死后二年，我的当瓦工的大哥患了疟疾，被庸医误诊为伤寒，下了反药，猝然去世。真是"衰门忍见死丧多"！这场重大的打击，母亲瘦弱的身躯再也难以承受了，足足病倒了三个月，终朝每日以眼泪洗面。但从此以后，纵然遇到伤情的事，她也只是呜咽几声，欲哭无泪，人们都说她已经把眼泪哭干了。

母亲特别刚强，自尊心极强。"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赋性严谨，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不见了。怀疑是我拿出去换了糖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我承认，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态度极为峻厉。我哭诉不已，不吃不睡，以示抗议。她只好再次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慰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及这件事情。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出此。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大铜钱，而是儿子的品德。爱之愈深，责之益切，律之则益严。这一切，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母亲对我进行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给了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我从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晚上要去温习夜课，不管刮风下雨，母亲总是早早地站在大门外面迎候着我。回来时，家家都已熄了灯火，繁星在天，万籁俱寂，偶尔有一两声犬吠，显得特别响亮，我大气都不敢出，一溜烟地往回跑着，直到看见了母亲的身影，才大叫一声"妈"，然后就扑在她的温暖的怀里。此刻，攻书的倦怠，路上的惊恐，饥饿，寒冷，一切都消失净尽了。劳累

了一天的父亲已经睡下。不大工夫，母亲便把用猪油炒过的米饭端了过来，然后装上一袋烟，坐在一边慢慢地抽着，直到我把饭一粒不剩地吃完，她再安顿我睡下。但是，对于母亲，这一天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寒冬腊月，夜间屋里一片冷清。母亲看着我钻进被窝，帮我把被四下里掖紧，她又找出针线笸来，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给我补衣缝袜。有时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在小油灯下做活，心里很不好受，往后穿衣服也比较仔细了。

十四岁，我考取了县城的中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行前整个晚上，父亲母亲都没有合眼。我一觉醒来，就发现两位老人面对面地抽烟、叹气。用过了早饭，素常寡言少语的母亲，一面帮我穿上新做的外衣，一面说："往后靠你自己照看自己了。"我的回答只是一串串泪珠。出了门，父亲走在前面伴送，我跟在后面一步一回头，走出很远很远，还见母亲站在门前高高的沙岗子上望着我。后来，我每次离家返校，母亲总是这样登高目送。在我的心目中，这座沙岗就是熊岳城的望儿山。一路走着，一路默诵着清代诗人黄景仁的《别老母》诗："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我走后，母亲把我平素喜欢吃的东西，从春节时淹在酱缸里的咸肉、端午节的粽子，到七八月的酸杏、甜瓜，都细心保留下来。有一年，园子里结了个特大的香瓜，母亲说要留给我，一天到晚看守着，不许任何人动，直到熟透了、落了蒂，最后烂得拿不起来。

结婚后，我有了个小女孩，母亲爱怜备至。像当年拉扯着我和甥女一样，整天领着她出出进进，只是再也抱不动了。看着老母亲苍苍的白发和伛偻的身躯，我想，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儿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亲去世后，母亲心情寂寞，我送她到三姨家暂住。那里离县城还有十华里，不通汽车，我就

借了一台自行车，让母亲坐在后面，我在前面推着。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坐过，生怕跌下来，便紧紧地抱住我的腰。我一面要推车前进，一面还要照看母亲，非常费力，汗水湿透了棉衣。母亲怜惜我，多次让我休息。我说，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我没有为老人尽过一份孝心，今天就是再苦再累，也难以报答深恩于万一。这一天我确实很累，但这一天心里最舒坦。可惜对我来说，这类机会太少了。

进城后，母亲时时想念着故里的乡亲。乡里人来，她不知疲倦地问长问短，从西邻的二婶、北院的三叔到屋后的枣树、门前的沙岗，都一一问遍。这些天是她最高兴的日子，常常半宿半夜地唠个不停。乡亲要回去了，总要三番几次地挽留，舍不得放他们走。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为了破除母亲的寂寞，我在工余之暇，找一些母亲早年喜欢听的戏曲故事，回到家里给她讲。有时由我的上了小学的女儿替我念，但当遇到一些陌生、难认的名字，如秦琼、貂蝉、窦娥等，还要由老祖母给她提词儿。渐渐地，母亲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但耳朵却异常灵敏，能够辨别我的脚步声。那时我经常下乡，只要告诉她哪天返回，母亲便在那一天从早到晚站在门里面，等着听到我的动静便顺手开门。一九八〇年我奉调到省里工作，这是和家人团聚之后又一次远离家门。母亲打心眼里不情愿，但她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放行了。临走时嘱咐我，说："往后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只要能抽出身就回来看我一眼。"听妻子说，我走不到一星期，母亲就问我的女儿："你爸爸走一两个月了，怎么还不回来？"

每当听到人们唱《烛光里的妈妈》，我总是想，妈妈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红烛精神。为了子女，她不惜把自己的一切都化作烛光，只到燃尽最后一滴蜡泪。她慷慨无私，心甘情愿地承受任何

劳苦，不为名不为利，也不需要任何报偿。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子女不要把她遗忘。她并不冀求锦衣玉食，只是渴望有机会在一起谈谈心，唠唠家常，特别是回忆一些儿女们小时的往事，因为老年人经常生活在忆念之中。这应该说是十分廉价、极易满足的要求。可是，十有八九没能达到。我就是这样，往往整天都在奔波忙碌之中，没有足够地注意母亲的心思与需要，忽略了要和老母亲聊聊天，也谈不到给予终生茹苦含辛的母亲以生命的补偿。结果，老人常常陷于一种莫名的孤寂之中。这种孤寂，在思念中发酵，在期待中膨胀，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木然。在漫长的几十年中，老人家为儿女们的成长、升腾，一步步搭设台阶，架桥铺路。可是，路就桥成之日恰是儿女放飞之时，最后只剩她一个人"茕茕孑立"了。光明日报曾开辟"永久的悔"专栏，如果说，我也有永久的悔，那就是在母亲的有生之日，特别是晚年，我同她交流得太少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现在，一切悔憾都无济于事了。谨以此小文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两个爱情神话

夏历七月初七又到了。小时候，每到这一天，祖母都拄着拐杖到外面仰望云空，察看喜鹊、燕子的踪迹。当上上下下确实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时，便喃喃地自言自语："去了，都去了！"如果谁问一句："去哪里了？"她会惊讶地看上你半晌，意思是：连给牛郎织女银河会架桥的事都不知道，也太不懂事了。这一天最好是阴雨天，因为这证明了夫妻已经在鹊桥上洒泪相见。于是，老祖母和母亲也都于心有戚戚然，出现黯然神伤的样子。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大概是最牵动人心，最具有群众性的了。据我所知，汉族祖先构思的星象神话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弥足珍贵。

正是由于老祖母的启蒙，后来入私塾读到《读经·大东》篇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时候，感到分外亲切，对这位独处天庭的女郎因终日相思而无心织布的情怀似乎也理解了许多。记得我在吟诵《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诗句时，还曾洒下过一掬同情之泪。后来，读书渐多，发现有的诗人力辟牛女传说之妄。比如杜甫就曾写过："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久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诗意是说，从古以来，人们只见到牛女

双星各据银河一畔，有谁见到它们聚合到一起？如果说能够的话，作为天上的星宿，精灵飒然即合，又何必偏偏待到七夕相逢！诘问得可说是凿凿有据，蛮有道理。但由于美丽的传说先入为主，就人们的意愿来讲，总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的。这样一来，倒觉得这位杜陵叟有些"刻舟求剑"，大煞风景了。

事实上，中国历代诗人、词客总是出自美好的愿望，驰骋其丰富的想像力，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诗章。有祝愿他们长相聚、不分离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词）；"唯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高则诚《琵琶记》句）。也有为他们鸣不平的，欧阳修在《渔家傲》词中说："一别终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认为牛女终年长别，只有七夕才能会面，而且良宵苦短，应该让他们尽兴欢娱，而不要银箭频催，过早地惊破他们的好梦。

当一切美好的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归于破灭，"乍见还别"的处境无法改变的时候，诗人们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抒写情怀，歌颂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万古长新，不像人世间爱海波澜，翻云覆雨。苏轼在《菩萨蛮》中这样写道："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这真是绝妙的立意，而且未曾经人道语。诗人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哲理性的课题：怎样看待爱情与幸福？什么样的爱情才算幸福？在这方面，写得最出色的，要算"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那首《鹊桥仙》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人从七夕仰望星空的角度，次第地写出了所见所感。全词可分四层理解：

第一层，写词人眼中的七夕银河畔的美丽：纤薄、绵邈的秋云在不断地变换着繁巧的花样；牛女双星不停地闪烁，似乎四目含情，蕴蓄着无限的离愁别恨。看，他们渐渐地踏上鹊桥，渡过银河，开始一年一度的会合了。

第二层，即景抒情。"金风玉露"点出相会的季节；"便胜却人间无数"，寄寓了关于爱情与幸福的深刻哲理，体现了少与多、暂与久的辩证关系。"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卓文君《白头吟》）；"玉颜盛有时，秀色随年衰，常恐新间旧，变故兴细微"（傅玄《明月篇》）。这类诗歌在古诗中比比皆是，反映出人世间无数男女爱情不专，反复多变，色衰爱弛，见异思迁的实际情况。对比之下，牛女双星虽然一别经年，离多会少，但爱情专一，坚贞不渝，万古长新，永恒不变，确实是令人艳羡不已的。早在唐代，就曾有人吟咏："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

第三层，词人想像双星鹊桥相会的情态。他们满怀深情，无限依恋，情切切，意绵绵，倾诉着长别的衷曲，相互间都不忍心看那只身归去的离别之路。一幅"儿女恋情图"跃然纸上。

最后一层，补足第二层的哲理思考，并以此相互劝慰，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与幸福的结论性意见：理想的伴侣应是两情久长，坚贞不渝，而不在乎朝夕厮守的枕席之爱。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与冈察罗娃，法国著名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与亚尔玛特，都曾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爱侣，充满了甜情蜜意，有时竟达到狂热的程度。然而，曾几何时，由于相互间的志趣、追求、道德修养方面存在着颇大的差异，导致忌恨、猜疑，同床异梦，造成

终生的痛苦，甚至葬送掉宝贵的生命。可见，“朝朝暮暮”厮守不离，并不即等于爱情的幸福。

当然，爱情幸福中应该包含长相聚、不分离的内容。古往今来，人们也一向把它们作为爱情追求的良好愿望。《长恨歌》中就做过这样的倾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秋隽句，恰好给人世间饱谙离别之苦的夫妻、情人，带来了无边的慰藉和有力的支持。

除了牛郎织女《天河配》，在我国古代汉族的爱情神话中，还有巫山神女的故事也久为人们传诵。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宋玉的《高唐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自称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临去告别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果如其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对出自古代文人笔下的这个“巫山云雨”的故事，唐代以来，许多诗人都曾提出过质疑。像刘禹锡在《巫山神女庙》诗中就直接进行诘问：“巫峰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也有对楚襄王加以讥讽的，李商隐在《过楚王宫》一诗中写道：“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诗中说，地位卑微的下民都懂得留恋人间的男欢女爱，只有愚不可及的楚襄王才迷恋梦境里的虚无缥缈的神女。王安石更喜欢作翻案文字，他在《巫峡》诗中指出：“神女音容讵可求？青山回抱楚宫楼。朝朝暮暮空云雨，不尽

襄王为古愁。""空云雨"、"万古愁"，这里讲得更直截了当了。

如果说，牛郎织女的神话揭示了爱情与幸福的"久与暂"的辩证关系；那么，巫山神女的传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在男女恋情方面，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这种爱情排斥一切肉体上的欲望，恋人只停留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在纯精神享受的云空中畅游，嘴唇永久不能接触，双臂只能拥抱理想的空间云雾。这种"精神恋爱说"虽然有别于通俗禁欲主义，而且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因是一种有节制的带有绅士气味的苦行主义，所以本质上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与这种超脱尘世的幻想相区别，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则是现实主义的恋爱观。十九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得十分直白：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人应该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中国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观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一位年轻女诗人对流传了几千年的神女峰的虚无缥缈的爱情神话，写下了与传统决裂的热情、勇敢的诗章："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另一位诗人则借此题目，提出了幸福、实在的爱情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思想："情也绵绵，恨也绵绵，/爱化作了一块冰冷的石头，/我们读了百年、千年。/幸福怎能靠默默地坐等？/不如去学精卫吧，/用行动表达你的信念！"

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两种爱的追求。

我们说，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

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

车上文化

现在到处都在掀动着“文化”热，诸如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还有什么茶馆文化、宿舍文化、地头文化、炕头文化，不一而足。我不妨也凑凑热闹，侃一侃车上文化。六十年前，丰子恺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车厢社会》的随笔，状写火车上的情况，用时髦的说法来表述，可以说是火车上的文化。为了不和前人的重复，我这里着重说汽车上的文化。

外出旅游乘汽车，大体有三种情况：一台中巴，十来个人，纵情谈笑，率情适意，人员既不过分繁杂，又足以驱除旅途寂寞。这该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索性乘大客车，几个同伴凑在一起，也尽可以笑语倾谈（当然要照顾一下四周的环境），沟通思想，而且能够尽兴地浏览车窗外的风景。最差的是乘小轿车，三四个人挤坐在一起，既嫌褊窄，又感寂闷，若是几辆车鱼贯而行，常令路人侧目，心里也很不舒服。

乘坐中巴，因为条件比较理想，最容易培植车上文化。当然若是具备下述条件，比如车上人员互相都很熟悉；而且处于同一层次，或者相差无几；又是长途乘车，这样就更方便了。有一次，我们乘汽车从兰州去敦煌，大约需要两天时间。如何消除旅途寂寞，增加一些情趣，减少些许疲劳？这就有赖于车上文化了。同行的都是爬格子出身，还有两位是中文系教授，一个个自是文采斐然。一位先生刚说了一句：“路遥遥其修远兮”，另一位

立刻就谈到，清代大诗人袁枚有两句诗："莫愁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话音刚落，旁边又有一位接上了茬口："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由于他没有说明出处，不知是引文还是杜撰，这倒无关紧要，反正起到了振奋人心，增强信念的作用。

古人有"以文会友"的说法，这是实际的反映。文人到一处，就是通过谈诗论文来沟通思想、联络感情，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那次穿越河西走廊，左边始终傍着祁连山，这自然就成了一个中心话题。先是谈历代诗人咏祁连，到后来觉得不够劲，干脆就自己作了。一位祁姓老诗人，即兴吟哦，有"西行莫道无朋旧，亘古名山也姓祁"之句，大家击节称赏。我也逢场作戏，以山拟人，吟了《祁连四咏》，其二云："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W 教授说，白乐天有"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汝当夫人"之句，你这个"青青子衿"，更是"悠悠我心"，居然要和"白头宫女"作同心侣了。引来全车人一阵哄堂大笑。

车上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交谈，可以是两人间的娓娓交流，情谈款叙，也可以是整个车里的齐鸣共振，笑语喧哗。内容极为广泛，天南海北，上下古今，风物人文，七情八苦，均可兼容并包。其上品，往往有真正个性化的七彩人生的独特体验、生活感悟和哲学沉淀，有冷隽、机敏、唇牙蕴秀的月旦评、浮世绘、众生相，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历史内涵、伦理内涵，既足赏心，并寓警策。即使是普通的谈心、叙旧、宣泄、调侃，也都不乏广泛的信息传递，浓郁的生活情趣，真挚的情感交流。

除了交谈，也还有其他一些形式。我很欣赏那种叫做"二十猜"的猜谜活动。由一个或几个人事先暗自思考并确定一个谜底，它可以是人或者是物，古今中外、飞潜动植不限，但一开始必须

明确告诉对方是人名还是一个动物、一个地名、一件物品。对方往往是几个人合猜，但怎么设问，其中就大有文章了。长于此道的，珍惜每一次机会，优选每一个问题，使之步步逼近答案。少数笨拙的除外，一般都能在二十问之内，揭穿谜底。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既能从中增长知识，又能锻炼敏锐而有效的思维能力。

车上文化，因乘客文化层次、欣赏水平、趣味爱好的不同，内容与形式往往呈现颇大的差异。有一次，长途乘车从哈尔滨到黑河，乘客多为广播电台的记者和地区报纸的编辑。他们长期生活在基层，生活阅历丰富，语言生动、活泼，到一起就“斗嘴”，唇枪舌剑，谈笑风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北方俗话，脱口而出，毫不做作，比那些说小品的高明得多。还有一次，在车上碰到一伙玩扑克牌的，这当然也是文化。不雅的是，负者鼻子、耳朵、前胸、后背上被粘满了纸条，就地转圈，出乖露丑，遭到车上许多人的反感。

大凡人一外出，心境都感到十分放松，日常的行政事务、家务负担、情感联系，以至职务身份，一股脑儿放下，起码是相对地减弱，尽可以卸却尘劳，摆脱拘束，得数日之闲，畅游观之兴。有时不免放浪形骸，抛开故态。长途行车，为了防止瞌睡，一般都喜欢逗闲哏、说趣话、讲故事，结果总是逗得一车人哄堂大笑，激发出浓烈的兴趣。但，故事讲着讲着，有时就下了道，荤的素的都端了上来。若是车里清一色的男性，或者虽有异性，而年庚较大，属于阿姨、老大姐身份，则忌讳较少；如果车上品类齐全，那么年轻的女性，只要还有别的车，就将自觉地退避三舍。这几乎成为定则。

那次黑河之行，我们的车上有一位K兄，其人极具幽默感，

却静坐一旁合眼睡去，不时地发出一声鼾鸣，似乎什么也没有入耳，实际上一切都听到了，等某人讲到关键处，他往往慢条斯理地捎上那么哏哏叨叨的两句，令大家忍俊不禁，或者轰然腾笑，而他本人却绝不动色。他更是讲故事的能手，一般只讲一个，只是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才补上一条，但那一个已经把大家摆弄得不是笑出了眼泪，就是胀痛了肚皮。当然，车上逗笑也有一条戒律，就是绝对不能干扰司机的工作。

所谓旅游，不过是社会成员外出变换生活环境，实际感受新异事物，而实现个体心理满足与群体自我完善的一种生活行为方式。一方面，围绕着视觉所见而构筑起来知觉体系与现象世界，这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观感；另方面，围绕着记忆与经验，而凝聚起来经验体系与本体世界，这个不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想像。前者是景，后者是情。高质量的车上文化，往往能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使眼前景物化为回忆与感悟，予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同时，车上群居数日，通过有益的倾谈漫叙或开展活动，实现感情交流，也增长了见识，扩大了交往，发展了友谊，互相在记忆之井里投入进去许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可供日后长久追怀与向往。

西双版纳访书

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四马路中段，苏州的玄妙观、护龙街，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都是旧时学人访书的理想去处。半日徜徉，归来满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的兴犹未尽，还发而为诗，畅叙访书之乐："老去看书眼未花，断编残简是生涯。城南片席琉璃厂，饱向东京阅梦华。"记得还看过一首闺秀的买书诗："厂桥游趁上春初，囊有余钱尽买书。归压轻舟应胜石，伴郎披读快何如！"同样写得雅趣盎然，颇饶韵致。

几十年来，我也是每到一处都要去书肆访书，把它当作平生一乐，确像古人所云："洛阳纸贵何暇计"，"每阅书摊不忆乡"。这次在西双版纳，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访求的书不是那些宋椠元刻，也不是什么殿版坊本，而是历经沧桑，闻名于世的"贝叶经"。一般访书，往往是漫游坊肆，"信马由缰"，因为许多奇书、珍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我这次寻访贝叶经，则是事先就定了明确目标。我知道贝叶经，始于读《聊斋志异·林四娘》，那里面有"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的诗句。后来翻检《全唐诗》，读到骆宾王、柳宗元、皮日休等许多人吟咏贝叶经的诗句，才晓得早在一千多年前，它就已经出现在我国诗人的笔下。原来，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传播的繁盛期。当时，许多文人接受佛学的熏染，形成了习禅风气。写诗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发扬"禅意"，参悟"禅机"，而禅师们也

经常喜欢借诗谈禅。中唐时期，虽然文人中有一派倡导儒学复古，力主排佛，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并没有就此衰歇下去。

李商隐写过一首《题僧壁》的七律，全诗堆砌佛典和佛经的词汇，“禅偈气”很重，就艺术价值来看，并没有太多可取之处；但结末两句还是有些味道的：“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大意是：如果笃信贝叶经上的经语，那么也就可以勘破世情、彻悟三生了。这里用了三个典故：据《酉阳杂俎》记载：“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按：摩伽陀在印度北部。相传释迦牟尼逝世不久，他的弟子就在摩伽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集会，由几位上首弟子诵出释迦牟尼所述的“经藏”和“律藏”。摩伽陀国既产贝多树，那么，当时用贝叶来刻写这些佛经是可能的。“真实语”是《金刚般若经》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的节缩。佛家把过去、未来和当今称为“三生”，语出《魏书·释老志》。

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引人入胜之处甚多。我却一直结记着贝叶经，亟欲一睹为快。因为这里聚居着全民普遍信奉佛教的傣族，从一些文献的记载看，利用贝叶刻经，自印度传入我国傣族地区是较早的，以致有人索性就把傣族文化称为“贝叶文化”。在当地一位精通贝叶经的学者的帮助下，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首先陪我到景洪的佛寺浏览了庋藏贝叶经的盛况，然后又同去他家翻检了他们几代珍藏的贝叶经。书页呈淡青色，大约长六十公分，宽十公分左右；叶片靠边处有一穿孔，被细绳连缀起来，每五十页或一百页装成一册；每册叶片上的刻字为五行、六行、八行不等。承主人见告，这种作为刻书材料的贝叶，一般是从八年以上树龄的贝多树上采下来的，经过剪

截、蒸煮、搓洗、晾干、拉磨、压平等多道工序的特殊处理，使叶片更为柔韧、光洁，便可以用铁錾刻写文字了，尔后再涂以掺和烟炱的植物果油，叶面上的字迹就更为清晰。经过加工处理的贝叶具有防潮、防腐、防蛀性能，可存放数百年完好无损。

关于贝叶，当地流传着一个"绿叶信"的传说。古时候，一个傣族青年离开心爱的姑娘，去太阳的家乡寻找光明与幸福的种子。他们相约每月通一次书信，以倾诉彼此的思念之情。别后，青年把情书刻在芭蕉叶上，由一只鹦鹉传递，开始时倒也顺利，可是后来他们相距越来越远，传递时间越来越长，没等鹦鹉飞到姑娘身边，芭蕉叶就已经枯萎破损了。这样，被迫中断了联系。青年十分伤心。一天，忽然发现一只虫子在贝多树叶上爬过后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而且叶片虽干不碎，痕迹经久不消。于是，他就试验着用小刀在贝叶上刻写情书，然后交鹦鹉衔回。足足等了一年，鹦鹉才飞回到青年身边，并且衔来姑娘在贝叶信背面刻写的情诗。故事的结局是：这位青年虽然没有走进太阳的家乡，却找到了光明与幸福的种子——作为文明象征的贝叶信。从此，傣族人民开始用贝叶记录史实、传递信息，青年男女用它来刻写情书。这就是傣族民间叙事长诗中常常提到的"莱邦东(用树叶写信)时代"。

这位傣族学者告诉我们，贝叶刻经大约已有二千七百多年历史，七百年前从印度经由泰国、缅甸传到了西双版纳。在傣族地区已知的几万部贝叶经中，除佛教经典外，举凡天文地理、阴阳历算、社会历史、哲学法律、谱牒世系、经济文书、文学艺术、医药体育、工程建筑、农田水利等，应有尽有，内容广泛。这些珍品不仅是傣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出于一种“爱屋及乌”和“因蜜寻花”的心理追求，赏鉴过贝叶经后，我又特意驱车赶到景洪县曼乱弄佛寺前看了贝多树。这是一种身材高大挺拔、叶片硕厚、树冠似一把巨伞集生于顶端的热带树种。据说，整个西双版纳现在只有二三十株，每株约能存活五六十年，傣族人民对它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视之为知识与智慧的象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他们勤劳的双手，会有更多的贝多树扎根展叶，拔地而起。

沧浪之水清兮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的诗，奇崛险怪，“以文为诗”，曾被宋人沈括讥为“押韵之文”。其实，韩诗中并不乏清新平易、流丽天然之作。有些诗境界独辟，色彩瑰异，清艳绝尘，表现了韩诗鲜明的艺术特色。像《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一诗中的“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长绠汲沧浪，幽蹊下坎坷”，“穷秋感平分，新月怜半破”，不仅把凉秋九月，新月半规，清潭远涨，绿波凝净的景色描写得清丽动人，而且刻画出一种自觉形成的审美心态，看了令人拍案叫绝。

一次，我到辽宁东部山区游览浑江水库，就曾实际体验到这种情景。这里四周森林茂密，植被良好，而且地处深山绝壑，极少污染，因而水清可鉴；鼓棹凌波，悠悠作镜中游，仿佛置身于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再现了潭中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的情景。身处这“绿净不可唾”的佳境，不禁要学那《楚辞》中的渔父，唱一曲“沧浪之水清兮”的歌。此刻，心中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一种爱美保洁的意识，绝不忍心往里吐一口唾沫，更不要说乱抛垃圾、脏物了。

赏心悦目的优美环境，不仅可以引发人们精神上的美感，而且如同黑格尔所说：“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唤起种种反应和回响”。此刻，这种反应和回响，集中表现为一种不靠纪律约束、

法制监督，而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的心理制约作用。它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习惯，维持整肃的秩序。

但是，我们在重视优美环境对于人们心理影响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环境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能消极地坐等环境的优化，而忽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能动作用。英国大作家萧伯纳说过："人们通常把自己的一切归咎于环境，而我却不迷信环境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总是有力寻求他们所需要的环境；如果他们未能找到这种环境，他们也会自己创造环境。"单就解决随地吐痰的不良习惯来说，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周围环境变得优美、整洁，达到"绿净不可唾"的境界，才能办得到；而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并自觉地养成不随地吐痰的良好习惯。这看似一件小事，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公民的文明风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人民素质和道德水准、文明程度。清末洋务派首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出使外国，在人家的名贵地毯上随意吐痰；有的使臣在大清国的驻外使馆阳台上晒裹脚布，都曾被当作笑柄，遭人讥讽，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要净化环境，首先要净化人的心灵。要使每个公民都认识到，爱美保洁，这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应有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从而自觉地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良好习惯。西谚云："思想支配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培养品格。"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也说："良好的习惯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地增值，而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享受着它的利息。"

这是就一己而言。实际上，公民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是大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对他人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当这种分散的

影响带有共同性质时，就会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对于人们的意念、行为起到一定的制约、引导作用。有些人常常忽视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认为积习已成，势难逆挽，所谓“思通天上星河易，力挽人间风气难”。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然。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世间一切事物，包括社会风习在内，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任何一种新的进步的习尚的形成，最初都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积极倡导，身体力行，逐步扩大影响，最后形成一种风气，一种潮流，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对此，古人是认同的。《书经·大禹谟》中说：“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大意是：顺着道理做则得到吉庆，逆着道理做则得到灾祸，如影随形，如响应声，效验立杆见影。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具有超过古人的信念和决心。

《苍原》溯源

辽宁歌剧院演出的歌剧《苍原》，去年荣获国家文化部的“文华”大奖，一时名震剧坛，饮誉中外。看过之后，觉得果然是“名下无虚”，同时，使我忆起了十年前访问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的往事。

巴州东临博斯腾湖，盛产芦苇、棉花，与当时我所在的营口市，在经济上有很多联系。访问中，承东道主相告，二百年前，率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历尽千辛万苦，从伏尔加河地区东归祖国的民族英雄渥巴锡的后代，就住在这一带。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当即到他们聚居的焉耆北部草原与和硕、和静等地转了一圈，“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又找到了乾隆帝亲撰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回来后，以《南疆写意》为题，写了一篇颂扬土尔扈特部爱国主义精神的散文。

除了歌剧《苍原》，近年来还看到了表现同一题材的电影《东归英雄传》，当然都是优秀之作。但我以为，作为艺术作品，它们只能抓住其中最亮的几个闪光点来作文章。而要全面了解这一页历史，了解渥巴锡这位蒙古族的伟大的民族英雄，又必须借助史学。历史，是我们观照现实、认识人生的一种重要凭借。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特别是，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成员的民族大家庭，更应该充分重视中华民族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使之在教

化、认知、审美诸方面，为我们，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最为厚重、最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广义地说，文学艺术也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但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假如用“水”来比况，一者为“玉树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一者为“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一个要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求艺术的弹性“空筐”；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找出因果、规律。二者应该而且可能相互拥吻，却无法彼此代替。因之，我觉得，无论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研究历史题材创作那个角度来说，讲一点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本事”，或者表述为“溯源”，都是必不可少的。

土尔扈特部是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臣翁罕后裔。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其部首领因与准噶尔部首领不合，遂率其所部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自成独立游牧部落。但仍和祖国保持着联系，经常参加厄鲁特各部的共同行动，并多次向清朝政府上表进贡。从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起，历经康、雍、乾几代，互相往来不绝。一七一二年康熙帝派出使团前去探望他们，途经西伯利亚，两年之后到达了土尔扈特部。一七五六年该部遣使进京，历时三载，向乾隆帝呈献了贡品、方物，表现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至诚。这个期间，沙俄却不断加紧对他们的控制，力图隔断他们与故国的联系。沙皇先后发动对瑞典、土耳其的战争，都强迫娴于骑术的土尔扈特人为其前锋，“归来者十之一二”。可怕的灭族之灾，使部落内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尤其难以容忍的，是沙俄实行宗教压迫，强制他们由喇嘛教改信东正教。在充满灾难的时日，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

有关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国的记载，我还没有见到专著，概述

与专题文章倒有一些，包括乾隆帝的两篇碑文，就中以当代学者马大正先生的《渥巴锡论》等篇较为详细。从中了解到，渥巴锡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青年英雄。一七六一年，父王敦罗布喇什病逝，渥巴锡继承了汗位，是年十九岁。十年后率部东归，开创了震惊中外的伟业。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岁。

据史料记载，至迟在一七六七年初，渥巴锡就已开始酝酿东归的大胆计划。在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举事之前，他不仅战胜了内奸的多次告密，还运用巧妙的手法，麻痹住沙俄当局，顺利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东归故国的整个进程中，他表现了杰出的智慧、魄力和领导才能。起义之初，实行乘敌不备，先发制人的策略，速战速决地袭击俄驻军兵营和全歼增援的部队，然后把近十七万人的东归队伍组成三路大军，声威赫赫地进发；又安排舍楞等两名勇将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经过十几天的急行军，摧毁了沿途的敌军要塞，掩护整个东归队伍以最快速度穿越冰封雪压的乌拉尔河，迅速地挺进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沙俄当局并不就此罢休，急令奥伦堡总督和军团指挥出兵截击，并派出骑兵团穷追不舍，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东归部队伤亡惨重，人口锐减。特别是奥琴峡谷之战，更为严峻与惊险。这个东进路上必经的险要山口，其时已被悍猛无比的哥萨克人控制。机智勇敢的渥巴锡临机制变，毅然决定派遣一支精锐的部队，绕道迂回到山谷的后面，与正面进袭的大部队相配合，前后夹击哥萨克守敌，获得了全歼的战果。

当东归队伍进入姆莫塔湖地带，又陷入了哈萨克小帐与中帐的五万联军的重围，切断了前往准噶尔的通路。渥巴锡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派出使者进行谈判，同意送还一千名俘虏，从而争

得了三天的缓冲时间，迅速调整、部署兵力，在第三天深夜，渥巴锡亲率主力，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重围，向巴尔喀什湖继续挺进。一七七一年七月八日，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接着，清军总督伊昌阿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与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主力和大队家属。至此，胜利完成了重返祖国的东归壮举。

在歌剧《苍原》的四个主要人物中，渥巴锡而外，舍楞也实有其人。其先世未随部落西迁，世袭准噶尔属台吉。其间，舍楞参与过一次地方起事，失败后又施计诱杀了清军的一个副都统，为逃避刑罚，西奔到土尔扈特部。东归途中，舍楞始终是渥巴锡的得力助手，二人间并未产生过龃龉。歌剧中侧重描写了东归途中内部意见分歧、少数坏人阻挠造成的重重矛盾，和"情感与理智的搏杀，生命、爱情与自由、尊严的血泪交织"。实际上，当时最严重的威胁，不在内而在外，因为民族的生死存亡已成为压倒一切的课题。至于随着形势的变化，潜在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那已是东归之后的事情了。

根据清廷安排，伊犁会见二十天之后，渥巴锡一行即起程前往承德。九月初，在木兰围场觐见了乾隆皇帝，几天后又陪驾到了避暑山庄。全部王公都受到了厚赐，部众也得到了赈济与抚恤，体现了清政府的收抚政策。尔后，即颁发官印，安排六个核心成员分任各地的盟长，彻底改变了统一立汗的体制。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其独立，所采取的"众建以分其势"，"指地安置，间隔而住"的重大策略。这样处理的结果，也使个别成员酝酿中的争权夺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我以为，《苍原》的情节设置，自是构建错位结构，推动剧情发展，展示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需要；但是，由于过

分地突出了内部矛盾，特别是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敌我斗争面前，在整部存亡处于千钧一发的非常时刻，把渥巴锡描绘成迟疑退避，一筹莫展，进而轻率地采取易汗让位的举措，势必产生削弱其完整形象的负面效应。应该说，这是十分成功的整部剧作的一个败笔。

这里探讨的，不是历史题材能不能加工处理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是如何加工处理得更合理、更真实。如所周知，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写历史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重组，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只要能表现真实历史的内涵，不必每一件都尽合铆榫。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更深入地探寻历史的规律，也不妨变换视角和调整视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并非凭空架构，而是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就此，鲁迅先生指出："据正史则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三国演义》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说，《苍原》在这方面颇见功力，是获得了很大成功的。显然，较之罗贯中，《苍原》的编剧者艺术活动天地更大一些。三国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知，这就使创作构思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人物、主线和重要情节。而由于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经过，人们知之甚少，于是，剧作家便纵笔自如，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顾忌。这原是有利条件，但也是一个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弄得不好，就可能离开史实过远。这也是应该加以警惕的。

您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孔老夫子有一句话:"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这句话颇像"绕口令",大意是:对于不明确"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了。我这篇短文的题目,无论形式和内容都与之有些相似。

先说说构思的缘起。一次,我出席某系统的动员会,在主报告中听到这样几句妙论:"我们要学会分析矛盾,弄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阻碍事业的发展就突破什么;什么是薄弱环节就加强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这里不是谈工作方法,是向下属作动员报告;也并非专门说给各部门负责人,而是面向广大职工群众,显然是无的放矢。更大的问题在于言之无物。主讲人并没有告诉大家到底要解决什么课题,听了等于没听,反而人人抱了一个闷葫芦,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时候想出来的,当时真想追问一句:"您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这类空话、废话(也包括文章)的通病,一曰空洞,没有实际内容。听这类讲话像是啃皮厚馅少的馒头,半晌得不到实惠。又像《颜氏家训》中记载的,"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二曰浮泛,漫空里放风筝,不看对象,不着边际,不切实际。三曰俗套,套话连篇,像鲁迅先生指斥过的,"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出现这种现象的症结所在,是缺

乏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于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实际情况，若明若暗甚至一无所知，因而提不出恰中肯綮、鞭辟入里的见解。可是，既然出席会议又不能缄口无言，就只好照着《孙子兵法》办：避实而击虚。这样一来，可就苦了听众——“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上述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但是不是极为个别、十分罕见呢？恐怕也不是。因而还有必要提出来引为鉴戒。应该认识到，空言之害，不仅仅是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空耗他人的时间，长此下去，还会造成一种逞空谈，尚虚浮，不务实际的风气，败坏党的文风和党风。所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主席就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头条罪状痛加挞伐，告诫我们要“禁绝一切空话”。这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和深刻的教益。

就是盼着这一天

诗，是和情感的脐带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古人说，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又说，诗者，诗人胸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近期，各地报刊陆续登载一些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抒情诗。诗人满怀着激情，将长期凝聚起来的苦闷、狂喜、渴望之情，一一诉诸笔端。作为读者，我的情感便也随之而涌荡起春潮，久久地沉浸在兴奋、温馨的气氛中，心中升腾起一种自豪感。

美籍华人连文山先生的《自度曲》，是抒写自豪的心态和爱国情怀的："问南海潮头，可知今夕何夕？凤翥华灯，龙翔彩焰，共庆金瓯完璧。""数强梁霸业，终成尘迹。今日巨人奋起，岿然屹立。整顿衣冠更正谱，续我炎黄史页。猎猎红旗，轻飏星岭，笑指西天落日。"看了令人心神为之一振。可惜我不会喝酒，不然，真应"浮一大白"。

诗，也是史，它是心灵史，更是历史的歌吟，时代风云的记录。我很喜欢著名作家峻青的一首七绝："曾将泪眼望山河，残缺金瓯遗恨多。欣看神州完璧日，那堪再唱后庭歌？"寥寥四句，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整部中国近代史，里面蕴涵着往日的斑斑血泪、奇耻大辱，也寄寓了今天的胜利的喜悦和必不可无的警示与惕戒。一位美籍华人在《伶仃洋的咏叹调》中，深沉地吟道："一百年的羞辱，/一百年的期待，/一百年的风霜雨雪啊，/一百年

的愤懑在胸怀！/是现实嘲讽了历史？/是历史对现实的无奈？/一百年后的今日啊，/好一辆直通车——/纾纾缓缓地开过来。/送来了一车的阳光，/送来了满天的霞彩。”

从这里也得到一种启示，解诗必须联系背景。背景就是历史。特别是解读这类饱蕴沧桑之感的诗篇，还应同近代诗词结合起来。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王朝，璞鼎查代表英国政府，在“汉华丽”号英舰上订了城下之盟，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大门就被列强打开了。神州各地，到处是帝国主义角逐的战场和杀人的屠场。野蛮的侵略者的暴行和广大人民的苦难，激发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许多人认识到，诗歌创作再也不是歌舞升平、给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大雅之什”，也不是躲在象牙之宫里吟风弄月、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闲品。他们以笔为枪，以诗歌为号角，开创了爱国主义诗歌的新纪元。爱国主义成为近代文学最光辉、最集中的主题之一。

鸦片战争之前，爱国主义文学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形成过程中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它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长期形成的这一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如从近代国家多民族这一新的角度来考察，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而鸦片战争之后，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诗歌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给日本。台湾诗人邱逢甲奋起组织义军抗日保台，但终遭失败，乃潜往内地。诗人引颈南望，故乡掩映于苍烟暮霭之间，忆家国之

遭逢，独怆然而涕下。于是，题《春愁》一首："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与此同时，著名思想家、诗人谭嗣同也写了一首七绝："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两诗可以看成是姊妹篇。但后者感情更为激越，以悲愤与悲壮取胜，意境亦更为深邃。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他们纷纷划定势力范围，向清政府强行租借。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冬，德国派海军强占了胶州湾；沙俄派舰队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之，法、英等国接踵而来，分别强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和威海卫。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政治活动家、诗人黄遵宪，面对这一惨痛的现实，悲愤异常，于一八九八年写了《书愤》五首，第一首是："一自珠厓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诗人愤怒地谴责清政府唯列强之命是听，而列强瓜分中国没有止境，此刻正像秦楚纵横之日、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时。但即使那时，也没有听说连南北咽喉要地都被控制住的。悲愤之情，溢于纸上。这种把清政府的卖国妥协行径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罪行联系在一起加以揭露、谴责，是特别有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当时，不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的清王朝，也就无法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类似内容，还有康有为作于一九〇一年的一首七绝："魏绛和戎岂有功？只愁云雾蔽辽东。凭将士气扶中夏，泪洒山河对北风。"这年九月七日，庆王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美、俄、德、日等十一国代表达成和议，签订了丧权辱国、出卖民族利益的《辛丑条约》。诗中感情跌宕多姿，慷慨遒劲，与五律《书

愤》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在一八七〇年，即黄遵宪写《书愤》的二十八年前，当他来到已为英国租占的香港时，曾写过十首《香港感怀》。其一曰："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凿空蚕丛辟，嘘云蜃气奇。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诗中说，乾隆帝在位时英国就曾提出过租用香港的要求，当时被断然驳回。可是，道光朝却签订了《南京条约》，丢失了"燕脂"，铸成了大错。"凿空"句是说中国人开辟香港的艰辛；"嘘云"句形容它今日的繁华。尾联摇曳生姿，通过风中误认龙旗，寄托诗人对香江割离母体的悲怀。凑巧、康有为也有一首《八月十四夜香港观灯》，也是尾联写得非常凄婉动人。这是一首七律："空蒙海月上金绳，又看秋宵香港灯。曼衍鱼龙陈百戏，参差楼阁倚高层。怕闻清曲何堪客，便绕群花也似僧。欢来独惜非吾土，看剑高歌醉得曾！"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做客难堪，情怀落寞（即使群芳环绕，也像个六根俱净的和尚），为什么？最后两句是答案。一腔爱国衷肠，令人深受感染。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当万众腾欢，载歌载舞，共庆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当五星红旗猎猎高扬于"会展中心"之上的时刻，我们这些后来人又该是如何地欢欣，如何地自豪，又如何地感喟无限啊：一百多年来，无数近代诗人悲歌呐喊、愤切慨慷，不正是为了争得这扬眉吐气的一天吗？

下午茶

《新晚报》副刊有个版，名为“下午茶”。究竟何所取义，我不太清楚，但很欣赏这个名字。

据说，英国人每天下午四点都要喝一次茶，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邀人赴茶会，时间一般也都安排在午后四点到四点半左右，因此请帖上往往写着：“某某先生暨夫人将于某日下午某时在家恭候”。英国小说家吉辛说到饮茶，把安排在下午的家庭红茶小聚看成是一天里最大的乐事。而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则更加推进一步，在其名著《仕女画像》中写道：“人生最舒畅的时候，莫过于饮下午茶。”

其实，应该说，饮茶、品茗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茶，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说明自古以来它就是人生的必需品。十七世纪初，由葡萄牙人传到了欧洲，现已遍及世界。起码可以说，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饮茶的习尚。如果喝咖啡足以代表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情趣，那么，表现东方人独具中古气味情趣的则非饮茶、品茗莫属了。

久别重逢的友朋相聚，最想往的是开怀畅叙。在这种情况下，喝酒不如饮茶。因为酒宴往往为热闹的社交而置备，茶会则是为恬静的朋侣而张设的。且不说，倾樽豪饮，醉拍栏干，难以欢然道故，即使安然对坐，只要频频举杯，轮番劝进，也难以静下心来，款叙衷情。如果席间遇上一位打通关的猛将，不甘英雄

的寂寞，摆台设擂，叫吼不停，善饮者忙于应战，固然腾不出空儿来谈心，而怯饮者避之唯恐不远，就更没有悠闲心态来叙话了。所以，茶会就成了友朋畅叙的首选形式。古人有诗：“寒夜客来茶当酒”，我想，这并非全是由于灶头乏酒，也许是茶比酒更宜于倾谈的缘故。

诚然，茶有润喉、解渴的功能。但如果说饮茶只是为了解渴，却不尽然。郑板桥的“闭柴扉，扫竹径，对芳兰，啜苦茗”，名士之风雅存焉。经常处于紧张、忙碌状态的现代人群，同样也愿意在轻啜细品中，体味一番“口角春风”的逸趣。他们饮茶，与其说为了解渴，莫如说是赏鉴其色、香、味，觉得饮茶是一种享受，一种情趣，一种闲适。不是吗？比如，那位说“人生最舒畅的时刻，莫过于饮下午茶”的小说家，显然就不只是为了润喉、解渴。

林语堂说过：“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中去。”这种体验，许多人都有。时逢炎炎夏日，午梦初回，趁节假之暇，邀二三知己，或凉亭小憩，或雅座消闲，一壶沸水，数盏新茗，在紧张、喧嚣、变动、浮躁的现代生活的间隙，寻得一方恬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此刻，澄心静虑，意兴悠然，伴着袅袅茶烟，畅叙着万般情事，在粗犷里品尝细致，在浮荡中享受宁静，在刹那间体会恒久。确实是，暂得半日消闲，可抵十年尘梦。

说轻道重

——皖南杂识三则

文　　脉

在皖南之旅中，从宣城到当涂，当地朋友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有一条千古文脉。

南齐的著名诗人谢朓，年轻时生活在建康，自幼接受了那里山川丽景的薰陶。弱冠以后，又广泛地接触了三江、荆楚的山水。三十二岁出守宣城，因为仕途的险恶，引起了内心出处仕隐的矛盾，更加有意识地放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为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富饶的资源，这个时期的诗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诗为旗帜的"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由古体转变为近体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的影响，至为深远。因此，被文学史家看作是一个文学流变的分水岭。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李白曾经七到宣城，对于谢朓倾心追慕，写下了"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等许多抒发其景仰之情的诗篇。清代诗人王士祯有诗云："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对谢朓的追慕，当然主要是着眼于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但我以为，可能也和两

人在政治抱负、仕途遭际、思想基础、生活阅历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有一定关系。“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类似，谢朓始终期望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也是既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气质，又没有肆应宦海惊涛的经验与韬略，只是以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被卷进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推涌到郡守、尚书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诬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李白殁后六年，著名文学家韩愈诞生。他特别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怀念，“夜梦多见之”，晚年，跋山涉水，专门到宣城来筑室而居，以体认高怀，亲近遗泽。尔后，相继又有白居易、杜牧、苏轼、黄庭坚、欧阳修、梅圣俞、文天祥、李东阳、文征明等无数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写下了许多凭吊李白、谢朓的诗文。元帅诗人陈毅在抗日战争戎马倥偬之际，还曾在宣城题咏：“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足见诗文影响入人之深。

当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风光秀美。谢朓出守宣城时，尝筑室于青山之阳，与客遨游吟咏，双旌五马往来于湖山杳霭之间。李白爱乌及屋，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来凭吊谢公宅、谢公井，寻访谢朓的遗迹。太白既殁，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根据太白“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朓”的夙愿，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于结为异代之芳邻。

一千二百年后，有“诗书画三绝”和“当代草圣”之誉的书法艺术大师林散之，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林先生一九八九年病逝于南京，经请示中央同意，马鞍山市政府为筑墓园于太白祠侧，

并就地建立了林散之艺术馆。

谢宣城、李青莲、林散之，生前死后得偿其青山同聚，魂魄相依的夙愿，也是一桩文坛幸事。

我以为，这种所谓“文脉”，实质上反映出一个文人相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

所贵者情

杜甫没有到过皖南，当地人深以为憾。但当在皖南说到文人相重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李白和杜甫。

闻一多先生曾把李杜相逢比作两曜遇合，认为意义极为重大，“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则更加欣赏两颗诗星无比纯真的本性与至情。每番诵读他们互相忆念的诗章，我都激情喷涌，心灵久久为之震撼。公元七四四年二人在洛阳首次相会。情意相投，备极欢洽。次岁，他们又在山东的齐州、兖州重逢，相偕游览，亲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凄然话别时，李白写诗相送:“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别离日久，怀念愈深，李白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之句。杜甫回到长安后，也写了《春日忆李白》的名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可惜两位诗坛巨擘此后再未重逢。公元七五七年，李白因受永王牵连，被捕入浔阳狱，翌年流放夜郎。杜甫万分悬念，结想成梦，写成《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中有句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感情至为真挚。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白居易与元稹论诗时提出的观点。首先在作人、交友上，元、白二人就身体力行了。每番掀开他们的诗集，都为那种真挚的深情所感染。公元八〇九年，元稹奉命入蜀复查刑事案件。白居易时在长安，饮酒中忆起他来，写道："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与此同时，元稹在梁州驿舍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白居易同游曲江和慈恩寺，就写了一首诗相寄："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点神秘色彩，实际恰恰说明二人真挚友情是何等之深！六年后，元、白先后被贬谪到通州和江州。元稹听到白居易亦遭贬谪的消息，不顾自身的困难处境，拖着病弱之躯写了一首七绝："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白居易见到这首诗之后，在给元稹的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稍晚一些时日，元稹又写了一首题为《得乐天书》的诗："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的惊疑，因为诗人已经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她们只有猜测：是谁一封信竟引他如此悲伤，看来肯定是白乐天了。——如果没有深厚的情感作基础，这种情态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情，是文学的生命。凡是传世的名篇，无不文自情生，贯穿着一根真情灼灼的红线。曹丕当过皇帝，但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倒是在文学方面成就了一个建安时代的重要诗人，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散文，语言流利婉转，感情色彩浓重，《与吴质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刘桢、应瑒、陈琳，都在这时病死。曹丕在给他的文友吴质的信中，一方

面深情悼念死去的朋友，同时也满带感情地表现出对过去友朋相聚，觞酌诗咏的生活的怀念。感情悲怆恳挚，文笔哀婉动人。一开始就引《诗经·东山》，说征人三年不见亲人，尚且叹恨离别太久，何况我们已"别来行复四年"。下文转入对故友的思念，追怀昔日相聚情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聚会时，互相巡回劝酒，还有丝竹相伴，"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是，现在呢？……既把昔日无限的情趣表现出来，更把今天深深的孤凄与怅惘诉于笔端。叙事、抒情交融互汇，可谓至文至情。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曹丕为魏太子。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能够做到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

文人相轻

在当涂，我问东道主：唐宋时期，除了李白，当地还有哪些人颇著文名？他们说，恐怕要推北宋时的郭祥正和李之仪了。他们的诗文集《青山集》和《姑孰居士集》，都以当涂的胜地命名。

这两个人，大体上生活在同一时期。郭祥正，当涂人，熙宁进士。他特别喜欢李白的诗，写的古风有类似李白处。但其为人，当时与后世颇有一些疵议。《宋史》本传中说，王安石执政时，他曾奏请神宗，天下大计应专听安石处画，如有异议，虽大臣亦当黜免。安石得知后，耻为小臣所荐，便极口陈其无行。有的书上还说他，先曾上书推崇王安石，后来新法推行，他又作诗讥刺，"小人褊躁，忽合忽离"，"其人至不足道"。

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载，李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因曾为范纯仁草遗表，蔡京恶之。此后即卜居当涂。一次，

他为郡人罗某作墓志，开头就说，“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浊。”清谓罗公；浊即指郭祥正。郭以此怨深刺骨，“文人相轻，遂成仇敌”。之仪丧偶无嗣，曾将郡中娼妓杨姝养在家里。祥正乃怂恿豪民上讼于朝，之议被削籍，杨姝斩首。祥正快之，作俚语曰：“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

这种“文人相轻”，与曹丕当日讲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属于一种类型。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认为，出现文人相轻，一是由于“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由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钟书先生评论说，数行之内，语若刺背，理实圆成。“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那么，结果呢？就必然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又兼文学产品的评价，常常是从欣赏者的个人角度出发，各有轩轾，不易统一。这和比武、赛球有明显的差异，不能一起一伏，胜负立见。所以，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这种类型的“文人相轻”，依据的是文章，与郭、李交恶的基础不同。就性质来分析，主要是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而上学和主观片面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学上分宗列派，党同伐异，也常常表现为文人相轻。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诗坛上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同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尖锐对立。沈氏强调温柔敦厚，正格调，主唐音；而袁枚则主张，“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最后，在反封建纲常、反形式主义、反纯功利观念上，压倒了“格调说”。他对在考证学风弥漫下产生的以翁方纲为首的“肌理说”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肌理说”主张融经意入诗，以儒典考据、发

挥义理为诗旨。袁枚批评它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他还写诗讽刺翁方纲以学问为诗："天涯有客号诊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今天来看，"性灵说"自有其积极的进步内容和符合诗歌艺术审美规律的合理见解。

但除了这类正当的文学批评之外，袁枚有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宗派性质的文人相轻。比如，他批评摹拟名家为"权门托足"；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骂詈浙派是"乞儿搬家"；哂笑以诗唱和者为"村姑絮谈"；贬斥作诗加注是"骨董开店"；讥笑写肤浅诗的是"矢口而道，自夸真率"；嘲讽讲声调、格律者是"栩栩然矜独得之秘"。可以说，骂尽了当世诗人。实际上，他自己的诗亦有不少酬唱征逐、内容无聊的敷衍之作，甚至有人讥之为"伪体"和"野狐禅"。尤其是在《随园诗话》中对达官显宦的记述过多，对资助他刻书的更是求则必应，常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的私货被录进《诗话》。对袁枚这样的诗坛巨擘来说，这当然只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但从中可以看出，"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各以所长，轻人所短，确是文人相轻的一个思想根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面对历史的苍茫
作者＝
页数＝１０００
ＳＳ号＝0
出版日期＝